

全国高职高专优秀学报一等奖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YIWU GONGSHANG ZHIYEJISHU XUEYUAN

学报



4
2021

第 19 卷 第 4 期

Journal of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学校动态



11月26日，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来校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0月26日，省外办副主任顾建新一行来校开展“三为”专题调研活动。



10月27日，人社部中全人才服务中心魏庆峰总经理一行来校调研指导电商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



10月29日，学校与义乌市江东街道合作共建浙中未来社区智库及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10月23日，由义乌市人民政府举办、学校主办的第四届“一带一路”中国（义乌）世界小商品创新驱动国际论坛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12月13日，中国—新西兰“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创业教育与商业新模式”国际论坛在学校举办。

目 录

□ 高教管理

“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概览、问题及治理

..... 孙不凡,贾志国,程一可(1)

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以中小学班干部为例..... 向 丹(8)

□ 教学改革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职院校有效教学策略..... 张 海(15)

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以山西为例..... 蔡伟发(19)

视频在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的三重逻辑..... 王浩岩(23)

□ 留学生教育

对外传播视角下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 王赛君(28)

□ 经济与管理

-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严 娟(32)
-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 刘超俊(42)
- 零星疫情防控之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王 俊,刘良军(48)
-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
——以粮食主产区地级市数据为例 陈晓燕(53)

□ 应用技术

- 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李宇峰,吴俊峰,陈 俊(61)

□ 文学与艺术

- 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饥饿书写”论析 毛靖宇,陈 婉(67)

□ 地方研究

- 文化基因视角下的雅畛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与思考 孟志广(73)

英文目录 (78)

2021年总目录 (79)

2021年12月出版

“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概览、问题及治理

孙不凡, 贾志国, 程一可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双减”是提升教育质量和规范校外培训的关键举措。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与非教育两个层面,同时,政府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过程中亦存在治理目标定位、创新方式、参与程度、协同配合等现实问题。造成校外培训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涉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模糊、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唯升学与唯分数的评价导向、治理问题的复杂多样等方面。为解决上述难题,应该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校外培训的专门机构、制定校外培训机构专门性法律法规、优化省域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体系、探索政府助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径等。

关键词:“双减”;校外培训机构;教育治理;教育质量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何谓“双减”即“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简略性表达,多用于政策用语和生活用语。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双减”首次出现在国家级政策标题之中;因为“双减”涉及到教育减负和校外培训,与人民生活较为密切,此意见出台后便一直成为我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政府通过“双减”政策意在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并巩固学校教育的“主阵地”,最终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此外,该政策导向对校内课业压力的科学减负,对校外培训乱象的规范整治,也有助于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可见,“双减”能否有效贯彻执行是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

本研究中的校外培训机构特指发生在学校教育系统之外,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的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商业机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教培机构”“课外辅导机构”等在中小学校外补习语境下,除表述略有差异外,并无实质区别,故本文统一为“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政策明确指出,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中,要切实解决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总量庞大、违法违规情况突出、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破坏教育正常生态等突出问题。因此,引导校外培机构的良性发展,并使之与学校教育协同并进,亟需学界、政界与公众持续重视。本研究就是基于“双减”的宏观背景下,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概况、需求现状、现行问题、治理建议等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二、“双减”政策与校外培训机构概览

“双减”工作作为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重大资助课题“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发展理路——以乙省为例”(19YSXK05ZD),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双减政策与为民办实事的关联性分析”(Y202147603)。

作者简介:孙不凡(1991-),男,安徽马鞍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研究;贾志国(1985-),男,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学基本理论研究;程一可(1998-),女,浙江金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是经由中央统筹、全面顶层设计后的综合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是“双减”政策中的重要主体,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涉及到校内教育质量提升、校外培训市场整治等诸多环节,其不仅涉及教育,还涉及企业经营、百姓就业等非教育问题,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交叉议题。

(一)“双减”政策概览

“双减”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是学生和家长,间接影响主体是教师、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及其从业者。政策出台后,中央及教育部陆续颁布一些配套政策,各省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也出台了具体落实细则,如:仅4天后,教育部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以及启动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8月,国务院发文明确“双减”半月通报制度,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此后,北京、上海两市也迅速出台了当地的“双减”政策落实方案。全国各地打出了一套落实“双减”政策的组合拳。而在此之前,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标志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专门化、体制化;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也将“双减”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点。

截至今年十一月,我国已基本构建起全方位、多部门的“双减”政策体系,如围绕校外培训机构颁布学科类培训范围界定、“备改审”、“营改非”、培训材料管理、培训人员管理、查处变相违规培训、加强收费监管、上市公司清理整治、课后服务、建立监测机制、培训机构登记等11个配套文件。种种政策实践和政策意图表明,此次“双减”的级别之高、协同之多、决心之大、益处之深,堪称我国教育减负史上最强。

(二)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概览

近年来,具备商业和教育双重属性的校外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产业。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但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发展问题。

首先,从总体规模来看,在“双减”政策之前,校外培训机构规模和数量均呈现井喷式发展。

根据企查查数据,截至2021年7月底,全国范围内仍存有63万家教育培训相关企业;从注册量上来看,2020年共新增8.4万家,同比增长8%。根据《中国企业家》的相关报道,校外培训共涉及70万以上机构、超过1000万从业人员。2017年,全国校外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1];2019年,根据艾瑞咨询我国校外教育培训市场规模为7629亿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次,从格局状况来看,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至少有120家。根据2021年7月24日《校外培训机构倡议书》^[2]中发起倡议的单位,其中包括新东方、好未来、作业帮、猿辅导、一起学、精锐教育、掌门一对一、学大教育、卓越教育、昂立教育、北外壹佳、洋葱学园、高途教育、河南大山教育等。校外培训机构按活动场域,可分为“线上”“线下”或两种类型皆有。传统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呈现集团化、区域化、规模化等特征。

第三,从培训内容来看,主要可分为学科和非学科两个类别。教育部2021年7月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对涉及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国家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而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3]。总体上,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内容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其培训目的主要是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或培优选拔,也涉及到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研学等综合素质培养。

第四,从培训需求来看,校外培训的需求日益强烈。不管是学科补习还是兴趣拓展类培训,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父母学历的提高,学生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上升;无论从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参与时间还是培训支出都可以看出,家庭在选择校外培训方面,主要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从学科的供给方来看,由商业公司提供学科补习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的比例^[4]。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提供的数据,中小学阶段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校

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拓展类培训)。但仅仅两年之后,根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5],我国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度就超过了六成,每年校外培训的生均花费也提高到9211元,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12.84%。

三、我国校外培训的行业问题及治理困境

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但也存在一定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分为教育层面与非教育层面,同时政府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种种困境。

(一)校外培训的行业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的盲目扩张也造成超前超标培训、收费居高、资本过度涌入、违法违规行为丛生等行业乱象。仅从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情况看,2020年全年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举报15.5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8.2%。2021年第一季度,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举报达到4.71万件,同比增长65%,排名升至第3。总体上,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问题包括教育和非教育两个层面,前者是当前阶段矛盾的主要表现,后者是隐匿在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的诸多乱象造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教育问题,也破坏了良性的教育生态。如:在课程方面,多数校外培训机构严重违背了课程的设置、实施、评价、管理等国家标准。尽管校外培训机构所教授的实际内容仍是课程标准之内的学科知识,但却更加应试化、功利化、短效化。同时,校外培训机构中课程评价优先迎合家长需求,如缓解教育“焦虑”、迎合“鸡娃”现象、进行成绩攀比等,但这些非孩子本身的身心发展需要。在教材方面,校外培训机构选用的教材虽有特色,但往往存在内容、质量和衔接问题:一是精简压缩课内教材且内容超前严重,例如整理出小学数学教材中所有公式,要求学生直接死记硬背;二是教材内容质量良莠不齐,缺少明确规范与审核,尤其是自编教材与涉外教材;三是教材变动大,部分机构未建立完整的教

材体系,随着教师人员流动教材难以有效衔接。在教法方面,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教师管理不合规定、教师培训制度淡化等问题,尤其以“讲师”名义招聘教师却以“续费率”为绩效考核标准,导致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在预设教学内容下,教师的教学方法受到培训要求与培训效益的双重制约,往往采用以考代练、以练代教的“快节奏、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教学方法套路化、程序化、呆板化。此外,校外培训机构在教育层面存在的行业问题,还包括教育安全问题、教育心理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由于教育问题的根源及问题的影响往往不仅限于教育本身,因此,校外培训机构在非教育层面存在的行业问题更值得警惕。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基于此分析框架,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乱象也会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从政治领域来看,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乱象,存在影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法律底线的可能性。因而,校外培训机构的综合治理绝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议题。从经济领域来看,校外培训机构的过度市场化,如经济纠纷和虚假宣传等,体现了教培市场依然“市场失灵”等市场经济固有矛盾。这一方面严重损害了行业自身的社会信誉,也为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埋下风险与隐患。从文化领域来看,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校外培训机构具备商业和教育双重属性,“嘴上谈着教育,心里想着生意”是常态,其商业化经营、恶性竞争等行为,助长应试教育,最终也会侵蚀社会文化。

(二)校外培训的治理困境

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困境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校外培训进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理念、制度、执行等方面,即教育行政部门在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引导其良性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教育体制机制问题。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治理目标定位不准,呈现行政化。《地级市政府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文本分析》^[6]一文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目标多数只是停留在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标准、质量、规模、

设施等层面。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目标的效用期限多以短期为主。教育行政部门在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往往有强烈的“对上负责”的行政化取向,伴随“运动式”治理的状态,未能有效将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之中。对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运动式治理,虽在短时间内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不是常态化治理的推进方式,不利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打造和谐统一的校内与校外教育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资源的浪费。

二是地方治理的方式创新不足。一般来说,省级、地市级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政策文本名称分为方案和通知两种,其或是沿袭本省,或是借鉴中央政策的名称,且内容重合度也较高。趋同的状况也反映出地级市在政策制定时的“懒政”现象,没有根据本地的课外补习实际状况和校外培训机构实情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自然也就没有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原则。《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内容分析》^[7]一文指出,各地区之间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各地政府的治理方式出现“雷同化”,严重脱离地区内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际状况。

三是治理过程其他关键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多元参与、有效参与是治理的基本价值,但目前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过程中,存在着非政府主体有效参与不足的境况。校外培训不仅关涉到社会教育,还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学生、家长、教师、社区工作者、政策研究者等都是校外培训机构有效治理的关键主体。针对其他关键主体有效参与不足的境况,新京报《祛除校外培训“虚火”,“围追堵截”治标不治本》^[8]一文认为目前治理过程中“自上而下”政策的外部驱动占主导地位,且尚未形成基于政府、企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多方主体共识的整体行动逻辑,呼吁多元主体参与到校外培训共治之中。

四是存在多头治理,但协调不畅。一方面校外培训治理目前主要落实部门还未统一,存在“多头治理”。中央级别的治理主体为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工商总局,地级市层面涉及的主体更为多元化,包括教育(体育)局、公安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

商行政管理局、人民政府办公室、食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局、城市管理局、公安消防局、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张烁在《要深挖病根,更要对症下药》^[9]中指出政府治理呈现“九龙治水”的格局,多头审批实际无人管理,没有形成整体的结构性布局 and 系统化路径,容易导致政策执行权责的模糊。

四、校外培训机构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造成校外培训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涉及以下四大方面。

(一)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模糊

校外培训,又称“影子教育”,这一概念是1992年由史蒂文森和贝克在研究日本高中生学习现状时提出的。而后马克贝磊对其做了详细研究,指出校外培训是发生在正规的学习教育之外,旨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所有教育活动。在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合法地位则是由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所决定的,而2002年和2004年颁布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则加速了校外培训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内外对校外培训及其机构的研究没有超过30年。

对校外培训行业及其机构的关注与研究起步晚、研究不足是其定位模糊的原因之一,但更多的是行业本身的特殊性——教育属性和商业属性兼具。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机构缺乏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精准”定位,究竟是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还是坚守公益原则的民办学校?至今未有专门的法律明确规定。其弊端就是“法无禁止皆自由”,没有专门法律的约束,加上资本的逐利属性,导致绝大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教育属性和公益原则日益缺失,对其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定位往往“选择性遗忘”。

(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改革开放后,我国校外教育培训开始产生并发展,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引发太大关注。2000年之前,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学校布置的课后作业比较多、学生的学校课业负担比较重,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不大。2000年之后,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2010—2020年)》颁布以后,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我国各地陆续出台政策,严格限制学生在学时间,要求三点半或四点半放学,严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师以任何方式进行补课。学生的在学时间缩短,课外时间变长,如何有效地利用课外时间,成为摆在家庭、社会面前的重要问题。学校教育供给的相对有限与社会教育需求的急剧扩大,形成了教育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家长、学生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与日俱增,成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飞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此外,儒家文化观念惯性强化了社会对学习成绩的重视,市场经济加剧了全社会的功利性,人才选拔制度的单一和社会舆论的造势,为校外教育培训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对教育风险的规避和对冲加剧了家庭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非理性投资和非理性依赖。

(三)唯升学与唯分数的评价导向

每一个学生都希望通过中考和高考获得更好的教育,因为获得更好的教育往往就意味着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地位。在保障社会公平和正常阶层流动的国情下,通过公开考试制度选拔学生,这势必是一个基本的手段,在此情况下,分数显得尤为重要,由此造成了唯升学、唯分数的评价导向,通过校外教育培训提升分数,变成了第一需要。为了保证过独木桥的相对公平性,在考试内容的编排上,采用固定形式的笔试测验,几乎每个问题都有明确唯一的答案。针对笔试的考试形式,通过更多时间对考题的钻研、对答卷技巧的操练,必然会提高分数。

大部分校外教育培训对分数的关注和训练正好契合了这一教育方式,应试化、功利化倾向明显。部分学生和家长受“分数”“升学”的影响,从提高考试分数出发,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在校外教育培训上。再加上大多数政府部门以升学率作为对学校评价的重要标准、学校也把升学率作为自身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更加助长了以“升学率”判断教育优劣的风气,进而强化了对校外教育培训的社会需求。

(四)治理问题的复杂多样

校外教育培训治理问题涉及多方利益协同,

治理的目标、内容、方式与评估十分复杂,需要渐进性改革。首先是治理主体复杂多样。如校外培训机构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超过70万家机构和1000万人以上的从业人员,还包括数量更为庞大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及其家长。据中国教育学会调查,2016年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班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高达70%。

其次是涉及的治理情况复杂多样。仅根据十八大以来有关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政策文件进行聚类,就包括开办标准、管理机制、教学规范等方面,而开办标准就又包括资质规定、场地规定、宣传规定和监督规定等具体内容。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事实上包括中央、省、地级市、县(区)四级,而各级的治理情况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地存在的治理理念差异与治理实践现实,如法律缺位、监管乏力、监管部门协作不充分、制度柔弱、违规成本低、监管机制迟钝且效率低等漏洞,给校外教育培训的违规以可乘之机。

五、改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措施建议

总体上,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应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对中央政策文件进行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吃透精神,同时,还需要结合各省域、各地市校外培训机构现实情况,对症下药,不断完善与创新,从而凝练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地方智慧与本土特色,以此上升为全国校外培训系统治理的有效参考。本研究基于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具体做法。

(一)设立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校外培训的专门机构

韩国与我国历史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程度较接近,其1980年出台《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也曾全面禁止校外培训,但到2000年又将该禁令彻底废止。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禁止校外培训往往是无效的^①,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校外培训需求的了解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合理引导,科学治理。日前,教育部增

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校外培训监管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于深化校外培训的治理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央到地方治理校外培训的专门机构应专门针对基础教育的校外培训开展监管,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再次强化升级,做到校外培训机构顶层设计与地区执行、综合治理与部门治理高效统一。各省市也应借鉴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设立省级、市级、县(区)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专门机构,加强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监管,层层落实责任,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对所有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灭绝式”治理。

(二)制定校外培训机构专门性法律法规

如前文分析,目前没有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多采用行政手段,依靠政策进行治理。但政策治理存在运动式、简单粗暴、难以持续等问题,需要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法制化、体系化。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其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10],正式将“双减”纳入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双减”的工作的法制化。在此之前,2021年5月14日辽宁省发布《辽宁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11],是我国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省级层面的首部立法。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尚不专门,也不全面,据此,国家和其他省市应加快出台有关校外培训机构的国家级法律及地方性法规,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全面纳入立法计划。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在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中的权利及义务,严格规范执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及其从业者也能根据法律法规从事正常的培训活动。

(三)优化省域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体系

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是国家治理与县域治理之间的“粘合剂”,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综合治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逐步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权。因此各省域应加快完善“政府引领、教育牵头、部门协同、家校联合、社会参与”的长效监管机制,做到“疏堵结合、齐抓共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前提下,优化涉及省级政府教育、公安、民政、市场监管、人力社保等多部门的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体系。

此外,要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治理。如积极构建校外培训机构智能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校外培训机构数字化监管;优化“双随机、一公开”常态化监管执法模式,同步健全教育APP备案制度,强化数字赋能,重点聚焦标准、准入、监管、执法等4个环节,形成部门监管合力;未来两年内逐步将校外培训机构纳入教育生态监测系统,共同营造良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绿色发展的良好育人生态。

(四)探索政府助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径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 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2021年7月,原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中51.4%已为离职状态^[12]。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切实指导与帮助校外培训机构转型、相关从业人员转岗,妥善引导这些教培人员转型、再就业,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相关教培人员往往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数量众多,是隐藏的人力资源财富。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征程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为优质教育技术进入校园提供更多路径,发挥校外培训机构在科技赋能教育方面的优势:促进现有校外培训机构由学科类培训向素质类培训转型,打通部门壁垒,开辟绿色通道;联合妇联等部门统筹协调校外培训机构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鼓励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在线教育的技术优势,除提供考试、留学等成人培训外,提供更多在线新型职业技能类培训;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转向终身教育,为成人终身学习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学习资源推介、学习方法指导和同伴推荐;支持校外培训机构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扶智强师,开发与信息化硬件相适应的智能化学习平台和教师培训平台。

参考文献:

- [1] 黄晓婷. 病态的繁荣:校外培训行业现状透视[N]. 中国青年报,2018-04-23(010).
- [2]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校外培训机构倡议书[EB/OL]. (2021-7-24)[2021-10-3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7/t20210724_546589.html.
- [3] 时闻. 教育部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J]. 河南教育(基教版),2021(9):17.
- [4] 王蓉.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
- [5] 苑立新.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20.
- [6] 徐玲,戴红利,胡夏. 地级市政府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文本分析[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9(3):46-54.
- [7] 祁占勇,于茜兰.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内容分析[J]. 现代教育管理,2019(3):44-50.
- [8] 新京报. 祛除校外培训“虚火”,“围追堵截”治标不治本[EB/OL]. (2021-05-12)[2021-10-30].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080516414489.html>.
- [9] 张烁. 深挖病根,更要对症下药[N]. 人民日报,2021-03-22(1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B/OL]. (2021-10-23)[2021-10-31].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qtxgfl/202110/t20211025_574749.html.
- [11]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EB/OL]. (2020-5-15)[2021-10-31]. http://www.ln.gov.cn/wscd/dfxfg/202005/t20200515_3853505.html.
- [12] 刘志杰. 别忘关注“双减”下的教培人员[N]. 四川日报,2021-8-30(11).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SUN Bufan, JIA Zhiguo, CHENG Yik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Double reduction* is a key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standardize off-campus training. The problems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mainly concern education level and non-education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difficulties for governance, such as governance goal orientation, innovation mode,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dilemma of off-campus training governance include vague positioning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am-oriented evalu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proble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ve, the main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agencies to govern off-campus training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formulating specializ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ptimiz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ovincial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government-assisted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education governance; education quality

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以中小学班干部为例

向丹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教育惩戒执行中介实施教育惩戒旨在引导受惩戒者行为合乎规范。中小学教育中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包括被合法赋权的教育者和作为受教育者的班干部。但由于班干部缺乏完整的专业训练和理性化处理事情的能力,容易造成其对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身份的滥用与误用,使得教育惩戒的实施失去原初的教化意蕴。因此,当班干部去执行教育惩戒时,需要明晰执行中介的职能性和惩戒的目的,并通过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协助及其班干部自身的“自我立法”,真正寻求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理性化发展,为教育惩戒提供终极的价值依据,从而为教育惩戒的科学化、良序化执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关键词:教育惩戒;受教育者;中小学班干部;执行中介;受惩戒者

中图分类号:G627

文献标识码:A

一、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

教育惩戒是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以惩罚为手段的教育行为或策略,而教育也由此构成了惩戒的出发点和发生领域,且表明了惩戒方式的属性^[1]。即教育惩戒必须在符合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进行,在符合程序正当性的原则下实施,并不强调以否定性制裁达成教育效果,而在于积极引导和完善受教育者的合规性。而当下中小学教育的教育惩戒大多集中在关注教育者(教师)的惩戒权力,忽视了班干部作为惩戒执行中介的职能性,甚至误解了班干部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对教育惩戒造成了误用。因此,重新确认班干部在教育惩戒中的执行中介身份和职能,既为教育惩戒的合理实施提供辩护理由,又确认了教育对主体作为受教育者的班干部的尊重和承认。

(一)被忽视的惩戒执行中介——班干部

就具体的中小学场域而言,鉴于学校行政以及基层教师的基本职能,人们往往简单地将教育惩戒归为上对下的处罚方式,这在一定程

度上默认了受教育者是教育惩戒的受体。认为教育惩戒是教师对学生偏差行为进行否定性的评价,即试图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教育手段来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2]。教育惩戒是拥有权力和权威的教育工作者对违犯教育规则的受教育者执行的惩罚方式,他们通过对学校教育的规范的执行或再诠释来主导对学生的惩戒行为。比如,中小学常见的违犯纪律被班主任罚站、罚跑步、抄课文等,都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教育惩戒手段。这不仅是因为教师本身作为教育惩戒的主导者具有法律上赋予的合法性,也是对教师的专业性知识和教师自身权威的肯定。教师作为直接的教育惩戒执行者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而教师执行教育惩戒更多地是在具体情景中进行的,比如受教育者的迟到早退行为可能会导致课业成绩受影响,严重者也会遭到通报批评等。当教育惩戒细化到更为具体的执行领域,班干部便成为了教育惩戒的“好帮手”。当然,人们常常只是将教育惩罚直接定义为学校或者师者对受教育者的辅助教育方式,忽略了在此两者之外还有作为受教育者的班干部群体

作者简介:向丹(1989-),女,湖南武冈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研究。

亦可能成为教育惩罚的执行人。所以,对班干部作为教育惩罚执行中介的重新审视是惩戒行为的必然要求。若我们总是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教师或学校层面的教育惩罚权威时,就容易忽视学生自身作为隐性执行中介的可能。而在中小学场域中,班干部真实地在践行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角色,并在一定范围内代行惩戒的职能。那么,班干部为何会成为中小学教育惩戒的一种执行中介呢?教育惩戒的执行权为何又会引向受教育者自身?毋庸置疑,在一般情况下,在教育领域内作为受教育者的班干部本身不具备惩戒权力和惩戒功能,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受规则规约的一方,并被规则用来评判和量裁惩戒的程度。

而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则一般发生在惩戒的操作领域,因其自身不具备判断行为是否失范的能力,更大程度上是对学校、教师等行政权力的某种依属。因此,中小学常出现班干部代行教育惩戒执行权,不仅体现在协助维持纪律,还体现在辅助教学上。当班干部成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人时,这一方面有利于对教育惩戒的实质操作,具有便捷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权威不足引起执行力低下甚至反抗等行为。这些也从另外的面向上证明,作为受教育者的班干部的确在具体领域中具备这样的惩戒能力及其扮演着惩戒执行中介这一重要的角色和身份,应该正视其存在并探求其理由。

(二)班干部作为惩戒中介的合理性探讨

教育惩戒是“惩”与“戒”同时并举的,它主要通过处罚与防止来维护教育行动,惩罚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戒除则是最终的目的^[9]。换言之,惩戒不是为了惩罚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不当行为的防止。随着现代性规训教育的蔓延与发展,存在更为严密的规训权力,这样的微观权力需求也照见了教师在执行中的不足成分,需要在维持惩戒效力时炮制一种监视的效力,这就为班干部作为惩戒代执行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规训化的手段把同伴监视或执行惩戒权也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这为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提供了时代的背景和价值基础。

同时,也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学校往往难以直接面向每一个受教育者,需要通过层级分化

来进行统筹管理。教师自身不仅是职场人更是社会人,就会存在管辖范围的有限性、精力的限度等内外在缘由,导致学校、教师常需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共同完成教育惩戒。诸如班干部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往往都在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时需要的基本管理体系之中,这一方面维护班级的良序运行,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违犯行为的一种监督与惩罚执行,是对不良行为的遏制。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承担着主要角色,甚至成为最直接的管理者,是师生班级间的和平力量,对班级班规的执行和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因此,教育惩戒权便从学校、教师等具有实质惩戒权的组织或个人,引向了更具体的执行中介——班干部,抑或是可以称之为胁从治理者,具有实践逻辑上的合理性。换言之,班干部作为惩戒的执行中介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通过教师赋权的惩戒衍生,其自身不具备真正的惩戒权。

从教师所代表的管理组织者层面而言,教师为了维护基本的教育教学纪律,只有经历了对受教育者正向教育的失败时,才会因应违犯的程度来决定教育惩戒的方式。比如,受教育者在课堂中玩手机、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等现象,比较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班干部对其行为进行记录,并按照班规执行惩戒。在中小学课堂中,由于学生的自控能力并未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而教师又无法面面俱到地观察每一位学生,如果教师对纪律的维持与管控花掉过多的时间往往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所以此时的班干部就会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对违犯行为进行记录甚至是直接进行处罚,比如责令同学抄课文、写检讨等,这也是履行班干部职能的体现。当然,就班干部而言,他们在教育惩戒中还存在双重的身份,既扮演教师的惩戒助手,同时也是学习共同体中的成员。正因为这种同侪的身份,不仅可以更加微观地执行和维护学校中的各项纪律、秩序等,而且一定程度上更好执行惩戒的中介工作,即班干部更具实操性,受惩戒者更易于接受这样的惩戒行为。因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都具有合理性,这不仅契合现代教育的发展,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从被忽视的班干部视角去探寻教育惩戒的执行

中介是一项可行性路径。

二、班干部作为惩罚执行中介的异化及其原因

在现实的情景中,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是实然存在的,但并不代表其完美无缺,它依旧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其背后的原因如何?我们如何去规避这样的劣势而更好地去有效实施?具体而论,当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时基于内外在的因素,产生了对教育惩戒的具体泛化和对执行中介权的误用与滥用。这不仅会影响教育惩戒权的合理运作,也容易影响到受惩戒者的身心发展和教师的权威实施。

(一)教育惩戒外在因素形成的具体泛化

当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时,会由于外在的环境因素产生对惩戒权力的泛化。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或学校自身的管理权限或义务的“下放”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与代行惩戒执行中介的班干部共同组成的学习共同体成员的认知对此的影响。表现在教师对代行惩戒的执行中介认识不清晰,和共同体对代行惩戒的执行中介的误解。

1.教师“授权”给班干部时的外在误判

教师与受教育者所共同形成的班级或学习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需求班规等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执行班级的日常规则,也是对学校的校规抑或教育法等行政法规的有效执行。而教育惩戒是协助实现教育目的^[6],依法(班规、校规等)对受教育者不合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制裁。当在学习共同体中的学生试图去违背班规、校规等,教师为避免失范行为再次发生,并重新促使他们产生合规则行为,必然导向教育惩戒。因此,教育惩戒不仅是教师的一项专业性管理职能,教师自身也具备这样的责任与义务。

在教育共同体中,教师具备实施教育惩戒的义务和责任,也需要教师以外的群体来协助其实施惩戒的行为。而教师在给班干部授权时,往往简单把某项命令交予他们,忽略了其同时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体身份。首先,中小学班干部不具备教师所具备的专业能力,不了解心理学、教育学等的相关原理,对于教育惩戒的意义、目的、技能

等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6]。因此,简单地让班干部们代行教育惩戒的职能,可能会对受惩戒者造成身心的二次伤害。其次,教师忽略了班干部们自身的认知水平和发展个性。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班干部对教师话语本身理解的偏差和误解。比如,有的班干部因为对教师布置的惩戒命令理解有误,进行二次加工,违背了原始的惩戒目的,而导致班上的同学遭受身心伤害等。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教师懒于或疏于去做具体惩戒监督,对班干部完全的信任,忽视了对执行中介的监督,从而导致班干部执行的惩戒行为过当,造成悲剧的发生。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教育惩戒的具体泛化,对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范围扩大化,影响教育惩戒的正当性,失去其内在的权威性。

2.共同体对班干部作为执行中介的误解

在中小学教育中,还会出现受教育者们把部分具有执行中介身份的班干部放置在与他们对立的位置上。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部分受惩戒者将班干部等视为教师的代言人,全盘遵守由班干部代为执行的教育惩戒,把班干部当做老师的“情报员”,划归到教师那一方,这一现象在小学阶段尤为明显。这就很容易忽略班干部所夹杂的个人化处理,也导致在共同体中受教育者的不平等地位,把班干部剥离了受教育者这个群体。同时,又因为班干部存在的个人化偏差,加剧了对教育惩戒的泛化,使得教育惩罚的行使权扩大化,极大地阻碍了教育惩戒的正常运行。

而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是部分受惩戒者拒绝这样的惩戒行为,他们认为班干部并不能代行教育惩戒的职能,但又不敢对教师“惩戒权”置喙,转而对班干部心存敌意,对班干部和教师形成隐形反抗,导致教育惩戒的弱化。这在中学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此时的受教育者处在青春叛逆期,容易产生对抗的心理或情绪,从而出现因班干部执行教育惩戒而报复班干部等行为。这就相当于在共同体内把班干部置于一个非师非友的境地,恶化了同侪间关系,影响共同体的健康发展。也就忽视了教育惩戒的真正来源,将教育惩戒执行的矛盾简化成为受教育者与班干部间的个人矛盾。此外,因班干部自身也是受教育

者,受惩戒者利用这样的同侪情谊,用拉关系、贿赂等行为来减免教育惩戒,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惩戒的实质功能,没有真正起到诫勉的作用。是故,经由教师、共同体成员等外在泛化后的教育惩戒,对教师权力、同侪友谊和教育共同体公正都造成破坏。这不利于受教育者自身成长,也可能对受惩戒者身心发展产生巨大的恶性影响,违背了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原初意义。

(二)对教育惩戒的内在“误”加工与“深”加工

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执行人的角色,二是受教育者的角色。随着时间、事件等的变换,既可能成为执行中介,也可能成为受惩戒人,这就容易造成身份转换时的自我越界。在作为班干部担任执行中介的角色时,代表了教师对教育惩戒的执行,被视为合法并合理。但若班干部滥用自己作为执行中介的身份走向一种经由个人误读或“深度”加工过的职能,就势必会走向教育惩戒的反面,成为个人谋私利或炫耀“权力”的畸形方式。

1.“误”加工——身份与工具化的二重奏

班干部在充当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时出现的“误”加工,首先可能体现在对“执行中介”身份的误解上。当教师发布一项教育惩戒的指示由班干部代为行使时,班干部有可能因自身的专业能力、知识储备、惩戒技巧等的缺失,产生对教师赋予的惩戒范围或惩戒意图的不理解而走向个人化的异化操作。这也是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一种权力越界,没有成为真正的执行中介,而是把自身当作了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权力者或代言人,于此便站在了同侪的对立面。这不仅剥离了与其他受教育者的友谊,也是对自我的认识不清。而这种以师之名的“老师叫我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规避误用后对可能产生的坏结果的不负责任。比如在2003年,某小学二年级的一位班主任因参加学校会议,叮嘱各小组长来维持纪律。学生陈某多次与同桌说话,小组长郭某在几次管教无效后,情急之下拿起课本猛击陈某的头部数下,致使陈某当场昏倒在地^[7]。无疑,作为班干部的郭某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的惩戒活动进

行了误判,把体罚当作执行中理所当然的行为,这也是对教育惩戒的误解,起到了坏的效果,甚至成为违法行为。因此,需要教师及时地干预或纠正,若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地默认或进一步授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教师的懒惰行为和渎职,违背了教师自身对教育惩戒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这种“误”加工还体现在班干部自身的工具化执行偏差,也正是由于这种工具化倾向,导致班干部对教师惩戒权的误解,易于把教育惩戒导向“体罚”等惩罚的措施,而不是意在阻止或戒除未来发生的可能。比如,在执行教育惩戒时,班干部容易偏向于个人化选择或者非理性化执行,呈现出对教育惩戒的滥用,造成教育惩戒异化。另一种情况是,教育惩戒本身没有问题,班干部执行时完全工具化,导致缺乏人性的空间,即为了惩戒而惩戒,也就失去了对违犯行为的戒除功能。这种类似于工具性的寻求,会导致完全的理性难以获得。这些班干部悬置了自己的学生身份,造成人的意义的不在场。这种手段式的方式,把人当成工具当成手段,其实是对教育惩戒的一种违背,只有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才是真正对教育惩戒的教育性的理性契合。

2.“深”加工——正义之名下的“合法”霸凌

教育惩戒在执行过程中的对象应是受教育者的特定越轨行为,而不能是受教育者个人或者身体、心灵^[8]。而执行中介的班干部往往在经过自身的深层次加工后,演化出“合法”霸凌的个人行为。这些现象在中小学比比皆是,如2018年报道过一则《小学班干部收受贿赂数万元》^[9]的新闻,安徽怀远县某小学的副班长以执行惩戒中介的名义,滥用惩戒以谋私利,甚至逼迫同学吃屎喝尿,而这些被恫吓的同侪们因为害怕被打而每次都按“要求”去偷钱,被家长毒打也不愿讲出实情。如此,这些被霸凌的同学不仅身体上遭受重创,在心灵上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不仅是对教师权力的僭越,更是已然触犯法律规定。长此以往,这种同侪的以正义之名的非法霸凌会影响到受惩戒者的学业、行为、人格及情绪的适应能力^[10],造成一系列的恶果。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绝不是个案,因为教师在面对班级管理

或者是行使教育惩戒的时候断然失去了基本的责任与义务,简单地将班干部纳入到执行惩戒行为的中介,而放弃了对执行中介本身的监督,因此造成了如此恶性事件。

经过班干部自我加工后的“合法”霸凌,往往以正义之名——“我帮老师去执行”或者“我替老师排忧解难”。此时的班干部断然把自己放置于权力的拥有者的位置,而不只是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他们变相地介入到教育惩戒权的范围中,违背了执行中介的职能。于此,便损坏了教育惩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教师自身的权威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应该找寻合理的因应之道来化解班干部作为惩戒执行中介的现实困境。

三、班干部作为惩戒执行中介的路径回归

既然班干部在实际的教育场域的确充当着执行中介的功能,我们应当正视这一实然存在,重新审视它对教育惩戒和教师教育管理的作用。由于内外在缘由对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影响,造成教师、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对班干部的误解,也造成班干部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不清晰。因此,在探寻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困境后需要从两方面去解决这一困境,一方面是外在力量的协同治理,另一方面则是班干部自身的内在成长,并最终达成教育惩戒的合理性诉求。

(一)外在于班干部的协同治理

班干部执行中介身份并非其天然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群体的赋予,而群体的成员包括教师与其他受教育者,也就是说首先需要取得共同体的整体认可,执行中介才能得以正常运作。这就需要教师的专业权威引导,把控在规范化的制度下合理运行。其次,是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对执行中介的同步监督和认可,以契约化的规则方式去促成其合理运转,以此保障具体的教育惩戒执行。

1.教师的权威引导

当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班干部等来具体地执行教育惩戒时,定然不可将

全部权力直接转交给这些未达到教师专业能力的未成年人,而是应该照顾班干部的心性,以此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去矫正和预防失范行为的发生。首先,教师要起到知识权威的引导作用。因为教师自身在实施惩戒行为时,都必须考量惩戒行为的合理界限,而像授权给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会存在逾越教育本质及惩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风险^[1]。所以,在合理的界限内,教育惩戒依据教师的专业知识判断,行使正当的惩戒权,不可笼统地交付给班干部去执行,避免在此过程中班干部的误读或过度解读。

其次,教师要发挥规范权威的引导作用。以规范性为基础,积极地监督管理并协同惩戒中介(班干部)的治理工作。教育惩戒自身即是对“个体表现不当行为或违反规范时,施予个体痛苦的经验,使其有良好行为表现”^[2],规范的裁定是教育惩戒执行的根本,所以,执行中介需要在教师的规范权威领导下,对执行行为的预判或裁定以规范的违犯为依据,才能保障教育惩戒执行的公正化。此外,教师作为管理者还需要施展管理权威的引导作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执行中介(班干部等)的观念进行转变,需要班干部明确自身的服务意识而非一般意义上执行惩戒权力的拥有者。只有服务意识的确立,才会对权力的思想进行阻隔,才能以正常的理解去面对和执行教育惩戒。在此,教师的管理、监督权力也不会丧失,在专业、规范、管理三个层面权威的引导下真正引导班干部等成为教育惩戒合理、合法的执行中介。

2.契约化团体生活的平衡

在学习或教育共同体中存在契约化的规则治理,是有鉴于中小学阶段受教育者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试图对偏离了原初教育惩戒的一种监督或制衡。一个有效的班级运行,首先它是和谐平等的团体,而教育惩戒意在阻止共同体中的违犯事件的不再发生,预防或阻止不适当的行为发生。当然,这不仅是对受罚者而言,也是对于学校的学习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而言。从最开始就需要创建良序的班级管理文化,通过每个共同体成员的参与,形成契约化的班规等班级文化。所以,在用班集体的规范和舆论对学生个体的违

规行为进行教育时,成为一种受教育者集体协同行使教育惩戒^[13]。在这样健康的舆论情势引导下,作为执行中介的班干部是很难作出逾矩的惩戒行为的,反倒更多地是发挥监督的职能。这不仅是对民主化班级生活的保证,也是对共同体中的成员之间的良性关系的保护。也正因为这种良序的集体治理,让班干部明确教育惩戒的实施是基于规则的治理,而不是单纯地上对下的执行,进一步明确“惩戒权”并非是至上的,而是需要群体的契约化的监督去平衡,从而确保程序的正义与合法(合规则)。于此,教师和共同体中其他受教育者共同构成了对班干部的外在引导和平衡。

(二)内在于班干部的个体寻求

自然,不仅仅是外在的力量就可以从整体上去改观班干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根本属性。也因为一直以来对班干部身份的误解与误读,以及自身天然存在的某些缺陷,仍然需要从班干部作为受教育者这一身份出发,对理性的自身和内在的道德立法提出要求,去实现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身份的科学化转变,朝着人性化的发展方向,并最终达成教育善的目的。

1.班干部的理性培育

教育惩戒意图通过对违犯行为的矫正来促成班级的规则治理和教育目的的实现,是要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善的成长,使其不断成为“人”^[14]。如果教育惩戒背离了教育的内在目的(促进人的个体内在成长),把教育惩戒当作某种工具化的手段,简单地通过惩戒来维护秩序或规则,也容易衍生出惩戒执行中介的非理性化发展,进而造成教育惩戒的失当。这就要求班干部还需要具备理性自主的能力,去调和一种工具化的命令。由于班干部在作为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这一执行人身份的同时还是共同体中的组成者,当受惩戒者违背校纪班规时,作为执行中介的班干部就需要理性面对自身需要执行的惩戒程度,做到不逾越教育惩戒自身,从规则出发实现实质的程序正义,即在良序的教育发展情势中,理性化理解并执行纪律,完成教育惩戒执行中介的使命。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也是在避免班干部在执行过程中不自觉地堕落成“平庸之恶”的助纣者,而是成为一个理性的反思者,绝不仅仅是命

令的执行工具。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班干部对教育惩戒的“误”加工和“深”加工所带来的恶性影响。由于班干部存在两种身份的转换,既作为教育惩罚的执行中介,也可能成为教育惩戒的受体,所以,更加要在成为执行中介的时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不断反思,成为同侪的榜样,最后完成理性化自身的成长。

2.班干部的“自我立法”

在契约化规则的治理下,仍需要班干部自身内在道德的发展,从内而外地配合教育惩戒执行任务。他们在作为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的时候,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内在的道德力量,为自我立法,遵循道德的法则,不逾越道德、法律、人性的底线。首先,在面向惩罚时,受罚者的人性受到尊重是最基础的条件^[15]。所以,班干部对受惩戒者(同侪)的人格尊重,表现在就事情或越轨行为而论,而不是上升到人格上的否定或者身心上的霸凌。永远把人(包括自身和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是手段来对待^[16],杜绝片面地维护所谓的秩序要求,真诚地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存在。

其次,基于人性及自我成长的需求,需要完成班干部的自我内在的教化转变,不断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来科学处理教育惩戒执行活动的边界。作为执行中介的班干部要理性面对和处理具体的情景,配合教师完成教育惩戒的目的,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完成对越轨行为的矫正和未来可能存在的越轨行为的警示。但同时具体的操作领域,又能更好地融洽师生之间及生生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有效的“粘合剂”去打破教育惩戒中师生间的传统壁垒,从共同体赋予的信任中把执行中介做到身份的最合理化。

当然,由于教育惩戒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更好地社会化^[17],即实现“成人”的最终教育目的,那么教育惩戒的执行中介应该时刻以教育目的为目的,在面对“越轨”行为时能够以理性的自身去面对每个具体的情景,遵循价值、理性、人性、科学等原则,做好执行中介的职责,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去繁衍“平庸的恶”。最后,教育惩戒在被班干部执行时更加要强调其教育性,契合共同体所构筑的集体文化和规则治理,达成教育善,保护每一位受惩戒者的身心健康和同侪之间的珍贵情谊。

参考文献:

- [1] 蒋一之,等. 惩戒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9-10.
- [2] 任海涛.“教育惩戒”的概念界定[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4):142-153.
- [3] 劳凯声. 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75.
- [4] 李荣灿. 教育,倾听心灵的声音[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2.
- [5] 董立山. 自治与法治之间——高校行使学生惩戒权问题研究[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9.
- [6] 王永胜. 教师惩戒权是不可转让的[J]. 中国德育,2018(8):9-10.
- [7] 解立军,王琳. 班干部维持纪律造成损害谁担责[N]. 中国教师报,2003-11-12(8).
- [8] 郑立平,张乐华. 教师必须掌握的教育惩戒艺术[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48.
- [9] 九州早行人. 小学班干部收受贿赂数万元,这大概是今生见过的最大的贪腐事件![EB/OL]. (2018-01-09) [2020-03-16]. https://www.sohu.com/a/215515315_100064566.
- [10] 张文新,纪林芹,董会芹,等. 中小学生的欺负问题与干预[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3-15.
- [11] 林宪聪. 教师惩戒行为与刑法[D]. 台南:台湾成功大学,2002:35.
- [12] 吴清山. 教师管教权责之探讨[J]. 初等教育学刊,1996(5):123-136.
- [13] 暴侠. 教师教育惩戒权行使的规范与协同[J]. 教育学术月刊,2019(12):65-71.
- [14] 卢世林,胡振坤. 教师伦理学教程[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95.
- [15]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82.
- [16] KANT Immanuel.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 BECK Lewis White, tran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1989:47.
- [17] 王辉. 论教师的惩戒权[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35-39.

On Alienation & Return of Intermediary Roles for Enforcement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aking Class Cadres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as an Example

XIANG D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discipline carried by educational discipline intermediary is meant to guide the disciplined person to behave in a normative manner. The intermediar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clude the educators who are legally empowered and the class leaders who are the recipients of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lack of complet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the ability to handle things in a rationalized manner, the class cadres are prone to abuse and misuse their status as intermediaries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m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lose its original edifying meaning. Therefore, when class cadres implemen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hey need to clarify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y and the purpose of punishment, and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eachers and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ir own “self-legislation”, truly seek the ra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class cadres as the intermediary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 the ultimate value basis for it,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sound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which will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scientific and well-ordere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Key words: educational punishment; educatee; class cadres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xecutive intermediary; disciplined person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职院校有效教学策略

张 海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州 438000)

摘要: 深度开展信息化教学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开展教学活动的必然要求,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学校信息化教学资源欠优、信息化教学机制不全,影响着信息化教学效果。开展信息化有效教学应设置有效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开发有效的学习资源、构建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整体水平,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

关键词: 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化教学;有效教学;信息化教学资源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迎来了重大的变革,将信息技术融入到职业教育教学过程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促使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内涵、方式、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人们对新事物新技术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也是遵循着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一般应用到深入应用的规律。职业教育工作者现在思考的不仅仅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应用信息技术的问题,更要思考如何使信息技术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促使两者深度融合、实现有效教学、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

二、信息化有效教学的意义

信息化教学是指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建学习情境,通过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

开展教学活动。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信息化教学活动中,所有的教学环节,包括观念、组织、内容、模式、技术、评价、环境等一系列因素都要实现信息化。

有效教学的理念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其核心就是要体现教学的效益,是指要在符合时代和个体积极价值建构的前提下,其效率在一定时空内不低于平均水准的教学。对有效教学的认知,不能仅局限于教师的“教”,更多的要体现学生的“学”,教师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活动中关注学生的进步和发展^[1]。

信息化有效教学这一概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信息化教学和有效教学两者的涵义来看,信息化有效教学就是指教师和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的双边教学活动,在互动的教与学的过程中,实现教学有效果、教学有效益、教学有效率。

高职院校承担为国家培养应用型、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在生产和管理第一线,因此对教学的有效性尤其重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使命就是要尽其

基金项目: 湖北省中华职教社2020年度调研课题项目“高职院校异地同步课堂有效教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HBZJ2020028)。

作者简介: 张 海(1969-),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所能地将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转化为为现实的生产服务的能力。高职院校从开展“信息化教学”到强调实施“信息化有效教学”,这不仅仅是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更体现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职业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2]。

三、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化教学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都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和深度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高职院校信息化课堂中,还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对教学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是信息化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能力决定了高职院校信息化教育教学开展的进程。很多高职院校在信息化硬件建设中投入力度很大,信息化硬件教学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改善,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反而成为影响学校信息化教学有效开展的首要因素。首先是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准,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由于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仍沿用单向传播满堂灌式的教学手段,没有找准位置,不能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协调者和咨询者。其次是教师的教育观念落后,对信息化教学的理解存在误区,对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使用存在偏差,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存在技术至上主义,把教育媒体等同于信息化教育,导致重技术、轻理论的唯技术论,不了解或没掌握如何正确使用信息技术,不知道如何选择和设计各种信息化教学环境,成了制约信息化教育推进的瓶颈^[3]。

(二)学校信息化教学资源欠优

信息化教学资源可以理解为是经过选取、组织,有序化的,适合学习者发展自身的有用信息

的集合。信息化教学能够上升为区别于传统教学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跟信息化教学资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为教学方式的变革提供了理想的支持环境。常见的信息化教学资源有媒体素材(包括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试题库、课件、案例、文献资料、问题解答、资源目录索引、网络课程等。高职院校在建设和信息化教学资源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息化资源滞后,硬件资源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没有实施数字化校园建设工程,存在网络覆盖比例低、网络不稳定、信息化教学设备老旧等问题,影响了信息化教学的开展^[4];软件资源方面,教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数量多但质量不高,资源建设不规范,与社会脱节,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影响了信息化教学的效果。二是信息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程度不高,特别是专业教学资源方面,各高职院校绝大部分专业教学资源都遵循以校为本、自主建设、校内应用的原则,没有实现与企业、行业 and 同类高职院校共同建设开发、共同分享应用成果。

(三)学校信息化教学机制不全

信息化教学不是一种教学工具,而是一种教学模式,高职院校要深入开展教育信息化,不能只是单纯重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把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模式、机制、评价都融入到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框架下。从目前高职院校实施信息化教学的现状看,学校普遍重视教育信息化,但缺乏顶层设计,没有建立健全信息化教学机制。部分高职院校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较低,相关政策不配套,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教育信息化研究、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信息化教学激励都没有实现常态化。由于信息化教学机制的不健全,阻碍了部分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5]。

四、开展信息化有效教学的对策

信息化有效教学,离不开教学环境、学习资源、教学评价和教学机制等几个方面。

(一)设置有效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信息化教学环境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础,

它既包括融合有信息技术因素的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教学平台、信息资源库、学习网站,也包括具有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基于Web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支持系统、电子图书馆等教学要素。

信息化教学离不开信息化教学环境,要有效开展信息化教学,设计有效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关键。在学校层面上,学校不仅要建设、完善信息化教学环境,还要加强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建设一批具有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理念和能力的师资队伍。

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教师是组织者、指导者和观察者,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在分析学情的基础上,为课程的有效教学设置有效的信息化教与学的环境。首先需要从分析高职学生的学情入手,为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习群体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选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组织形式。其次要根据专业的差异性、课程的实操性来加以区分,相应采用基于问题的、基于任务的、基于案例学习的、基于项目的多种混合教学模式,达到信息化有效教学的目的。通过发挥信息化教学的优势,将有效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融入重难点知识的讲授中,激发和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能力素养^[6]。

(二)开发有效的学习资源

在信息化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通过创建信息化学习环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开发设计出能够唤起学生强烈求知欲和充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学习资源就显得尤其重要。高职院校信息化有效学习资源的开发,一定要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岗位技能培养为出发点的资源建设理念,同时要体现直观、形象、具体、交互等信息化特点。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可以在现有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优化,挖掘出更优质资源,同时要加强与兄弟院校、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质量高、适用性强、内容新颖的教学资源。在自建、共建的基础上,要及时发现、挖掘市面上、网络上的优质资源,要善于运用校企合作中的企方资源,及时从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TED等国内外优质教学网站中下载能用、适用的优质

教学资源。

(三)构建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是为社会培养实用型、应用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要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加强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信息化快速发展助推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活动以信息化教学为主,传统教学为辅。传统教学活动是以教师为中心,学习活动在教师的组织下围绕课堂和书本进行,而信息化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是通过媒体手段或网络平台效应让学生求知、求异。同时信息化教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不接触教学的形式进行的,高职院校倡导的实践性教学在这种学习形式下难以开展。在这种教学环境下,要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可用、教学方法适用、教学资源实用、教学组织到位、教师传授有效、学生学习高质,就必须构建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来加以保障。有效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要从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学内容适宜度、课堂教学互动度、教学资源保障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构建。

(四)健全信息化教育教学机制

高职院校要实现信息化有效教学,就必须健全信息化教育教学机制,解决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形成统筹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合力。从《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可以看出,教育信息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作为一种实现教育改革的现代化工具,而是需要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从理念、模式、机制、评价等全方位构建教育信息化体系,从而形成新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新模式、新业态。高职院校要实现教育信息化,就必须在完善政策、健全机制上下功夫,这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健康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了信息化应用、管理、评价、保障、激励机制,才能从教育观念、教育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评价、教育环境各个方面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五、结语

构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教学模式,不

仅能丰富现有的教学资源,还能体现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有效促进教学过程中教和学的转变,随时随地实现教学上的沟通和交流,深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借助微信、QQ平台,师生可以完成课堂上无法实现的沟通和交流,课堂教学形式也得到更多的扩展。将传统教学形式和互联网技术优势结合起来贯穿到教学过程中,调整和转变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式,营造和谐共振的师生课堂氛围,不仅能有效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

高,而且对于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云计算、超媒体、5G移动新技术等信息技术逐步融入到教育教学中,深入开展信息化教学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方式。高职院校只有积极探索有效的信息化教学途径,才能更好地提升学校信息化教育教学整体水平,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参考文献:

- [1] 潘菊素,刘锐. 基于智慧教学环境的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策略[J].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4):25-27.
- [2] 李燕华,刘晓佳. 高职院校“视听说”课程信息化教学设计探究——以 Jobs and Places of Work 教学单元为例[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0(4):27-28.
- [3] 陈君涛,展金梅. 智慧教育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性研究[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0(12):35-37.
- [4] 覃锡定. 信息化背景下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和教师角色的变化[J]. 中国校外教育, 2019(36):33-34.
- [5] 王爽,王争艳,李永强. 高职教育信息化教学设计策略探究[J]. 南方农机, 2019(21):31-32.
- [6] 仲小翠. 论高职院校学生的信息化素养的提升[J]. 科技视界, 2018(26):37-38.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Modern IT Environment

ZHANG Hai

(Huanggang Normal College, Huangzhou 43800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arry out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profoundly. However, the lack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resources of colleges and teaching mechanism affect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o carry out effectiv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he effective environment,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train qualified personnel for the country.

Key word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effective teaching;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以山西为例

蔡伟发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当前山西正面临着“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的重大经济发展任务,如何通过课程改革培养人才,助推山西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是当前山西高职教育的重大任务。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应满足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全面塑造、培育学生从理论高度理解和参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经济现象三个方面的要求,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的问题,从构筑新的课堂精神、立足新的课堂需求、打造新的课堂内容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关键词: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内陆省份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内陆各省纷纷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山西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先天的自然地理劣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全国排名靠后,在中部地区也属落后,要从根本上促进山西地方经济的转型与发展,需要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着手,为山西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尤其应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基本导向。

二、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 对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 课程体系的新要求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先修课程。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校要立德树人、贯穿思政工作的要求,回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应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新要求。

(一)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全面塑造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公共基础

课后,首先接触到的专业课程就是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下,容易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无形中提高了思政教育的难度,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又具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因此必须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教学改革重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教育指向,取西方经济学理论之精华,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全面塑造。

(二)培育学生从理论高度理解和参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庞杂繁复,需要通过经济理论的系统性构建,既突出该课程的应用性,又结合中国的独特经济实践,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能够运用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利用规律指导经济行为,真正做到人才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

(三)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经济现象

近年来西方教材多使用相对简单的曼昆版本,但其中案例多介绍国外经济,与我国情况差别较大;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多使用高鸿业版

作者简介:蔡伟发(1960-),男,湖北黄冈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本、马工程版本,偏重经济理论,以案例形式在个别章节介绍一些国内经济现象。若照本宣读,则学生学完后对现实的国际国内经济现实仍不清楚。对经济形势和产业格局都不了解,又谈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正确分析经济现象、进而服务地方经济。

三、服务地方经济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仍以理论讲授为主,无法很好地回应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学生价值观塑造仍然缺失

近几年不少高校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在价值观塑造方面做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其他课程的课程思政内容融入仍然比较牵强,西方经济学课程也是如此。高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教案、进课堂,合理融入价值观教育。

(二)理论学习不够深入,从理论高度理解经济现实的能力仍然不足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通过一到两个学期的学习,培育学生经济方面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相应的基础。但由于概念抽象、与技能实操联系较少,学生在学习时有一定畏难情绪。同时教育部统筹课时压缩后,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相关技能的实训及参与社会实践,但内容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在有限的学时里无法扎实完成。

(三)考核方式较单一,不能主动思考和分析经济现象

由于西方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管理类本科阶段最重要专业基础课之一,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之一,虽然可见其重要性,但是也导致这一课程的学习是指向应试的,尽管有一定比例的开放性题目,但也必然规定了标准化的回答范式。这对于知识的巩固固然是有利的,但对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应用能力显然是极不足的,更加不能回应服务地方经济的需求。

四、从服务地方经济的导向出发,构建西方经济学课程新的课堂结构

(一)构筑新的课堂精神,全面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服务经济发展的人才,首先是有着正确价值观的人才。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合理渗入,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正确的经济价值观,能在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负面冲击时具备基本的辨别力和抵御力,是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课题。

课堂是塑造学生价值观的主渠道,从课程内容来说,仅仅在各章节中加入一些批判性的内容是比较生硬的。要围绕“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四个方面,构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指向的新课堂精神,将课程思政自然地融入到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全面塑造学生正确的经济价值观。应该在课程开始就提纲挈领地进行输入。比如,在导论之后增加一章内容,简要但系统地介绍经济发展史,尤其系统介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并与世界上主要国家进行对比,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必然能够增强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还可以通过对比美国产业的衰退和中国产业的蓬勃兴起、对比欧美国家的“逆全球化”现象和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主动拥抱全球化,说明到今天我党仍然强调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样的教学安排,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到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的艰苦奋斗和不断革命,潜移默化地强化学生对我党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正确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经济现象,基于理论知识的学习思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更加增强政治认同、国家意识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不仅要在开篇提纲挈领地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更要在各个章节进行价值观融入,以此思路全线贯穿,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紧跟经济热点、提升政治素养,辩证思考西方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

(二)立足新的课堂需求,以适应就业市场需求为基本指向

虽然近年来山西经济发展提速,但是企业数量、对外贸易量等指标在全国都处于相对低位,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2021年省内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超过23万,就业形势仍比较严峻。同时,山西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时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的重大要求^[9]。山西经济亟待转型,如果还是以老的课堂设计、老的教学方法讲授经典理论,学生在今后必然无法适应转型期和转型后的就业市场新需求。因此,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堂需求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要适应就业的需求,更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首先,及早培养就业意识。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学生进入大学不久,普遍对就业形势和就业规划概念模糊。虽然高校基本上都设置有就业指导课,但就业指导课程教师对专业不熟悉,而在专业课上进行就业意识的引导,就更有现实意义。如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当前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比较,使学生了解自身专业的学科定位和最新的产业动态,在了解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初步思考职业规划。

其次,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一些适合展开分析的知识点设置一到两个“任务驱动”,以形成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比如在均衡价格理论中,减少诸如“洛阳纸贵”等经典案例介绍,而设计若干联系实际“任务驱动”,让学生分组讨论,形成分析报告。“任务”一般设置成对学生而言比较大而陌生的问题,如房价的形成,需要学生分工协作完成,住房的需求、供给、政策影响等都需要搜寻大量资料,再结合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结论,然后回到课堂上分享观点。这样的“任务驱动”,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更多可能性。这种场景设计,实际上也模拟了一些企业招聘中的无领导小组面试场景和一些中小企业在面临问题时的头脑风暴场景,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新事物的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其就业的竞争力。

(三)打造新的课堂内容,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

尽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部省份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即便在中部六省中,山西省近年来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等指标仍然较落后,转型发展更加有紧迫感。这对山西省高职院校的建设也提出了相应的迫切要求,要为山西经济发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建设者。

由于学时的压缩,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宜在硕士阶段展开,高职院校的教学应该作为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展开,着眼于基本概念的介绍、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思维方法的培养以及应用能力的发展。

首先,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在课时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对内容进行取舍提炼。微观部分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宏观部分帮助学生理解国家主体的经济行为,其中的章节又往往不可或缺,必须要合理划分课时,既提炼必要的基本概念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又建立章节间的内在联系,以使各章的知识点形成有机整体,为后续课程和理解现实经济活动打好基础。

其次,帮助学生养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培养创新型人才关键在于开启新的思维方式。经济学是新兴的融合性学科,纳入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把这门课讲授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多元学科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同时这也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思维性学科,比如把许多问题量化为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可以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另外,还有均衡的思维、边际的思维、强调合作减少对抗的博弈思维等,都是经济学独特的思维方法,养成了这些思维方式,能帮助学生在更高层次上去审视经济现象、分析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理解企业经营活动。

再次,帮助学生培养经济分析的能力。

经济分析能力应该包括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数据的筛选与分析、各种政策的分析、国际环境的分析。虽然学时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可以以专题或作业的形式,适当引导学

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比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教授学生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等公开数据资源搜索相关数据,增强对GDP等指标的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GDP中第一、二、三产业的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指标的变化,了解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和产业演变。又如在经济周期中,引导学生探索中国是不是存在着经济周期,进而思考经济周期的一般性和在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周期对自己未来就业的影响。

以上两例在笔者的实践教学中采用后效果良好,学生普遍对中国经济、地区经济和自己家乡的经济情况有所熟悉,更有不少学生基于此分享了关于家乡经济建设或创业的创新性想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9(1).
- [2]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2019-3-19(1).
- [3] 楼阳生.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J]. 前进,2020(6):12-15.
- [4] 王万光. 西方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初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问题及其课程思政教学设计[J]. 大学教育,2019(8):138-140.

在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学科建设中,即使是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也要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根本指引。

五、结语

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在培养人才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服务地方经济的导向性,实质上对课程提出了要全面塑造学生价值观、培育学生从理论高度理解和参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经济现象的新要求,必须通过构筑新的课堂精神、立足新的课堂需求、打造新的课堂内容,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On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CAI Weifa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43800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Shanxi is facing great economic task of “taking the lead in exploring a new road i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ow to cultivate talents through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xi economy is a major task of Shanxi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western economics should meet the three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ly shaping students’ values,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participate in general market economic activities theoretically, and guiding students to actively think and analyze economic phenomena.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n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building a new classroom spirit, keeping on new classroom needs and creating new classroom content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ing local economy; western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视频在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的三重逻辑

王浩岩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0)

摘要:随着网络的全覆盖、多媒体技术的普及,视频在思政课教学中被广泛采用,并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视频能广泛运用于思政课教学中,是基于其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体现其在思政课教学中的有用性、基于其选择的原则性、赖于其对现实中矛盾关系处理的合理性。

关键词:视频教学;思政课;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G434,G641

文献标识码:A

视频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插播辅助短视频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效果的一种授课方式。本文的短视频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插播的、与教学内容高度相关的视频,不包括慕课视频。视频教学往往能起到教师“裸讲”难以达到的效果。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全覆盖、多媒体技术的普及,视频在思政课教学中被广泛采用,并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就有必要对视频教学的有效性、原则性、现实可能性等进行研究和剖析,为思政课教师理直气壮地运用好视频教学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规范性依据。

一、价值逻辑:思政课中运用视频教学的有效性

视频教学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帮助思政课教师达到教学目标,比如视频教学可以构建思政课现代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视频教学更遵循学生特点和成长规律,便于培养时代新人;视频教学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较好达到教学效果。

(一)转变教学话语的一种有效形式

思政课要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双重

任务的愿景,就必须探索合适的教学话语,对教材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使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使传统教学话语向现代教学话语转变。在传统教学体系中,教师口头讲授、粉笔板书等是主要的教学话语,这些教学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时代到来,信息化、网络化交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交流方式,传统的话语体系不再满足思政课教学的要求,也难以胜任新时代思政课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在互联网时代,受教育者更倾向于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新媒体互动代替线下的主题学习、谈心谈话等活动”,思政课应该“借助网络中的有声视频、无声图像、数字、符号等新型网络话语元素,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更加鲜活、接地气,贴近学生现实生活”^[1]。“有声视频”是现代教学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合理运用,能克服和填补思政课传统教学话语的缺陷。

2020年9月22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召开,这次辩论会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各国领导人的讲话都是通过播放事先录制好的短视频来呈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视频讲话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评价,让世界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对外举措、加深对人

基金项目:2020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基于‘学习强国’APP创新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YB216)。

作者简介:王浩岩(1956-),广东广州人,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职教育研究。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看到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总书记的视频讲话是一种新话语方式,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典范。思政课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阵地和载体,更应该创新其话语方式,充分发挥视频、音频、图像等现代教学话语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作用。

(二)契合了学生的接受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主体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接受主体的有效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是“接受主体出于自身需要,在环境作用影响下通过某些中介对接受客体进行反映、选择、整合、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联结的、完整的活动过程。”^[2]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认为,受众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思政课教学的受众是新时代大学生,他们对思政课程内容的有效接受,可以实现教育成果内化并进一步外化为行动。

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要使受众接受,首先要了解受众的需要,然后才能推动接受的进行。因此,教师要掌握思政课受众也就是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成长需求,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回应学生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大学生的个体意识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善于表达个体想法,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持审视眼光和批判态度,对传统的说教方式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因此,个性化、时代感强的短视频,更容易受到他们的青睐,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也更容易直击其心灵从而产生认同感。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而教学内容是客体,教学目的就是将教学内容即客体主体化。在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中,短视频作为教育介体,更好地呈现了教学内容,契合了受众的接受特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教师组织课堂讨论的最佳素材

要实现思政课教学目标,达到教育目的,就必须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3]从教育教学发生作用的过程来看,

师生双方作为教学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是人的因素,方法是中介因素。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实现,既取决于教师的教育活动,也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接受活动,不会选择和运用方法,不讲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难以在教学主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教学目标就难以实现。课堂讨论法具有民主性和自由探索性的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要组织好课堂讨论就必须有合适的素材。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以教材某个内容或某个静态案例为素材设置讨论话题,但因为没有情景感,学生代入感不强,讨论效果不尽人意。一句话、一张图片、一个案例或者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成为教学讨论的素材,但相比而言,短视频信息量大、表现力强、直观性好,在创设教学情境、反映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引起学生共鸣上具有其他素材没有的优点。

二、理论逻辑:思政课中运用视频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视频教学作为教学方法、教育介体,在呈现教学内容、发挥教学主体能动性以及实现教学目标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作为政治性理论性很强的思政课,运用的短视频应该注意视频来源的权威性、视频内容的价值性、视频类型的多样性和视频嵌入的贴切性。

(一)视频来源具有权威性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涉及到“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政课是一门非常严肃的课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导向性和目的性非常强。因此在选择视频时,要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4]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错综复杂,思政课就是要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互联网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而网上短视频良莠不齐,因此,教师在进行视频案例选择时要注意视频内容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确保短视频来源的权威性。目前,随着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各种国家权威媒体及网站上的相关视频越来越多,如中宣部创建的“学习强国”APP及央视影音等,有很多适合教学使用的短视频,这些短视频制作精良,内容政治性强,具有极强的权威性。

(二)视频内容具有价值性

“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5]。视频教学既是一种教学介质,也是信息展示的一种载体,所承载的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因此,教师在运用视频时,要避免庸俗、低俗、媚俗视频,要避免视频内容的娱乐化、庸俗化,一定要确保视频内容对受教育者的价值引导和价值塑造,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思想基础。

视频内容的价值引导体现在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和规范个体思想和行为。引导政治方向就是所选视频要能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教育和引导,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式使受教育者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精神动力,就是通过充满正能量的视频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其实现人生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和规范个人行为,就是通过视频内容对大学生的气质、性格、动机、兴趣等内部倾向和心理特征进行引导,丰富其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并将内化的道德品质和理论修养作为日常行为标准,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三)视频类型具有多样性

视频类型的多样性,既是指视频种类多样,也是指视频的表现形式多样。短视频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和重要的教育介体,其多样性取决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以及思政课教育主体的个体性。就思政课教学内容多样性而言,教学视频应该多样化。思政课教学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多彩,且时事性较强,因此,视频的类型也应该是多样的。“学习强国”APP中的短视频内容全面、种类繁多,契合了思政课教学视频多样化的需求。

就思政课教育主体的个体性而言,教学视频也应该是多样的。从终极意义上看,开设思政课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会越来越明显。大学生作为思政课教育主体之一,必然具有多样化、层次性的目标需求,这些目标需求也是大学生的主体性的体现。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思政课教学内容需要在统编教材基础上进行分解和重构,既确保教材的统一性,又能因材施教、按需施教,体现多样性的特点。灵活机动、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短视频正好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如“学习强国”APP“百灵”这一栏目中的视频以“炫”“彩”“竖”“窗”“藏”“靛”等表现形式深受众多大学生的欢迎。

(四)视频嵌入具有贴切性

视频嵌入具有贴切性是指用于教学的视频既要贴近社会实际、体现与个体需求相契合、凸显思政课的价值关怀,又要契合教材内容及相关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教师能够在恰当的地方运用恰当的视频,从而为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服务。

一是教学视频要贴近社会实际,抓住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困惑。即所选视频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就,也要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正确剖析,旗帜鲜明地对一些错误言论和思潮予以有力回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为学生答疑解惑,帮助学生找到其所关切的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二是所选教学视频与教材内容具有紧密契合度,不能为了看视频而看视频,要使所选视频能够说明教材的某个内容、解释所学的某个原理或阐述某个问题。三是教师插播视频要恰如其分,在该插播视频的时候插播视频。例如,在讲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时,可以插播“百团大战”的短视频;在讲述生态文明建设时,可以插播“习近平‘两山’理念改变中国”“绿水青山十五年”短视频等。

三、实践逻辑:思政课中 视频教学的实现途径

在遵守视频教学选择、嵌入原则的基础上,

实现视频教学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使思政课达到教学目的,需要在现实教学过程中,解决好视频内容与教材内容、视频播放与教师讲授、视频观看与学生参与等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视频内容与教材内容的关系

思政课统编教材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精心编写,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治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内容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既为教师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框架,明确了教学方法,也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指引。但是,无论教材内容多么的“教学化”,都不能自动成为教学内容,教材内容是静态的,是对教学内容的某种预设。教学内容是教师经过教学设计形成教学方案,再到课堂实施,经过层层“工序”才最终呈现的。教学内容是教师对教材内容的个性化演绎和创造,是对教材内容的二次创造,因而是动态的。

教学短视频是用来辅助教学的,是教师经过认真挑选、精心设计的教学情境和教学案例,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教学内容饱含着教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教材内容的动态化表现形式,教学视频是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万变不离其宗,教学视频与教学内容一样要以教材内容为依据,为遵循。为使视频内容与教材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内在的统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视频内容要符合教材内容,能为整个教学过程服务。视频内容如果不符合教材内容,就会把学生引入“歧途”,学生就会感觉自己在“坐飞机”“听天书”,不知道学习了什么,就不能实现思政课的教学目的。二是视频内容要为教学重难点服务。思政课重难点知识,是学生要掌握的知识要点,视频教学要起到让学生易于理解、易于记忆、易于内化的作用。三是视频内容的时长不能过长。视频内容过多、过长就会冲淡老师对教材内容的讲解,思政课的学理分析、理论阐述、真理传播的力度就会削弱。

(二)处理好视频播放与教师讲授的关系

教师讲授法是指教师运用口头语言向学生进行示范、呈现、讲解和分析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是目前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最常用的方法。教师讲授是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既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效率,也可以帮助学

生全面、深刻、准确的理解教材内容,对教材的逻辑结构有整体性的把握,同时也可以真正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讲授时透出的真善美及世界观对学生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学生角度来说,教师讲授是一种接受性的学习方法,学生只有学会了“听讲”,才有可能自觉系统地将教师的教法内化成学法,从而学会学习,掌握各种方法。但是讲授法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它容易使学生产生错觉,认为认真听讲就可以直接获取全部知识,从而忽略了思考在学习知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二是教师讲授容易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容易抑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讲授法运用不好容易演变成满堂灌,使学生产生厌倦心理。

视频教学具有直观性、交互性、动态性的特点。视频教学图文声像并茂,音频视频并重,使课堂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可以多角度调动学生的情绪和兴趣,同时使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变得直观形象,更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播放视频案例之前,教师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引起学生思考,使其将学与思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5]。教师在教学中将讲授法和视频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既坚持“灌输”又注重“启发”,达到单纯的讲授达不到的效果。要处理好播放视频与教师讲授的关系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做好教学设计,安排好教学步骤,根据教学内容精选教学案例,使授课内容与教学视频衔接自然,逻辑合理;二是每堂课视频播放不宜过多,频繁播放视频会打乱教学节奏,破坏教学活动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三是每个视频播放的时间不宜过长,视频播放时间过长,就占用了讲授的时间,教学就会成为“电影课”“视频课”。

(三)处理好视频观看与学生参与的关系

思政课堂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平等对话的关系。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其课堂参与度上,参与度越高,其主体意识越强,就越容易形成教学主体双方之间的

良性互动。学生参与度是衡量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主导性与主体性是否达到统一的标志。因此,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切实打造双主体课堂,是思政课教师孜孜不倦的追求。

让学生参与课堂,需要教师设置相应的情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播放教学视频,通过视频教学案例设置有利于学生参与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共同思考视频中涉及的理论热点、社会难点问题,经过讨论表达相应的看法和意见,达到参与课堂教学的目的。处理好视频观看与学生参与的关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学生观看视频的目的,是通过形象直观的声光电展示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信息,从而对课程内容有更深入、更具体的理解,增强其参与课堂的吸引力,提高其参与课堂的获得感。二是观看视频是为学

生参与课堂讨论服务的,学生观看视频后,教师结合课程内容,设置好问题,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更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欲望。三是观看视频不能挤占学生讨论的时间,视频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既不能挤占教师的授课时间,也不能挤占学生的讨论时间,只有确保课堂上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围绕教学内容进行讨论,才能更好地起到思政课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通过视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体现了思政课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建设要求。课外教学实践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而利用一些典型视频案例开展课内教学可以跨越时空,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既节约时间也惠及全体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思政课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 邓鹏,陈树文.网络话语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9):103-107.
- [2] 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1.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13.
- [5]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Three-fold Logic of Video Teaching Application in Ideological &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ANG Haoyan

(Guangdong Urban Construction Technician College, Guangzhou 51051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Video teach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and shows a trend of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The reason why video teaching can be widely us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is based on its ideolog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which reflects its usefulnes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its principle of selection, and depends on its reasonable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in reality.

Key words: video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deolog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对外传播视角下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

王赛君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来华留学生是传播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身份定位、语言沟通和理解互通方面都具有巨大优势。本研究从培养学生“愿意讲”故事的情感、完善故事体系使学生“有故事”可讲、创新学生“如何讲”故事的能力三方面出发,构建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这不仅能帮助来华留学生实现个人成长,也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还可借助宣传中华文化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留学生;中国故事;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度与认同感与日俱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成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宣传部门的重要使命。来华留学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者和中国故事的国际讲述者。以来华留学生的特点和实际需求为基础,构建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对提升国家正面形象大有裨益。

一、高校培养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

(一)有助于更好地对外展示中国形象

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外交往的生力军,人数众多、思想活跃,在语言、文化、媒介资源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用国外受众最能接受和习惯的方式、语言和思维,准确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

(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来华留

学生教育伴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发展壮大。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齐头并进,也使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帮助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既能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实力和新成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需要。

(三)实现来华留学生个人成长

来华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国,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深受本国国情和文化的影响,非常容易产生“文化休克”现象。帮助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在此过程中使他们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地理、社会、经济等基本国情,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留学生更快地融入中国社会,提升全面素质,促进个人成长。

二、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我国高校学习语言、文化和专业,他们为中国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提供了人才支持。来华留学生也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讲述者和中国国家形象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21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跨文化适应背景下来华留学生‘五位一体’文化育人平台构建研究”(项目编号:KT20213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赛君(1989-),女,浙江金华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留学生教育、跨文化交际研究。

的宣传员^[1],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塑造和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和作用。

(一)来华留学生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身份优势

来华留学生既是中国故事的接受者,也是中国故事的对外讲述者。他们来华或是为了了解中国,或是来中国寻求发展空间,而无论是哪种动机都能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认同。另一方面,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来华留学生与自己的同胞既有血脉关系,又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对中国故事讲述的内容、方式、评价都比中国人和中国媒体的宣传更令人信服。

(二)来华留学生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语言优势

首先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精通所在国语言,而所在国里有很多非通用语言,这些语言在中国高校并未开设相关专业,想要准确传播具有难度。另外,作为媒介的话语转译者需处理理解、内化、传达这三个环节^[2]。中国故事讲述者既可以是会说外语的中国人,也可以是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前者善于理解,后者则擅长传达,一般来说,精准传达的难度远大于理解的难度。因此,来华留学生在精通母语、通晓汉语、了解文化的基础上,在讲好中国故事时会更有优势。

(三)来华留学生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行为优势

相比枯燥的文字讲解和没有共鸣的电视、网络视频,来华留学生借助新媒体的优势,通过亲身体验,用实例向本国人民讲述中国故事,更具真实性、及时性和交互性。比如在学校开设的“第二课堂”活动中,组织留学生走进快递物流园区感受互联网经济下的快递智能化发展,来华留学生可以把机器人全自动分拣包裹的照片、视频发给自己的亲人或者国外媒体,再配上音频介绍,他们所讲述的内容和形象就更客观,让人信服,讲述效果也是媒体宣传难以比拟的。

三、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构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中

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使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为此,从“愿意讲”“有故事”“如何讲”三方面构建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更好地宣传中国国家形象。

(一)培养留学生对中国的情感,使其“愿意讲”故事

要想让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让留学生从心底里喜欢中国是前提。学校是留学生眼中“中国”的缩影,留学生喜欢自己的学校,喜欢在留学城市,才会乐于与别人分享留学城市的地方文化、发展故事。因此,高校要注意“润物细无声”,在课堂教学和校内外实践中融入向上、向善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等育人元素,在语言相合、文化应合和情感融合中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度。

不少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生活一段时间后,对中国的形象有很大的改观,对中国的好感度普遍提升。因此,高校在招收、培养、管理留学生时应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他们提出的质疑,坚持平等、规范管理,坚持严格培养,同时关心爱护他们,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换位思考,温和引导,于细微处、于无形中逐渐培养留学生对中国的情感,培养更多专业知识扎实、学业能力过硬、知华友华亲华的来华留学生。

(二)完善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体系,使其“有故事”可讲

1.把握内容主体

中国故事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括性概念^[3]。讲好中国故事,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首先,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故事的根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武术、中医等都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高校要以故事的形式,将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讲述清楚,比如正直、仁爱、诚信、忠孝的美好品德,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以及仁者爱人、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等,增进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拉近他们的文化和心理距离,同时起到思想育人的作用。其次,中国道路的开创、中国奇迹的取得是中国故事的现实主体。高校

应该让留学生了解中国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深厚历史渊源,用生动的语言阐释、传播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道路及制度,主动、客观地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如奥运会、世博会的召开,“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成立等,还应介绍中国在国际上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等。第三,地方文化、校史校情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化是留学生来到中国后感受到的最真实的母语国家文化^[4],对留学生学习、生活和跨文化适应的影响不言而喻。加强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讲清楚学校的历史发展、校园文化等,也能帮助培养留学生的归属感,甚至影响留学生毕业后持续保持对母校的关注。

此外,还应结合热点、典型案例,丰富中国故事的现代发展和应用。如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抗疫故事和“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让学生在学的过程中感知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在现代大事件中的应用和影响,深化对中国故事的认知。

2. 重视课程建设

语言是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汉语学习不仅能提升留学生的语言技能,也能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使其在学习过程中重构身份认知。为此,高校应首先合理安排汉语学习,增加汉语课程门类和课时数,这也是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的第一步。此外,在开设相关课程如“中国文化”“中国概况”等时,应根据教学对象的背景、专业需求等对课程做适当的内容增删、顺序调整;还可以设置文化专题讨论,帮助留学生解读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与中国发展进程;布置写作任务,引导留学生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此外,开设书法、剪纸、国画、空竹、茶艺等中国文化选修课,丰富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体验。

3. 丰富课外实践

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和故事来源不应只拘泥于课堂与教材,要为留学生直接接触中国社会创造机会,鼓励他们走出课堂,进行真实的交往和互动,全方位、立体式地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在校园内,可

以通过社团活动鼓励留学生丰富课外生活,加强与中国学生的来往,从中亲身了解中国故事;学校也可以举办国际文化节、校园好声音、中秋晚会、新年晚会、字谜游戏,让留学生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增进了解。其次,引导留学生走出校园,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和想法,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比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专业需求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需求,每年组织留学生参观新农村建设、认知地方企业的发展历程等,还曾组织学生参加义乌市政府举办的划龙舟大赛,感受端午节氛围,从而使他们直观、亲身感知中国新故事、真故事。

(三) 创新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解决“如何讲”问题

留学生既是中国故事的第一批倾听者,也是第一批讲述者,他们会把中国发生的故事传达给所在国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既要保证留学生对中国故事理解的准确性,又要保证他们传播中国故事的有效性。

1. 提高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和水平

高校在留学生教育过程中,要用留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用他们能听懂的经典故事来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寻找不同文化中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异同,积极寻求文化契合和情感共鸣。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口头讨论、书面写作等方式,鼓励留学生以小见大,考虑本国受众的习俗和思维方式,精心选择小故事,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基础,创作新故事,诠释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

2. 因“人”制宜,研究如何让每个留学生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

一是要进一步发挥学历留学的作用。学历留学在中国学习时间长,专业水平相对较高,“中国概况”“中国文化”等课程的学习也更深入,对中国更了解,更会讲述中国故事。二是要发挥“领袖型”留学生的作用。留学生群体中有部分具备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学生,他们的看法、评价会影响周边群体,更容易在中外交流舞台上起到积极作用。注意这一部分学生的作用,不仅有利于目前的国家形象传播,也有利于未来在世界舞台上讲

好中国故事。三是要重视校友资源。来华留学生校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毕业后也依然带着中国记忆,并不断创造着新的中国故事。为此,高校可以建立校友联络数据库,保持与校友的长期联系,定期开展校友活动,增强留学生校友对中国文化的融入感和认同感。四是根据留学生来源国、汉语水平和专业特长的不同,分层分类加以引导,力争让每个留学生都可以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

3.搭建立体化对外传播平台,加深中国故事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在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传播也不应拘泥于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而应该与时俱进,提升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和有效性。在有效运用传统媒介,如书本、电视、报纸等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新媒体

的使用,并根据传播受众的个体差异性优化媒体的组合选择,开发地方文化传播的互联网平台和在线课程资源^[9],加强互动,从而扩大影响力和传播效力。其次,要为来华留学生直接接触中国故事创造机会,鼓励他们走出课堂,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比如有留学生表示了解红糖制作工艺是因为参加了学校在实践周开展的走进新农村活动,熟知骆宾王等地方名人是因为参加了诗歌朗诵比赛等。通过这些活动,留学生表示更能直观感知地方文化,了解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国家形象,除了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还应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共同体”。引导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应把握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优化故事体系,组织故事载体,丰富故事内涵,奏响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合唱。

参考文献:

- [1]亓雯雯,李晓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动态研究[J].国际公关,2020(7):5-7.
- [2]牟蕾.“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及传播[J].青年研究,2019(5):86-93.
- [3]袁海萍.刍议向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J].新课程研究,2016(12):20-22.
- [4]刘福来,李东斌.地方高校地域文化育人体系的探索[J].社会科学家,2016(1):157-160.
- [5]巫群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下的留学生五位一体育人平台创建研究[J].通信与信息技术,2019(5):66-68.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Way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ANG Saiju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Abstract: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are a special group who can spread China's image and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They have great advantages in identity positioning,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 paper a good way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cultivating students' emotion of willing to tell stories, perfecting the story system so that they have stories to tell, and cultivating and inno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how to tell stories.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better present China's image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national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China's stories; path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严娟

(武汉商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均有正向影响。更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关键词:环境信息披露;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高速增长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数量上的快速增长为主,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了数量短缺的问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注质量和效益,创新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对企业来讲,创新对获取竞争优势、提高企业价值尤为重要^[2]。近年来学界针对创新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反腐败^[3]、政策不确定性^[4]、高管团队的稳定性^[5]、风险投资^[6]、企业并购模式^[6]、实体企业金融化^[1]、家族企业二代涉入^[7]均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这些文献围绕企业创新,讨论了各种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问题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201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进行了较大的修订,表明国家对保护环境、改善环境、防治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心。201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市场主体应当健

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2020年11月,中国环境记协与北京化工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9年度)》,该报告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升。这表明随着我国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重视程度的提高,许多企业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同时,加强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必然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带来一定的影响。

为了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当审计事务所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更强;当分析师对公司进行跟踪分析并出具报告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已有关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关注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一特殊影响因素,本文从资源依赖和信号传递的视角出发,拓展和加深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

作者简介:严娟(1978-),女,湖北鄂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职教育研究。

广度与深度。其次,现有研究关注了舆论监督与政府监管^[8]、异质性债务治理^[9]、银行贷款^[10]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较少关注到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经济后果,本文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有一定的参考性。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已经成为企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8]。企业在通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树立良好形象的同时,也通过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打开了另一扇与利益相关者对话的窗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一方面,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能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影响。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与支持,没有一个组织是完全独立的,组织嵌入在由其他组织组成的环境,组织依赖于其他组织所提供的发展必需的重要资源。组织的生存和成功依赖于所处的环境,组织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11]。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帮助企业改善融资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使公司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高的融资金额^[12],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我们认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此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能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影响。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如果企业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出了自身较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号,企业往往可以借此树立较好的社会形象^[13]。实质上,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衡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以及承担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14]。企业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整体价值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15]。环境信

息的披露降低了企业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了企业与客户、消费者、投资者、雇员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传递了企业重视环境保护、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信号,在受到利益相关者监督的同时,也得到了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此,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收入水平,使企业进入良性循环,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此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的主假设:

假设 1a: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入。

假设 1b: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12-2017 年我国沪深 A 股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需要,对样本数据作了以下处理:1.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的公司;2.剔除当年度上市的公司以及被证券交易所特殊处理(ST)的公司;3.剔除主要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如下:1.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德(Wind)数据库;2.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数据主要来自于手工整理;3.其余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官方网站、财经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各 1%的 winsor 缩尾,以避免极端值对本文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最终获得 2518 个样本数据,使用 STATA15 进行数据处理。

(二)主要变量界定

1.企业创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创新,我们将企业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这两类企业创新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企业创新投入

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绝对数指标可能不太稳健^[7],因此,本文的企业创新投入指标借鉴了王

营和张光利(2018)的做法,采用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衡量^[16]。由于计算得出的企业创新投入指标是百分数的形式,我们将其乘以100,以取消百分数的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越高,代表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值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该指标可以通过模型(1)计算获得:

$$RDspend=100*RDsum/ Totalasset \quad (1)$$

上述模型中, $RDspend$ 代表企业创新投入, $RDsum$ 代表当期企业研发投入的金额, $Totalasset$ 代表企业资产总额。

(2)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创新产出的衡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与研发投入的比值,专利被引用的情况^{[5][16-18]}。由于我国的专利被引用情况数据较难获取,这一指标被排除。企业的专利申请数据可能存在“泡沫”,综合考虑数据的真实性、稳健性与可获得性,在主分析中,本文采用了专利申请数(PatentA)、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四个指标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了有效专利数(PatentV)、有效发明专利数(IPatentV)两个指标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

2.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的环境信息质量评分体系基于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框架设计,将环境信息质量分为以下七个方面:治理结构和管理系统、信息可信度、环境绩效、环境保护支出、愿景与战略、环境概况、环境举措^{[9][15][19]}。我们结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http://www.mee.gov.cn>, 2010)对环境信息质量评分体系进行了调整。在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质量进行评分的过程中,相关信息主要参考了公司的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在主分析中,采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综合得分(EDI)作为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综合得分中的环境绩效(ED3)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同时控制了以下变量^{[4][20]}:企业资产规模(Size)、企业获利能力(Roa)、财务杠杆(Leverage)、管理费用比率(Expense)、企业增长率(Grow)、每股自由现金流(Cash)、前十大股东持股比(Top10)、CEO与董事长兼任情况(CEO)、独立董事占比(Indep)、董事会人数(Board)、托宾Q(TobinQ)、公司上市年限(Age)、是否为国有企业(State)。

表1是本文的变量定义表,列示了本文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在回归模型中,本文还控制了年度、行业虚拟变量。本文选取我国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作为本文的行业分类标准。

(三)模型设计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设计,我们构建了模型(2)用于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RDspend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I_{it} + \sum \beta_k \times Controls_{it} + \sum \beta \times Year + \sum \beta \times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RDspend$ 为企业创新投入,采用研发投入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衡量, EDI 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Year$ 代表年度虚拟变量, $Industry$ 指行业虚拟变量, i 代表企业个体, t 代表所属年份, β_1 代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 β_k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我们构建了模型(3)用于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4][20]},具体模型如下:

$$Patent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I_{it} + \sum \beta_k \times Controls_{it} + \sum \beta \times Year + \sum \beta \times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

以上模型中, $Patent$ 为企业创新产出,包括专利申请数(PatentA)、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等指标, EDI 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Year$ 代表年度虚拟变量, $Industry$ 是指行业虚拟变量, i 代表企业个体, t 代表所属年份, β_1 代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 β_k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PanelA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RDspend	企业研发投入金额/资产总额,衡量企业研发投入情况
	创新产出	PatentA	专利申请数,当年公司为申请人的申请专利的总数,包含三种专利
		PatentG	专利授权数,当年申请截至数据更新时间被授权的专利个数,包含三种专利
		IPatentA	发明专利申请数
		IPatentG	发明专利授权数,当年申请截至数据更新时间被授权的发明专利个数
		PatentV	有效专利数取对数,代表截至当年公司持有的有效专利总数
		IPatentV	有效发明专利的数量取对数,代表截至当年公司持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总数
PanelB 解释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EDI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得分合计
		ED3	环境绩效得分
PanelC 控制变量	企业资产规模	Size	资产总额期末值取自然对数
	企业获利能力	Roa	总资产收益率
	财务杠杆	Leverage	财务杠杆,年末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
	管理费用比率	Expense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企业增长率	Grow	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代替
	每股自由现金流	Cash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本期净增加额-筹资活动产生的本期现金流量净额)/期末实收资本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CEO与董事长兼任情况	CEO	董事长和CEO兼任情况,兼任取1,否则取0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重
	董事会人数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对数
	托宾Q	Tob inQ	公司市值/资产总额
公司上市年限	Age	当年减去公司上市的年份	
是否为国有企业	State	如果样本公司是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创新投入(RDspend)的最小值为0.008,最大值为9.752,专利申请数(PatentA)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657,表明企业之间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差距较大。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的最小值为0,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

的25%分位数为2,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的25%分位数为0,表明专利授权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可能存在左截尾现象,需要进一步验证。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EDI)的均值为8.414,最大值为36,说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标普遍偏低,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企业财务杠杆(Leverag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3%和42%,均低于50%,表明样本上市公司的负债规模较低。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4%,与最大值19.4%的差距较大,表明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的提升空间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in	mean	max	p25	p50	p75	sd
RDspend	2389	0.008	1.758	9.752	0.704	1.586	2.465	1.380
PatentA	2518	1	30.30	657	4	10	23	78.85
PatentG	2518	0	21.77	496	2	6	17	59.75
IPatentA	2518	0	13.45	296	2	4	11	34.67
IPatentG	2518	0	4.841	117	0	1	4	13.45
EDI	2518	0	8.414	36	2	6	12	8.099
Asset	2518	19.57	22.45	26.05	21.57	22.20	23.17	1.242
Roa	2518	-0.201	0.040	0.194	0.010	0.033	0.065	0.054
Leverage	2518	0.052	0.430	0.892	0.271	0.420	0.582	0.198
Expense	2518	0.010	0.080	0.589	0.045	0.073	0.101	0.049
Grow	2518	-0.581	0.127	3.076	-0.038	0.077	0.215	0.343
Cash	2518	-4.364	-0.154	2.744	-0.547	-0.059	0.325	0.987
Top10	2518	21.90	58.24	89.99	46.96	58.34	69.75	15.41
CEO	2518	0	0.217	1	0	0	0	0.412
Indep	2518	0.333	0.370	0.571	0.333	0.333	0.400	0.051
Board	2518	1.792	2.283	2.773	2.197	2.303	2.303	0.177
Tob inQ	2518	0.171	1.857	10.73	0.833	1.488	2.364	1.513
Age	2518	1	9.976	24	5	9	15	6.069
State	2518	0	0.450	1	0	0	1	0.498

(二)相关性分析

表3 相关性分析

	PatentA	EDI	Asset	Roa	Leverage	Expense	Grow	Cash	Top10	CEO	Indep	Board	Tob inQ	Age	State
PatentA	1														
EDI	0.331***	1													
Asset	0.417***	0.546***	1												
Roa	-0.006	-0.047**	-0.073***	1											
Leverage	0.072***	0.236***	0.496***	-0.505***	1										
Expense	-0.103***	-0.179***	-0.308***	0.0320	-0.322***	1									
Grow	-0.060***	0.00300	0.0260	0.244***	-0.036*	-0.096***	1								
Cash	0.059***	0.082***	0.061***	0.164***	-0.078***	-0.060***	-0.074***	1							
Top10	0.220***	0.167***	0.279***	0.182***	-0.094***	-0.109***	0.121***	-0.0220	1						
CEO	-0.055***	-0.115***	-0.163***	0.072***	-0.123***	0.087***	0.0240	-0.041**	-0.008	1					
Indep	0.061***	-0.0300	0.0280	0.004	-0.037*	-0.0190	-0.018	0.017	0.056***	0.109***	1				
Board	0.077***	0.215***	0.306***	-0.044**	0.198***	-0.121***	-0.050**	0.0180	0.061***	-0.201***	-0.463***	1			
Tob inQ	-0.148***	-0.247***	-0.451***	0.464***	-0.552***	0.353***	0.124***	0.088***	0.046**	0.106***	0.046**	-0.203***	1		
Age	0.096***	0.259***	0.364***	-0.123***	0.306***	-0.078***	-0.050**	0.224***	-0.281***	-0.187***	-0.0190	0.157***	-0.183***	1	
State	0.159***	0.302***	0.379***	-0.235***	0.353***	-0.155***	-0.106***	0.115***	-0.0210	-0.258***	-0.043**	0.288***	-0.310***	0.518***	1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3。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专利申请数(PatentA)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DI)的相关系数为0.33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初步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创新的推论。计算得出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3.33,远远低于10,基本排除了主要相关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三)检验结果

1.环境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1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控制相关因素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高,回归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逻辑,验证了假设1a。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企业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企业在获取较为充足的资源后,缓解了资金压力,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在创新方面的投入水平也随之提升。

环境信息披露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控制相关因素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越高,回归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可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逻辑,验证了假设1b。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帮助企业传递出了经营状况较好的信号,提高了公众对企业的认可度,提高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提高了企业产品的销售量,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产出水平。

2.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的拓展性分析

假设1a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可能受到企业融资现状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理,本文选取融资约束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了拓展分析。

融资约束的产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企业无法获取外源融资,或者外源融资成本远远高于企业内源融资成本,从而限制了企业的投资活动,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利的投资机会^{[12][21]}。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较为丰富的资源,为创新投资提供物质条件,缓解企业投资项目受到的限制,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中,企业的投资活动受限程度较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可能更明显;而在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企业的投资活动受限程度较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明显。

本文参考 Halock 和 Pierce (2010) 的做法^[2], 选取了 SA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用于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根据模型(4)计算出 SA 指数:

$$SA = -0.737 \times Size + 0.043 \times Size^2 - 0.040 \times Age \quad (4)$$

上述模型中, SA 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 Size 为企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Age 为公司上市的年限。

本文构建了模型(5)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检验融资约束是否可以调节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RDspend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I_{it} + \beta_2 \times SA_{it} + \beta_3 \times EDI_{it} \times SA_{it} + \sum \beta_k \times Controls_{it} + \sum \beta \times Year + \sum \beta \times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5)$$

以上模型中, RDspend 为企业创新投入,采用研发投入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衡量, EDI 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 SA 用于衡量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交互项 EDI_{it} × SA_{it} 的系数 β₃ 反映了企业融资约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为了避免交互项与变量之间由于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的共线性,我们先分别对 EDI、SA 作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交互项。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Year 代表年度虚拟变量, Industry 是指行业虚拟变量, i 代表企业个体, t 代表所属年份, β₁ 代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 β_k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融资约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我们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DI)作为解释变量,将企业创新投入(RD-spend)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到模型(5)中进行验证。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EDI_SA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说明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的投资活动受限程度较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以后,帮助企业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

3.环境信息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与创新产出的拓展性分析

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明显高于其他事务所,主要是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比较长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全球公认的信誉,在中国从事的审计业务也会特别注重维持其品牌特有的声誉^[23]。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百年老店”,有更强的声誉保护动机,为了保持由于声誉效应和品牌效应带来的竞争上的优势以及收益上的溢价,已经产生卓著声誉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更强的动机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维持并不断提高审计质量^[24]。由此,我们认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受到了来自第三方的更严格的监督,这种监督可以帮助公司规范管理过程,提高经营效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在那些审计事务所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本文构建了模型(6)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检验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可以调节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begin{aligned}
 Patent_{it} =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I_{it} + \beta_2 \times Big4_{it} + \\
 & \beta_3 \times EDI_{it} \times Big4_{it} + \sum \beta_k \times Controls_{it} + \\
 & \sum \beta \times Year + \sum \beta \times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6)$$

以上模型中,Patent为企业创新产出,EDI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Big4用于衡量审计事务所是否属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交互

项 $EDI_{it} \times Big4_{it}$ 的系数 β_3 反映了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为了避免交互项与变量之间由于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的共线性,我们先分别对EDI、Big4作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交互项。Controls为控制变量,Year代表年度虚拟变量,Industry是指行业虚拟变量,i代表企业个体,t代表所属年份, β_k 代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 β_k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调节效应,我们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DI)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专利申请数(PatentA)、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代入到模型(6)中进行验证。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EDI_Big4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说明在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持声誉地位,会致力于提高审计质量,从而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被审计单位在这种强监督效应的影响下,会加强经营管理的规范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因此,在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4.环境信息披露、分析师跟踪与创新产出的拓展性分析

证券分析师跟踪会提高企业的曝光水平^[1]。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但是由于环境信息的专业性比较强,投资者对环境信息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一方面,分析师可以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通过专业解读将企业管理层对外披露的信息进行解读并传递给信息使用者,缓解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市场上的投资者对分析师跟踪的企业有较好的预期,分析师关注的企业往往受到更多投资者的关注^[25]。因此,我们认为证券分析师的跟踪不但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可理解性,还可以提高

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从而有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运营效率的提升。分析师跟踪可能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有正向影响。

本文构建了模型(7)进行进一步的定性分析,检验证券分析师关注是否可以调节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

$$Patent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EDI_{it} + \beta_2 \times Report_{it} + \beta_3 \times EDI_{it} \times Report_{it} + \sum \beta_k \times Controls_{it} + \sum \beta \times Year + \sum \beta \times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Patent$ 为企业创新产出, EDI 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 $Report$ 用于衡量证券分析师关注度,用证券分析师出具的报告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交互项 $EDI_{it} \times Report_{it}$ 的系数 β_3 反映了证券分析师关注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为了避免交互项与变量之间由于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的共线性,我们先分别对 EDI 、 $Report$ 作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交互项。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Year$ 代表年度虚拟变量, $Industry$ 是指行业虚拟变量, i 代表企业个体, t 代表所属年份, β_1 代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 β_k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证券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效应,我们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DI)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专利申请数($PatentA$)、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代入到模型(7)中进行验证。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 EDI_Report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证券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论,说明在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进一步解读提高了信息的可理解性,增强了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同时,证券分析师的关注也引起了信息使用者的关注,有助于企业规范经营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因此,在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四)稳健性分析

1.替换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的衡量偏差是内生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缓解内生性,本文在主分析中采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综合得分(EDI)作为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综合得分替换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综合得分中的环境绩效(ED3)这一项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代入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环境绩效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2.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缓解被解释变量衡量偏差导致的内生性,本文选取了有效专利数($PatentV$)、有效发明专利数($IPatentV$)两个指标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代入模型(3)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相一致。

3.Tobit模型的检验结果

经过进一步的检验,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存在左截尾现象,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Tobit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表10列示了检验结果。使用Tobit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4.替换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Z指数代替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验。Z指数是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股权制衡情况^[20],Z指数较高意味着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力较强,公司治理监督机制较好;Z指数较低意味着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力较弱,公司治理监督机制较差。我们用Z指数替换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变量,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DI)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专利申请数($PatentA$)、专利授权数($PatentG$)、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A$)、发明专利授权数($IPatentG$)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代入到模型(6)中进行验证。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

ED1_Z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Z值较高的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监督力较强,企业在这种强监督效应的影响下,会加强经营管理的规范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从而提高创新产出水平,这与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资源,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提高创新产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的投资活动受限程度较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以后,帮助企业获得了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在审计师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护自身声誉,从而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

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进一步解读提高了信息的可理解性,并引起了信息使用者的关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本文的以上研究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不仅应当看到企业为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所付出的代价,也应当关注到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获取资源、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带来的益处,企业应当不断致力于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其次,企业管理层也应当注意到,较高的监督水平有助于企业提高管理的规范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因此,企业应当提高监督水平。第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当注意到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正面效应,以及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创新的促进效应,并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鼓励企业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创新水平。

参考文献:

- [1] 杨松令,牛登云,刘亭立,等. 实体企业金融化、分析师关注与内部创新驱动[J]. 管理科学,2019,32(2):3-18.
- [2] 张兆国,曹丹婷,张弛. 高管团队稳定性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吗——基于薪酬激励和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 会计研究,2018,374(12):48-55.
- [3]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 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2015(7):146-160.
- [4] 陈德球,金雅玲,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效率[J]. 南开管理评论,2016,19(4):27-35.
- [5] 温军,冯根福.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增值”与“攫取”的权衡视角[J]. 经济研究,2018,53(2):185-199.
- [6] 陈爱贞,张鹏飞. 并购模式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2):115-133.
- [7] 严若森,吴梦茜.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J]. 经济管理,2020,42(3):23-39.
- [8] 沈洪涛,冯杰.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2012(2):72-78.
- [9] 吕明晗,徐光华,沈弋,等. 异质性债务治理,契约不完全性与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2018(9):67-74.
- [10] 武龙,李腾龙. 银行贷款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吗?[J]. 会计之友,2020(7):106-112.
- [11] PFEFFER Jeffrey, SALANCIK G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12] 何贤杰,肖土盛,陈信元.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融资约束[J]. 财经研究,2012,38(8):60-71,83.
- [13] 吕备,李亚男. 从系统管理视角看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J]. 系统科学学报,2020,28(2):126-131.
- [14] 陶克涛,郭欣宇,孙娜. 绿色治理视域下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67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20(2):108-119.
- [15] CLARKSON P M, FANG X, LI Y, et al. The Relevance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re Such Disclosures Incrementally Informativ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3, 32(5):410-431.
- [16] 王营,张光利. 董事网络和企业创新:引资与引智[J]. 金融研究,2018(6):189-206.

- [17] DAVID Hirshleifer, ANGIE Low, SIEW Hong Teoh. Are Overconfident Ceos Better Innovator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67(4): 1457-1498.
- [18] HIRSHLEI David, DONGMEI Li. Innovative Efficiency and Stock Retur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107(3): 632-654.
- [19] DARRELLA Brown, HAYES M Rachel, SCOTT R.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and Firm Value: Further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5, 34(4): 336-361.
- [20] HELMERS C, PATNAM M, RAU P R. Do Board Interlocks Increas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n India[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7, 80(7): 51-70.
- [21] 陈作华, 方红星.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J]. 管理科学, 2018, 31(3): 125-139.
- [22] CHARLES J, JOSHUA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 1909-1940.
- [23] 张立民, 丁朝霞, 钱华.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价格差异策略的经济学诠释[J]. 审计研究, 2006(5): 44-48.
- [24] 陈波. 经济依赖、声誉效应与审计质量——以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分析单位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 28(5): 40-49.
- [25] 程新生, 郑海埃, 程昱. 创新信息披露、分析师跟踪与市场反应研究[J]. 科研管理, 2020, 41(1): 161-173.
- [26] 沈弋, 吕明哈, 徐光华, 等.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J]. 管理学报, 2020, 17(2): 269-277.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YAN Juan

(Wuhan Business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primary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as samples, in the paper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 level. Furthermor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innovation inpu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innovation outpu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auditors from the four major accounting firm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innovation outpu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attention from securities analyst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a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draw up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output; corporate governance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

刘超俊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 广州 510095)

摘要:从意愿和能力两条路径,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其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越低其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越强;同时,相较于内陆文化,沿海地域文化会进一步加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上述结果提示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更具意愿和能力进行技术创新,同时表明两权分离度与董事长所处地域文化对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创新投入;两权分离度;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创新投入以增加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备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区别于创始人的战略惯性,继任者会基于自身价值观、海外留学经历及认知能力等调整技术创新投入^[1];或者,家族企业被传承者因面临合法性权威的挑战,而放弃高风险、见效慢、可见性低且无法短期内提升企业绩效的技术创新投入。显而易见,现有研究大多从被传承者的角度分析价值观差异、认知偏差、谋求合法性地位等对家族企业传承阶段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而忽略了家族企业的“能力”和“意愿”对传承阶段创新投入决策的影响。事实上,家族企业具备相对集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更有能力进行创新,但为了追求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创新的意愿可能较低。因而,忽略家族企业的“能力”和“意愿”考察其代际传承阶段的创新投入如同空中楼阁。从能力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当企业发生了代际传承,二代的教育经历能弥补一代在理论知识上的缺陷,为企业带

来科学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在二代与一代齐心协力下,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达到高度的融合,构筑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2];另一方面,为了维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企业主可能会优先解决代际传承阶段的冲突与矛盾。为了更好地解释代际传承家族企业“能力”和“意愿”的变化对其创新投入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将观察期内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作为控制组,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作为实验组,实证检验代际传承作为外生事件是否会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改变;此外,为了深入考察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变化,引入了控制权结构和企业地域文化作为调节变量,检验不同控制权结构和地域文化下的家族企业其代际传承前后创新投入的变化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选取2013-2017年中国家族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两权分离度较低且地域文化为沿海文化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

作者简介:刘超俊(1957-),男,江西龙南人,博士,高级记者,主要从事企业文化研究。

二、理论与假设

(一)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

创新是企业的源动力,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既有研究探讨了引起企业创新投入变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创新活动主要受资源能力和主观意愿两方面的影响。

1.资源能力。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一旦资源和能力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企业创新战略的调整。①代际传承给家族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生力量”。相比于一代,虽然二代创业经验有所欠缺,但他们大部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弥补了一代在理论知识上的先天不足,能为企业带来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知识。此外,具备不同教育背景和生活阅历的管理层,往往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进而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构筑基础条件。②代际传承可能会引发家族内部冲突。代际传承时期是控制家族关系最为脆弱和动荡的时期,接班人选拔引发的同辈竞争冲突和其他家族成员的安抚补偿问题等都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并且占用企业资源,致使企业无暇顾及创新活动。

2.主观意愿。创新活动是家族企业主观意愿的表达。①创新活动可以帮助二代建立合法性。二代在接任初期往往因合法性不足而难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为了摆脱困境,二代有意愿和动机借助技术创新活动展现自身能力以迅速建立合法性。②创新活动依赖于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充足的现金流和专业的人才是企业创新活动成功与否的决定性要素,而家族企业既有的资金、知识经验和人力资本往往难以满足其有效需求。为了弥补资金缺口、打破人才壁垒,家族企业不得不向外界让渡部分控制权和影响力以换取足够的资源投入,这使得家族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趋于复杂,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家族权威受到挑战,控制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受到损害。为了保存社会情感财富,二代进行研发投入的意愿不足。

综上所述,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的“能力”和“意愿”会对其创新投入产生影响,体现为二代的

背景特征及建立合法性需求会促使其实施创新战略;代际传承引发的内部冲突及创新活动对资源的占用可能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二)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适度分离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构筑了制度环境和基础条件。既有研究从所有权结构和管理涉入两个视角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进行探讨:前者认为家族所有权影响企业的长期目标导向,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后者认为家族管理涉入影响家族企业的利他主义行为,进而抑制创新活动。

1.两权分离度越高,继任者侵占动机越强烈,创新投入的“主观意愿”减弱。在家族企业中,控股家族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利益背离,控股家族股东可能会做出一些行为以攫取私人利益。例如:从事关联交易,给参与管理的家族成员支付更高的津贴和绩效奖励等。可见,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家族企业更有可能出现中小股东利益被侵害及企业资源错配现象。

而家族企业往往需要通过让渡控制权以获得技术创新所需的外部资金和人力资本,致使其控制权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威胁其核心利益。出于保护控股家族权威地位和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考虑,二代接任后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投入少、周期短、风险低的项目,而非实施研发创新等风险性投资,从而降低创新投入水平。

2.两权分离度越低,继任者侵占动机减弱,创新投入的“主观意愿”越增强。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控股家族会面临诸多问题,比如:从众多潜在的继承者中选拔和培养新任接班人,安抚和补偿其他家族成员等,这都可能引发企业所有权结构发生转移和变化,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权力交接,控股家族的地位和权威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因此,继任者不必为了保护家族控制权而做出短视行为,反之,在管理决策中,会更注重长期价值的累积,立足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支持技术创新便是选择之一。

因此,两权分离度通过影响继任者的“主观意愿”,进而影响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两权分离度越低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投入水平越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两权分离度越低,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其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三)地域文化的调节作用

地域文化通过影响创新主体的思维和认知,进而指导企业的创新行为^[3]。以东南沿海为界,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分为两大文化圈,即沿海区域内构成的海洋文化圈和沿海区域之外的内陆文化圈。既有文献基于历史背景、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视角探讨了不同文化圈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普遍认为沿海文化圈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

1.在“风险喜好”的海洋文化圈中,继任者耳濡目染传承者的冒险精神,其创新投入的“主观意愿”更强。已有研究发现位于沿海地区的企业主普遍具有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和务实肯干的精神,能够给二代继任者带来正面示范作用。二代继承者在耳濡目染一代之勇于开拓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后,可能会更偏好更倾向于选择投入大、周期长且风险高的创新项目。反之,在“风险规避”的内陆文化圈中,考虑到代际传承带来的不确定风险,继任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见效快且风险小的项目,而非技术创新项目。

2.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文化包容性较好”的海洋文化圈中,对异域文化保持开放、合作、信任的态度有助于增加继任者研发创新的“资源能力”。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继任者为了迅速建立自身合法性,可能会倾向于借助技术创新以实现企业成功转型。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交汇于此,其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加多元,为家族企业的继任者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提供了人力资本。因此,本文认为地域文化影响创新投入的“资源能力”和“主观意愿”,进而影响代际传承阶段的创新投入水平。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沿海文化圈对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其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以2013-2017年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进

行样本筛选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样本;②剔除观察期内数据缺失的样本;③剔除观察期内股权多次变更的样本;④剔除上市时间不足5年的样本;⑤为了消除极端值影响,对全部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⑥对于部分可疑或缺失数据,使用RESET、WIND、CSMAR数据库进行交叉核对,从而保证数据真实有效,最终得到4145个家族企业观测样本。

在本文样本中,继任者在观察期之前就已经进入董事会或高管层的家族企业共200个(占比4.83%),继任者在观察期内进入董事会或高管层的家族企业共520个(占比15.18%),二代尚未进入家族企业、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共3425个(占比82.63%)。在行业分布中,样本中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的传统制造业共3403个,非制造业共742个。而在地区分布中,沿海地区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样本共3216个,非沿海地区的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的共929个。

(二)变量与测量

1.被解释变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采用家族企业*i*在*t*年的研发投入强度 $Rdi_{i,t}$,衡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2.解释变量:家族企业是否发生代际传承

将家族企业二代继任者进入企业董事会或者高管团队担任董事、副董事长或副总经理等重要非核心职位作为代际传承的起点,担任企业董事长作为终点,并以观察期内家族企业是否有二代继承者进入企业来判别“发生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和“未发生代际传承家族企业”。设定两个虚拟变量 $du_{i,t}=\{0,1\}$, $dt_{i,t}=\{0,1\}$ 。其中,当家族企业为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时, $dt_{i,t}$ 取值1,否则取值0; $dt_{i,t}=1$ 表示二代继承者于*t*年进入*i*家族企业决策层,否则取值0;代际传承交乘项 $du*dt=1$ 则表示家族企业正处于代际传承阶段,否则取值为0。本文选取交乘项 $du*dt$ 作为实证部分的关键解释变量,用以检验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以及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后的创新投入的变化水平。

(三)研究模型

根据双重差分法(Diffidence-in-Diffidence,

以下简称 DID)的原理,利用“参照组”对比,可以检测出“实验组”受外生事件的影响程度。代际传承可被视作家族企业实施创新战略的外生冲击,因此本文将样本区分为“实验组”(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和“控制组”(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以期通过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起始点前后创新投入差异的对比,来检验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为了探讨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差异,建立模型(1):

$$Rdi_{i,t} = a_0 + a_3 * du_{i,t} * dt_{i,t} + a_j * \varepsilon Con\ tr\ ols_{i,t} + a_r * \varepsilon Year + a_i * \varepsilon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权分离度与地域文化对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建立模型(2)和(3):

$$Rdi_{i,t} = x_0 + x_3 * du_{i,t} * dt_{i,t} + x_4 * cont + x_7 * cont * du_{i,t} * dt_{i,t} + x_j * \varepsilon Con\ tr\ ols_{i,t} + \quad (2)$$

$$x_r * \varepsilon Year + x_i * \varepsilon Ind + \varepsilon_{i,t} \\ Rdi_{i,t} = r_0 + r_3 * du_{i,t} * dt_{i,t} + r_4 * GC + r_7 * GC * du_{i,t} * dt_{i,t} + r_j * \varepsilon Con\ tr\ ols_{i,t} + \quad (3)$$

其中,下标 i 与 t 分别代表家族企业和年份, a_0 、 x_0 、 r_0 为常数项, a_i 、 x_i 、 r_i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为随机干扰项。

(四)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和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各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基本一致,但是在其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看,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均值为0.0499,高于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水平,这说明处于代际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可能更具主观意愿和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在两权分离度方面,两个样本的均值分别是5.4390和3.7234,表明代际传承更可能发生在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家族企业;在地域文化方面,两个样本的均值分别是0.7778和0.7755,差异不大。

代际传承与研发投入强度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0.41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p < 0.01$),说明其相关性较好;控制变量中,两权分

离度(Cont)、地域文化(GC)、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两职合一(Dua)、独董比例(Indep)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相关关系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引入的控制变量较为合理。此外,大部分自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8,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低。

(五)创新投入水平的t检验

本研究比较了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和在观察期内发生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均值,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t = 3.067$, $p < 0.01$)。本研究还进一步比较了观察期内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在传承始点前后的创新投入水平均值,结果亦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t = 1.653$, $p < 0.01$)。始点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显著增大,表明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阶段会加大创新投入。

四、实证结果检验

本文首先通过 F 检验、LM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以选择回归模型。其中, F 检验和 LM 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混合效应的原假设,而豪斯曼检验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表明本文应该选择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此外,3个回归的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选择“同方差”和“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回归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修正异方差且设置了最高两阶的自相关修正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此外,回归均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以平衡不同年份、行业对因变量的影响,同时,固定效应本身就平衡了不同的企业个体对因变量的影响。

(一)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关系检验

模型1为全样本的基准模型,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du*dt是本模型的关键解释变

量,用以反映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传承开始后与代际传承前、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由模型1的实证结果可知,交乘项 $du*dt$ 的回归系数为3.853,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H1a 得到支持(H1b 未得到支持)^[4],说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可看出 lev 、 $size$ 、 $ln-dep$ 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这些变量对 Rd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Dua 、 $lnedu$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不显著,表明这些变量对 Rd 无明显的影响。

(二)两权分离度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水平的调节机制

为进一步探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其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两权分离度,具体考察其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我们根据两权分离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将全样本分为两权分离度较高和两权分离度较低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说明 $du*dt$ 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但回归2中的系数大于回归1,由此可见,相比于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家族企业,两权分离度低对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与其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说明两权分离度越低,新任接班人侵占动机减弱,其创新投入的主观意愿变强,支持假设2。

(三)地域文化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水平的调节机制

此外,为了检验董事长地域背景对代际传承阶段技术创新倾向的调节作用,我们根据董事长的籍贯将样本公司分为海洋文化背景(沿海省份)与内陆文化背景(内陆省份)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du*dt$ 均显著为正,且回归3中的系数大于回归4,表明处于沿海地区的家族企业,其在代际传承阶段的技术创新强度较大。这一结论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四)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包括替代性测量和内生性讨论。替代性测量主要是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选取指标替换,即采用家族企业研发投入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稳健性检验结果。

内生性讨论部分。考虑到实证部分结果可能受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的影响,一方面,样本选择偏差,即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家族企业并未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处于稳定阶段也会减弱去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本文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实施政策的实验组企业匹配对应的控制组,具体用PSM中的1:3的近邻匹配法。具体处理如下:选取实验组实施政策的前一年数据为匹配的实验组(对于2013年就实施政策的企业,用2013年的数据进行匹配),对照组为没有实施政策的企业所有年份的数据,根据匹配变量 lev 、 ROA 、 $size$ 、 Dua 、 $lndep$ 、 $lnedu$ 进行匹配,得到对应的控制组。匹配前,有实验组企业144个,控制组企业685个,控制组企业个数明显多于实验组个数,容易有样本选择偏误引起的影响。PSM匹配后,有实验组企业132个,控制组企业276个。对变量进行平衡检验,表明沿海地区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高于非沿海地区。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经过PSM匹配消除了可观测变量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带来的对结果的影响后,结论仍与之前保持一致,再次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家族企业迎来了传承的高峰期,而代际传承关乎家族企业能否家叶永青。本文以2013-2017年所有A股家族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展开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了两权分离度和地域文化对代际传承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相比于非代际传承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受两权分离度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①代际传承家族企业更具有主观意愿和资源能力以加大其创新投入水平;②两权分离度越低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越为显著;③相较于内陆文化,沿海文化会进一步加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并鉴于中国家族企业将迎来传承高峰期的事实,就中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阶段的创新投入战略提出下述三点建议:①当前中国大量家族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家族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代际传承所带来的机遇,切不可一味地降低创新投入以求得家族控制权的存续;②家族企业的资源能力对家族企业成功实现跨代生存至关重要。为此,中国家族企业应该主动吸纳和培养职业化

人才,以夯实企业的资源能力,并藉此促进其长远发展;③中国家族企业在认识到两权分离度对其创新投入水平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的同时,尚须充分意识到两权分离对完善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为此,基于长远发展,中国家族企业应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有计划地推进家族企业管理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实现从家族化向公司化管理的华丽转身。

参考文献:

- [1] QIAN C, CAO Q, TAKEUCHI R. Top management team functional divers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34): 110-120.
- [2] ALDRICH H E, CLIFF J E.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18): 573-596.
- [3] GERTIER M S. "Being There": Proximit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J]. *Economic Geography*, 1995(71): 1-26.
- [4] 李新春,韩剑,李炜文. 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建构[J]. *管理世界*, 2015(6): 110-124.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U Chaojun

(Guangdong Television, Guangzhou 51009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two paths of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n its innovation investment level.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famil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17 show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level of family compani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issues such as endogenousnes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low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powers,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inland culture, coastal regional culture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n family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The abov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family companies are more willing and able to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lso show th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power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chairman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Key words: family firm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control structure; geographical culture

零星疫情防控之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王 俊,刘良军

(中共荆门市委党校,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方再次暴发,诚然是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又一次检验。各涉事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终于再次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疫情防控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弥足珍贵,需要传承;暴露出来的短板与问题不可小觑,应该纠正。在认真分析研究、总结反思的基础上,从中汲取基层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必将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基层治理日渐迈向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疫情防控;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2021年7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方零星暴发、多点蔓延,再次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也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各涉事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防严控、群防群控,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有理由相信,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并不总是顺风顺水,相反有风有雨是常态,遇到惊涛骇浪也不无可能。因此,以本轮零星疫情防控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借鉴,进一步加强、升级基层治理成为必然,要求于持续推进基层群众安居乐业、基层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础上,终至以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彰显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本轮疫情防控是基层治理的一次“月考”

如果说去年的疫情防控是直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那么本轮零星疫情防控就是一次“月考”,考评的是涉事地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能否驾轻就熟、稳操胜券。实践表明,涉事地既在党中央、上级党委的指挥调度下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又结合实地实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月考”成绩。

(一)是对基层日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测试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动态演进,由量变积累向点滴质变推进,最终实现整体性质变的过程。尤其是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需要在实战中进行测试和检验。正是从这一角度言,本轮疫情零星暴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对基层日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一次全方位透视。实践表明,涉事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在路上,一直以来所进行的努力没有白费,疫情虽然暴发快、来势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攻坚战后,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取得显著成效,随即转入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民生活生产重又恢复往日蓬勃生机、旺盛活力^[1]。

(二)是对基层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一次考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虽然本轮疫情只是零星暴发,但人们看到各涉事地党员干部

作者简介:王 俊(1973-),男,湖北京山人,本科,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和行政管理研究;刘良军(1972-),男,湖北荆门人,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和党的建设研究。

第一时间闻令而动、听命而行,迅速发挥疫情防控先遣队、主力军作用。譬如,街道(乡镇)、社区(村)一线党员干部迅速组建专门应急管理机构,明确疫情防控具体任务,着力铸就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又如,党员身份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向死而生,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毅然决然地昼夜奔波、忙碌在患者的筛查、收治、诊疗等前沿阵地上;再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迅速启动下沉机制,或就地就近参加所在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或成立党员志愿服务小组,适时为封闭社区(村)居民群众代购防疫物品、生活物资,帮助维持核酸检测秩序,拦截不明身份人员进出等等。概言之,去年抗疫斗争中“我是党员,让我来”“我是干部,我先上”之党员干部的拼搏奉献精神,同样在本轮零星疫情防控中得到生动体现^[2]。

(三)是对基层群众临危抗压心理与应对情绪的一次检验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合力。疫情直接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给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带来冲击,设若民心不稳,只能是雪上加霜,让疫情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诚然,本轮疫情只是零星暴发,也于初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心惶惶。但在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有力宣传、有序公告、有效沟通下,涉事地居民群众认清疫情暴发原因,安之若素、按部就班,推动疫情防控走深走心走实。换言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有了这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的抗压心理、稳定情绪,也就等于防控取得一半胜利,有利于后续既各自尽到应尽的责任,也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四)是对基层治理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一次测验

法治是治国安邦之重器,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实践一再证明,越是关键时候,越离不开法治的引导、规范、纠正与保障作用,越需要用法治来维护既定的社会运转秩序、生产生活秩序,如此才能让群众看到希望。本轮疫情零星暴发,部分地方出现居民群众哄抢物资、无序流动,少数商户坐地起价、哄抬物价,核酸检测争先恐后、混乱无序等各种乱象。对此,涉事地党委、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坚持以法律为

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较好地满足了疫情防控一应要求,满足了居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步使依法防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增强了依靠法治取得疫情防控最终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

(五)是对基层社会舆论、传播生态的一次测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凶猛来袭,各地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惜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宣传手段与传播力量,形成了全天候劝导、无死角劝勉居民群众以疫情防控为重,各自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舆论氛围。然而正所谓凡事过犹不及,实践中像“出门就是找死,聚餐就是害人”等“雷人”标语,固然起到了一定的规劝作用,却也制造了恐慌心理与逆反情绪。因此此轮零星疫情暴发,各地虽然也重视舆论作用、舆论生态,却明显地更加人本、理性、平和与务实,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电台,还是新媒体如手机APP、网络社区等,都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善用数据、事例说话,让居民群众一方面认识到疫情防控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都是责任、利益、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也对党委、政府如何排兵布阵有了同步认同感,进而自觉遵守各项防控规定,维护控日渐向好的大局。

二、“月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缺陷不可小觑

(一)少数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然而从本轮因为疫情防控不力而受到相应处分、处置、处理的党员干部具体缘由来看,在疫情防控最关键、最吃紧的当口,确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如有的党员干部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觉得去年那么大的疫情都能平安无事,本轮区区零星疫情暴发算不了什么;有的党员干部上面不喊不动,动也是蜻蜓点水;有的党员干部痴迷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甘当“二传手”,简单止步于发发文、打打电话,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疫情防控,对防控进展情况一问三不知。更有甚者,为图虚名、谋政绩,不吝虚报疫情感染人数,严重违反党纪党规,甚至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二）民生保障、尤其弱势群体的迫切诉求难以第一时间得到满足

疫情防控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头等大事，但也要看到，织紧织密织细防控网的同时，也得保障基本民生，让封闭、隔离的民众“一日三餐”不受影响。尤其对于部分居民群众而言，或是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特殊时期稍微涨价的生活物资，或是因为临时发病，迫切需要外出就诊等等，设若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一刀切”，就有可能适得其反，让这部分群众深感因为疫情防控而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付之阙如。不仅如此，对于集中救治、集中隔离观察的特殊人群，也应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力所能及地为之提供生活服务，确保他们心无旁骛，主动配合治疗与观察。

（三）党群、干群之间缺乏有效交流、充分沟通、融合互动

“得民心者得天下”。越是疫情防控这样的特殊时刻，越需要注重民意支持，把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譬如在开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封闭居住区、管控交通、划分风险等级区等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方面，党群、干群之间应该及时沟通、有效交流、融合互动，达成共识。然而个别地方借口时间紧、任务重，往往命令主义至上，漠视了听取民声、照顾民意、顺应民心工作，导致实践中群众虽然也配合了疫情防控，却难免有怨声怨言怨气，并为未来基层治理埋下隐患。

（四）规律意识单薄、科学思维欠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换言之，凡事皆有规律，把握住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能做起事来游刃有余、事半功倍。至少去年我们能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科学办事，依规律行事。然而本轮疫情零星暴发，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出于私利，确实“我的地盘我做主”，以主观意志压制了规律意识与科学思维，导致疫情防控中乱象频出。如不予分区分级分时防控，一律严防死守，让区域内其他群众

苦不堪言。又如，在组织核酸检测方面，为检测而检测，致使人群众聚集，二次发生疫情感染等等。

三、从本轮疫情防控胜利中汲取基层治理的智慧和力量

疫情终将远去，生产生活必将重新开启。尤其知往思进，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需要总结好、传承好，期间的失利失误深刻教训也应铭记于心，避免重蹈覆辙。具体说来，既然本轮零星疫情防控是基层治理的一次“月考”，疫情过后应该再次回溯，从中汲取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慧和力量，确保未来危险风险再次降临时，能够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充分展示。

（一）强化安全意识，将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贯彻治理全过程各方面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亿万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也同步在安全方面提出要求。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既是人权的基本要义、核心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置前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惟有深刻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以安全为基础，才能以安全促发展，靠发展更好地保障安全^[9]。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要求基层治理实践中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强化安全意识，既把各项安全工作做在前面，也使安全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与各方面，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尤其对于基层党委、政府而言，务必在作决策、订政策、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过程中，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视安全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夯实安全根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心竭力保民生、守民心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

动体现。体现在基层治理上,就是基层治理为了群众,基层治理依靠群众,基层治理成果由群众共享^④。由此民生与民心紧密相联,不可分割,要求基层治理只能让民生愈发得到保障与改善,让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更加愉悦美满,而不能不进反退,有损伤、损失感。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且大多与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基层治理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治理思维,非但不能与民争利,而且要把民生状况如何置于重要评判标准,看群众是笑还是哭。同时也要看到,保障民生与基层治理并不矛盾,群众越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则治理越有民心民意基础,越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以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倒逼党员干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村看村、户比户,群众看的是党员干部。基层治理中设若党员干部甘当“看客”,必定死气沉沉、万马齐喑。党的领导是风雨来临时中国人民最为可靠的主心骨,各级党员干部则是风雨来临时群众身边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以本轮疫情防控为殷鉴,应该、也必须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激励约束机制,既确保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党员干部,得到应有的奖励与激励,也坚决对那些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抑或个人利益至上、爱惜羽毛,不敢担当、胡乱作为的党员干部祭起严厉惩处的利剑,使之要么知耻后勇、再次“出彩”,要么冥顽不化、被迫“出局”。

(四)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对于我们党而言,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劈波斩浪、攻坚克难、夺取胜利,是党百年来由弱小而至强大的重要秘诀。基层治理中,同样必须依靠群众,充分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事实也是如此,像本轮零星疫情防控斗争中,不少居民群众组成互助组,互相接济、互相照

料,让整个居民小区(村庄)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又或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义务治安巡逻队,既负责卡口24小时值守,又密切关注区域社会治安,再次印证了“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朴素道理。贯彻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原则,坚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治理能力必将与时俱进、与日俱增。

(五)强化法治思维,协同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由此也决定了基层治理中必须贯彻法治原则,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和谐。尤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更加说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刻也不能没有法治作保障,越发需要发挥法治固根基、定纷争、保稳定、利长远的独特作用和优势^⑤。同样以本轮零星疫情防控斗争为例,正是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一些商贩在法律的强大威慑下,不敢、不能、不想哄抬物价。同时无论是民间纠纷,还是党群、干群矛盾,凡事于法有据,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也大都在第一时间得以平息,妥善处置。强化法治思维,协同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基层治理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筹兼顾、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六)坚持科学思维,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哲人有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即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强调既定原则下还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诚然,基层治理包罗万象,既有物的方面需要配置,也有人的方面需要应对,一旦过于刚性规定、硬性要求,只能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⑥。比如疫情防控中,固然封闭小区(村庄)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方式,但设若内中有群众突发疾病需要救治,是严格执行防控政

策,坚决不予放行,还是以人为本,为其开辟绿色通道,便是有否科学思维,能否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分水岭,也折射出防控为了谁、防控依靠谁、防控成果由谁享有的防控理念。一言以蔽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推动基层治理不偏不倚,始终于正确科学的轨道上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时隔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方再次暴发,的确是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又一次检验。我们看到,各涉事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弘扬生命至上、万众一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终于再次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重回正轨。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本轮零星疫情防控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弥足珍贵,需要传承;暴露出来的短板与问题也不可小觑,应该纠正。由此在认真分析研究、总结反思的基础上,从中汲取基层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必将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基层治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日渐迈向现代化水平,以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让党的领导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彰显,推动中华号巨轮驶向更为宽阔的水域。

参考文献:

- [1] 田豆豆. 凝聚疫情防控的合力[N]. 人民日报, 2021-08-16(9).
- [2] 李亮. 各级党员干部要在疫情防控一线践行初心使命[N]. 商洛日报, 2020-01-30(1).
- [3] 评论员.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N]. 人民日报, 2020-11-05(4).
- [4] 曲延春.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N]. 人民日报, 2021-06-22(13).
- [5] 廖文根. 以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N]. 人民日报, 2019-02-21(19).
- [6] 闫萍. 以科学思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N]. 人民日报, 2019-11-27(9).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ad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NG Jun, LIU Liangju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ngme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outbreak of COVID-19 in some places is indeed another tes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ll the localities involved have carried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fighting the epidemic, and have finally achieved another decisive victory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precious and needs to be passed on; the exposed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 should be corrected. On the basis of careful analysis, research, summary and reflection, drawing on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ll surely push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o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inking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

——以粮食主产区地级市数据为例

陈晓燕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黄冈 438002)

摘要:粮食生产集聚是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要前提。基于粮食主产区2004—2017年170个城市基地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生产集聚水平在粮食主产区内部已出现分化现象,粮食生产集聚重心正逐步向东北三省集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集聚的提升,且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小麦和玉米生产集聚,但不利于水稻生产集聚,可能的原因在于水稻生产环节繁杂,更兼备水田特性;基于坡度划分的约束机制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平原地区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粮食生产集聚;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7.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粮食生产集聚是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要前提。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要通过集聚资源要素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资源要素集聚的前提是粮食地理集聚生产,目前中国粮食生产集聚效应已然明显,全国3/4的粮食来源于粮食主产区。同时,在粮食主产区内部粮食生产的布局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正逐步向北移动,且在泛东北地区及泛黄淮地区形成了空间集聚的现象^[1]。与此同时,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中重点强调了要将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托管作为重点支持对象,通过专业化、规模化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全产业链,其对于粮食生产分工、环节衔接、销售都起着重要作用,是农业生产集聚发展的重要途径^[2]。因此,文中以粮食生产集聚和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刻画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集聚的分布状况,其次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思路。

通过对文献的有效梳理发现:第一,现有文献侧重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粮食增产和效率的关联,较少关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且有关粮食生产集聚的文献都局限于省级层面数据,对地级市层面缺少研究。第二,大部分文献集中讨论的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的线性关系,忽视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非线性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粮食主产区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粮食主产区内部粮食生产集聚指数,并利用ArcGIS描绘粮食生产集聚的空间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作用效果、门槛特征及其约束机制,为因地制宜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充分利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效应提升粮食生产集聚水平进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简介:陈晓燕(1973-),女,湖北鄂州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机理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内涵丰富,主要包含良种服务、农资服务、农技服务等,其经营规模的扩张既会产生利益增量,又会面临资源约束^[3]。“利益增量”是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应中的正外部性促进粮食生产集聚,“资源约束”是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受到市场容量、资源环境和要素市场等因素制约。

1.利益增量

在利益增量方面主要来源于五大效应。一是规模经济效应。相较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的生产环节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和季节性,更适应于机械化的连片耕种,从而有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替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承接多个农户粮食种植外包服务,使得自身可以获得规模经营带来的成本优势,从而有效促进粮食生产集聚的发展。二是知识外溢效应。Amiti 等认为,重组效应、学习的正外部性和多样化效应是外包服务促进生产率的核心机制^[4]。体现在粮食生产当中,外包的作用则是通过影响粮食生产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平均生产率和学习的正外部性产生的。随着企业与农户的合作不断深化,外包服务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通过“干中学”联通了粮食生产中“横向”和“纵向”的各个环节,提高了农业服务部门以及农户的生产效率,最终形成粮食生产集聚区域。三是比较优势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农业分工带来的要素配置效应。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价格存在差异。在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农户可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综合比较生产环节的成本收益,将那些投入成本高、个体生产效率低下的生产环节外包给服务业,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四是品牌质量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提供全产业链的相关服务,实现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以此保障粮食的质量和数量安全,营造品牌氛围,打响区域品牌。另外,区域品牌的形成将吸引

更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土地连片的规模效应将进一步增加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反向推动粮食生产集聚的发展。五是组织柔性效应。这主要是针对农户而言,当农户经营的粮食生产扩大至一定规模时,若没有完善的内部管理结构和管理体系支撑,自营成本过高将无法有效保障种粮收益。但是,当农户将非优势环节的业务外包给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后,农户既可以精简组织结构,同时还能减少劳动力配置,产生组织柔性效应,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

2.资源约束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资源约束。一是市场容量不足。斯密(1776)提出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Young 在此基础上指出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5]。在市场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市场竞争的存在将使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范围不会无限扩大,而是达到一定规模后趋于稳定^[6]。二是生产要素匮乏。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而劳动力、资本、信息和土地要素无法满足其扩张需求时,服务商之间也将展开激烈的资源要素竞争,诱发不良竞争,导致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刺激到粮食的生产成本当中,致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户的整体效益下降,不利于粮食生产集聚。三是地理环境约束。相较丘陵和山地地区,平原地区更适宜机械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因此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将有利于粮食集聚发展,其他地区受制于地理因素,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无法有效推动规模化发展从而导致粮食生产集聚水平不高。

(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门槛效应机理

目前已有文献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生产的阈值效应^[7]。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初级阶段,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与农业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匹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只局限于替代劳动力促进规模经营,而在其他环节上受限于技术和要素的约束,难以有效防止农户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现象^[8]。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期,服务市场规模已基本确立,要素市场能有效衔接。此时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处于加速发展阶段,逐渐取代农业生产劳动力推动粮食生产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后期阶段,受制于市场容量和地理环境的约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促进作用将逐步下降,而后趋于稳定状态。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规模效应、内部规模效应、规模不经济以及不良竞争效应是影响生产成本以及粮食生产集聚的主要因素,但何种效应居主导地位取决于规模效应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成本和粮食种植面积是粮食种植集聚的两个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满足于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投入成本,因此,文中假设两者的关系式为 $y=f(X)$, y 代表粮食种植面积, x 代表投入成本,由此构造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如何影响投入成本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机制图,见图1。图1中, O_0 为投入成本与粮食种植面积的原点, O_1 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该影响根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效应的临界点2为依据划分为两个阶段; $y_0=f_0(x)$ 和 $y_4=f_4(x)$ 、 $y_1=f_1(x)$ 和 $y_3=f_3(x)$ 、 $y_2=f_2(x)$, 分别代表粮食种植面积的低、中、高水平;受限于农业人力资本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的约束,粮食种植面积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趋势递减。

根据规模效应理论,图1A显示的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呈S形。进一步根据临界点1和临界点2将此过程划分为3阶段:初级阶段、成长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在初级阶段,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范围窄,未形成专业化服务体系,无法完全覆盖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难以有效防止农户的土地撂荒、闲置、粗放经营等现象。其次是农业领域纵向分工和服务外包受限于市场容量,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上下游联动发展的产业链尚未建成,导致在劳动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粮食种植面积处于低位状态,此阶段对应的粮食种植面积 $y_0=f_0(x)$ 的低水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果表现为其对粮食种植面积增长的贡献不大,甚至可能存在抑制作用。假设在曲线 $y_0=f_0(x)$ 上有一点

$A(x_0, y_0)$, 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共同作用下将发生跃升。在成长成熟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逐步扩大,服务范围逐步覆盖到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实现农户与服务业的有效衔接。农户一旦卷入社会化分工以及生产性服务外包,将内生出服务规模的经济性,有利于实现服务业降低劳动力要素成本,推动农业横向分工与粮食种植区域连片集聚发展。因此,在同样粮食种植水平下所需的投入成本更少,即 $y_0=f_0(x)$ 曲线上的A点将移动至 $y_1=f_1(x)$ 曲线上的C点。此外,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扩大,种粮技术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7],知识溢出效应将引导农户种植更多的粮食作物,即 $y_0=f_0(x)$ 曲线上的A点将移动至 $y_2=f_2(x)$ 曲线上的B点。在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根据矢量加法法则, $y_1=f_1(x)$ 曲线上的A点最终移动至 $y_2=f_2(x)$ 上的D点,粮食种植集聚水平实现提升。

图1中的c图显示的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由成长成熟阶段向衰退阶段演进时的影响图。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受限于市场以及地理环境的约束,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至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无法匹配的程度,诱发不良的资源竞争将不利于粮食种植面积的高速增长,即 $y_2=f_2(x)$ 曲线上的D点将移动至 $y_3=f_3(x)$ 曲线上的E点。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间的竞争会带动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涨,其次是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成本上升同样提高了粮食种植的单位成本,即 $y_2=f_2(x)$ 曲线上的D点将移动至 $y_3=f_3(x)$ 曲线上的F点。同样根据矢量加法法则,规模不经济以及不良竞争效应最终导致 $y_2=f_2(x)$ 曲线上的D点,移动至 $y_4=f_4(x)$ 曲线上的G,粮食种植面积又由此降低。

假设1:目前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成长成熟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正向作用于粮食生产集聚。

假设2: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较小时,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不大,甚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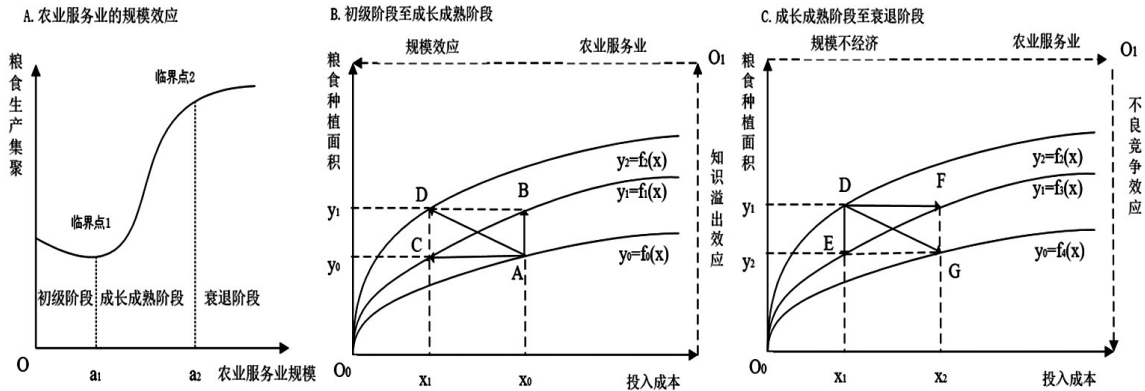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机制示意图

能存在负向作用;当跨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门槛值后,则对粮食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重点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上述的机理分析,文中首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效应,设定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LQ_{i,t} = \beta_0 + \beta_1 AS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i + \varphi_t + u_{i,t} \quad (1)$$

式(1)中, $LQ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 i 在第 t 年的粮食生产集聚水平; $AS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 X 则为控制变量合集,其中包括人均GDP水平(PG)、种植传统(PS)、机械化水平(MA)、劳动力转移(LT)、财政支农(FIN)、灌溉面积(LA)、工业化水平(IL); u 为复合残差项。

2.门槛回归模型的建立。为了考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文中参照 Hansen(1999)的研究方法构建门槛效应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先假设单一门槛特征,模型设定如下:

$$PS_{i,t} = \beta_0 + \beta_1 AS_{i,t} I(g_{i,t} \leq \gamma) + \beta_2 AS_{i,t} I(g_{i,t} \geq \gamma)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 $g_{i,t}$ 为门槛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γ 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I(\cdot)$ 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表达式为真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多门槛模型由此扩展得到。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目前测算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区位熵和产业集中系数等,文中选取区位熵指数测算地级市粮食生产集聚水平。区位熵指数又称为专门化率,可以较好地体现某一行业在地理上的空间分布,反映某一行业的集聚程度^[8]。计算公式为:

$$LQ_{ij} = \frac{e_{ij} / E_i}{\sum e_j / E} \quad (3)$$

式(3)中, LQ_{ij} 表示粮食生产集聚指数, e_{ij} 表示粮食播种面积, e_j 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E_i 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总播种面积, E 为粮食主产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如果 $LQ_{ij} = 1$, 表示该地级市粮食生产集聚水平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一致;如果 $LQ_{ij} > 1$, 则表明粮食在该地级市的集聚程度高于主产区的平均水平,粮食作物生产在该地级市具有比较优势,且 LQ_{ij} 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如果 $LQ_{ij} < 1$, 则相反。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AS)。目前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测量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从省级层面采用农村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整个农业就业人数的比例作为代理变量,二是采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来表示。由于地级市层面农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的缺失,文中采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同时由于农业服务业总产值的指标是2003年后才收录至统计年鉴,因此根据数

据的可得性,样本选取2004年至2017年。

解释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采用当年地区生产总值除以统计人口总数的对数形式来表示。(2)种植传统(PS_{t-1})。采用上期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衡量。(3)劳动力转移(LT)。采用城市常住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衡量。(4)工业化水平(IL)。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5)单位面积灌溉水平(LA)。用各市有效灌溉面积比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表示。(6)单位面积机械化水平(MA)。

用各市机械总动力比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表示。(7)财政支农(FIN)。采用农业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表示。

(三)数据来源

模型中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根据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补充,由于部分城市的数据存在个别年份缺失,我们采用线性插值填补,缺失数据较多的地级市予以剔除,最终选取粮食主产区17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符号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GS	粮食生产集聚	2380	0.990	0.174	0.161	1.507
核心解释变量	AS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2380	0.030	0.027	0.001	0.235
	PG	人均GDP对数	2380	10.165	0.792	7.961	12.534
	PS _{t-1}	上一期的粮食播种面积占比	2380	0.702	0.128	0.102	0.991
	LT	劳动力转移	2380	0.313	0.176	0.038	0.947
控制变量	IL	工业化水平	2380	0.490	0.103	0.148	0.859
	LA	单位灌溉	2380	0.389	0.170	0.016	1.659
	MA	单位机械(千瓦/公顷)	2380	6.158	3.395	1.02	37.577
	FIN	财政支农	2380	0.099	0.046	0.008	0.383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替代劳动力实现粮食生产集聚,同时,粮食生产集聚水平上升后同样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大,为此,文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FE-IV)处理内生性问题,采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见模型(2)、(3)。根据Hausman检验确认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后根据不可识别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不存在低劣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重点根据模型(2)、(3)估计结果讨论。

从模型(1)和模型(2)中可以看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粮食生产集聚,实证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说1。在控制变量中,种植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和灌溉面积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到了粮食生产集聚水平。种植传统正向作用于粮食生产集聚水平,这意味着过去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的增加有利于粮食生产集聚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负向作用于粮食生产集聚,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会引致政府轻视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农业集聚水平的下降;劳动力转移和灌溉面积均正向作用于粮食生产集聚,表明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水利设施的完善将有利于粮食生产向集聚转型;财政支农和机械化水平对农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粮食种植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财政支农和机械化水平对水稻、小麦、玉米的影响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因此两者对农业集聚的效果并不显著。

(2)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检验结果,文中进一步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集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到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一门槛值前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集聚影响的系数由负转正,即两者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低于0.0047时,其对农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当达到第一门槛值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逐渐达到适度规模,其对农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地,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到第二门槛值后,其对农业集聚的正向作用逐步缩小。由此可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其规模的增长产生阶段性的差异,当规模扩大到一定范围后,受制于自然因素以及行业间的拥挤效应,其正向作用会逐渐下降,该结果验证了假说H2。

表2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 值	95%水平置信区间
AS(AS≤0.0047)	-7.475	3.249	-2.30	0.021	(-13.846, -1.104)
AS(0.0047<AS≤0.0114)	2.901	0.703	4.13	0.000	(1.523, 4.279)
AS(0.0114<AS)	0.154	0.0894	1.73	0.085	(-0.021, 0.330)

(二) 异质性检验

鉴于粮食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且存在内部粮食生产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小麦、玉米、水稻种植集聚的影响,文中分别测算了小麦、玉米、水稻生产集聚水平,结果如表3所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小麦、玉米生产集聚的影响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确实有利于粮食生产的集聚水平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水稻生产的集聚影响为负且显著。对此,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水稻、玉米、小麦生产环节的特性存在差异。由于水稻生产环节繁杂,更兼备水田特性,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利于监督和计量,

同样也不利于大型机械插秧作业;其次,中国目前的水稻生产主体仍然是传统小规模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对小面积水稻种植农户转入土地起抑制作用,不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营,而小麦和玉米种植的全环节基本可实现全程机械化替代,从而引发了粮食作物之间的产品替代,挤出了水稻种植;另外,从物质与服务费用来看,水稻、小麦、玉米种植的服务费用分别为497.95、438.65、374.98元,其中水稻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最高,可见水稻生产环节繁杂和水田特性确实提升了其服务成本,而小农户或是兼业农户在选择外包服务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水稻种植规模和集聚的生产。

表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三大主粮生产集聚的模型估计

	小麦生产集聚		玉米生产集聚		水稻生产集聚	
	FE(4)	FE-IV(5)	FE(6)	FE-IV(7)	FE(8)	FE-IV(9)
AS	1.565***[0.430]	2.991***[0.674]	0.476**[0.216]	1.688**[0.700]	-1.324***[0.357]	-2.987***[1.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380	2210	2380	2210	2380	2210
调整后的R2	0.140	0.076	0.073	0.069	0.040	0.026

(三) 约束机制检验

就种植业而言,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由土地集中连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决定的,准确地说是

土地的自然条件和承包地块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规模经营的边界。在丘陵地区,承包耕地受限于自然条件,往往处于分散化和细碎化的状态,

是难以实现集中连片生产,因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促进作用同样受到限制。而在广大的平原地区,粮食作物更容易进行连片耕种形成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的集聚水平。为了考察地形(DX)是否会限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结合 ArcGIS 软件测算出地级市的耕地平均坡度,将坡度小于或者等于 2° 的地级市设为平原地区,将坡度大于 2° 的地级市设置为丘陵地区,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表4报告了地形约束条件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模型估计。受篇幅限制,表4直接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从表4模型的(10)和(11)的估计结果看,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为正且显著,而丘陵地区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丘陵地区耕地不适合种植机械化和连片耕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替代劳动力的难度较大,因此不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促进。就小麦生产集聚而言,同样在平原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小麦种植集聚的影响存在正向作用,而丘陵地区并不显著;就玉米种植而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玉米种植集聚的影响更多地来源于丘陵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玉米属于耐干旱作物,对于水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相较于其他作物而言在丘陵地区更具优势,因此,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有利于玉米种植的集聚;就水稻种植而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水稻种植的集聚,而在平原地区更为显著。

表4 地形约束条件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模型估计

FE-IV	粮食生产集聚		小麦生产集聚		玉米生产集聚		水稻生产集聚	
	平原(10)	丘陵(11)	平原(12)	丘陵(13)	平原(14)	丘陵(15)	平原(16)	丘陵(17)
AS	0.598*	0.145	3.591***	1.202	1.341	3.068***	-3.656***	-1.227
	[0.310]	[0.297]	[0.895]	[0.819]	[0.850]	[1.046]	[1.407]	[0.79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430	780	1430	780	1430	780	1430	780
调整后的R2	0.319	0.251	0.087	0.076	0.081	0.139	0.030	0.087

本文首先运用区位熵指数测算了粮食主产区地级市2004-2017年170个地级市粮食生产集聚指数;而后基于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工具变量法、门槛回归模型对理论模型结论及其推论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小麦、玉米、水稻种植的差异性以及地形的限制,进一步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和约束机制检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地理分布来看,粮食主产区内部的粮食集聚水平出现了内部分化的现象。粮食生产集聚水平正由分散分布向东北三省集中,但集聚水平较高的市域总数呈下降趋势。第二,从整体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初期,其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为负;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平跨过一定

阈值后,其对粮食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由负转正;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受限于地理环境和市场容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集聚的正向影响作用下降。第三,分样本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小麦、玉米种植集聚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却不利于水稻集聚水平的提高。第四,分地形看,平原地区有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小麦种植集聚的提升作用,而不利于其对水稻种植集聚水平的提升;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玉米生产集聚水平的提升有正向作用。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强粮食生产区域集聚。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地位,实施扶优扶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大力推动粮食生产向优势区集聚,助力粮食生产向专业化、产业化迈进。同时,对于粮食种植区位优势渐弱的地级市,进一步挖

掘优势特色农产品,合理规划种植结构,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范围,提供全程配套的粮食种植服务,包括全环节机械服务、精准施肥施药服务、节水灌溉服务、信息服务等,逐步形成高产出、高质量的粮食生产集聚区域。第三,调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避免产业拥挤。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集聚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高速增长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时,要把握好市场容量,建立适度规模效应,着重支持培育壮大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期攻克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薄弱环节。

参考文献:

- [1] 姜长云. 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与前景[J]. 经济研究参考, 2012(40): 12-35.
- [2] 蒋和平, 郭超然, 蒋黎.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0(1): 5-14.
- [3] 彭新宇. 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利益机制——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9): 74-84.
- [4] 杨进, 向春华, 张晓波. 中国农业的劳动分工——基于生产服务外包的视角[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3(2): 45-55.
- [5] 郝爱民.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的影响[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1): 8-15.
- [6] 罗必良. 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11): 2-16.
- [7] 魏修建, 李思霖.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关系研究——基于DEA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 2015, 32(3): 23-27.
- [8] 储霞玲, 黄修杰, 姚飞, 等. 农业专业化的时空演化规律及空间集聚效应探析——以广东省种植业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1): 194-203.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on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Based on Municipal Data of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CHEN Xiaoyan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438002, China)

Abstract: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Based on the data of 170 urban bases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from 2004 to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on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by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differentiated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the focus of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is gradu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of wheat and corn, but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of rice. Th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production links of rice are complex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ddy field. Based on the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slope division,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in plain area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threshold effect

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李宇峰¹, 吴俊峰¹, 陈俊²

(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义乌 322000;

2. 金华市欣生沸石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混凝土裂缝是建筑工程中常见的质量缺陷, 它的存在会对建(构)筑物外观和使用造成影响, 关键部位的裂缝有可能导致建筑物部分结构的失稳甚至引发建筑整体坍塌。裂缝检测技术可以探查结构裂缝的性状, 开展针对性的防治, 以避免重大事故发生。当前使用较多的超声波检测技术、人工检测、卷积神经网络识别算法和光频域反射等裂缝检测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环境限制、操作复杂和精度较差等局限性, 新的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智能检测方案架构, 简化设备且降低检测难度。混凝土裂缝检测智能化、高效化、普适化必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混凝土裂缝; 检测技术; 成因;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TU198

文献标识码: A

裂缝是混凝土结构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宏观变形现象。裂缝的存在会影响结构的刚性、耐久性、防水性以及完整性, 使结构的承载性能大打折扣。上世纪50年代国内外主流的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手段是超声波绕射法, 即通过压电效应原理利用压电晶片机械振动产生超声波, 并利用超声波绕射原理对混凝土裂缝进行检测, 该方法存在检测深度浅、遇水和钢筋等易产生声短路效应的局限性。我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利用单频脉冲波散射法^[1]来检测混凝土裂缝的检测仪, 成功克服了超声波遇水、钢筋等一些物体所产生的声短路效应的问题。90年代, 表面波的无损检测技术逐渐广泛应用, 李平、姚成林^[2]等人通过利用R波的传播特性, 对潘家口大坝裂缝进行现场检测实验, 取得优良的试验效果, 且取消了传统的钻孔操作, 有效降低检测工作对坝体结构的伤害, 该法较当时的常规检测技术而言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随着科技快速发展, 国内建筑领域混凝土裂缝检测的技术不断创新。

一、混凝土裂缝特征与成因分析

(一) 水化热引起的裂缝

混凝土属于多项复合型材料, 其所采用的粗细骨料、胶凝材料 and 外加剂决定了结构的内部属性。混凝土原生裂缝对于结构并不产生致命影响, 但由水化热形成的温差, 以及材料自身的化学收缩会导致混凝土产生新的裂缝或者将原有的裂缝扩大, 且超过可控的安全范围, 使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多项性能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该情况下形成裂缝的主要有上层裂缝、内部裂缝、底层裂缝、贯穿裂缝、非贯穿裂缝等。按裂缝形状分为龟裂缝或放射状裂缝、水平裂缝、竖向裂缝、斜向裂缝。

(二) 荷载引起的裂缝

荷载裂缝按其成因分为外部荷载引起的直接应力裂缝, 和由外荷载引发次生应力形成的次应力裂缝^[3]。混凝土是不均质材料的弹性体, 其抗拉性能极低, 在构件的受拉区, 当荷载超过混

作者简介: 李宇峰(2002-), 男, 浙江台州人, 大二学生, 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技术研究; 吴俊峰(1984-), 男, 浙江义乌人,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技术和地质工程研究; 陈俊(1981-), 男, 浙江金华人,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建筑防水材料应用技术研究。

凝土抗拉极限时,容易在应力集中或者应力变化较大的部位出现拉裂缝^[4]。该裂缝一般发生在门窗洞口的角部和平立面凹凸的转角处,以斜向楔形状裂缝居多。在集中荷载较大的部位,易产生劈裂状裂缝;在预应力结构锚固端的局部承压处易产生一条或数条放射状裂缝。

(三)地基不均匀沉降裂缝

混凝土材料作为主要受力构件的建筑物中,地基不均匀沉降也会导致混凝土裂缝,影响建筑物的整体性。一些结构复杂的建筑,则容易形成严重的破坏性裂缝,甚至发生建筑物不能正常使用的状况^[5]。该原因导致的裂缝呈底层多、上层少,外墙多、内墙少,开洞墙多、实体墙少,且大多为斜向裂缝,少数为竖向和水平向裂缝。

(四)钢筋锈蚀裂缝

钢筋保护层较薄或者混凝土质量不过关,导致二氧化碳腐蚀到混凝土钢筋界面,造成钢筋周围的混凝土碱度变小,速率大于正常速率,钢筋表面氯离子含量增加,加速了空气中的水或其他物质浸入裂缝中使得钢筋产生锈蚀膨胀,对原有包裹混凝土产生挤压,致混凝土开裂,承载力降低^[6],主要特征为沿着钢筋表面产生顺筋裂缝。

(五)其他原因导致的混凝土裂缝

其他原因的混凝土裂缝有混凝土水化导致塑性收缩产生裂缝,混凝土内部颗粒级配不均匀形成自收缩裂缝,材料失水形成干燥收缩裂缝,此外,混凝土毛细孔内自由水减少,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与凝胶材料反应产生大量碳化物而形成碳化收缩裂缝^[7]。

二、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研究现状

随着建筑使用时长增加,建筑结构的各种病害问题也随之显现,混凝土裂缝是最为常见的问题之一。混凝土裂缝检测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裂缝分布情况、预判裂缝发展,是建筑结构安全监测检测的重要手段。传统检测技术以人工肉眼观测辅以简单量具测量为主,存在较大局限,如细小轻微裂缝难以发现,对于较大裂缝的发展趋势亦难以精确科学评估;钻孔检测法可以对裂缝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预估,但钻孔会对混凝土构件造成二次破坏。近年来利用声波、光波、面

波和机器视觉的裂缝检测技术发展较快,但各有利弊,表1对几种常见技术进行了综合对比。

(一)OFDR光频域反射技术

OFDR技术原理是利用瑞丽散射光的变化特性创新的一种检测技术。吴静红等人^[8]创新利用OFDR技术对混凝土裂缝进行识别与监测。该实验通过有机玻璃板的试验证实了通过高空空间分辨率的分布式感测技术在混凝土的结构裂缝识别中的可行性,之后在混凝土中进行试验,并利用OFDR对裂缝发生位置进行定量研究和规律规律的监测。该技术满足了对混凝土裂缝发生的分布式、实时以及连续监测的需求。通过OFDR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的应变曲线定位裂缝位置以及实时监测效果,精确率最大误差缩小至5.63%,该技术在裂缝发生达到0.002mm时即可预警识别,满足了一种较高精度的监测要求,但技术在实际工程应用上仍存在限制。康增云等人^[9]将光纤裂缝传感技术应用于大坝石膏模型上,其试验结果收效同样显著,但光纤的埋设过程存在较大困难,光纤易断的性质增大了施工现场保管材料的难度,增加了成本,提高了对施工埋设技术的要求。当光纤材料与混凝土一起浇注时,该材质会发生随机断裂,造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该技术的实施对于施工单位是一种挑战,对于设备的的环境适应性也是一种考验。

(二)Thz成像的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

利用构建Thz成像梯度信息模型,通过分块模板匹配方法,对样本图像进行分隔,并提取混凝土裂缝Thz的边缘轮廓进行检测。在仿真试验结果表面,该方法混凝土裂缝检测准确性高,对于细小裂缝的检测能力较为突出,提高了监测性能。但是模型需要建立在大量样本数据基础上,对于一些复杂裂缝模型推演仍存在不足,对设备体系的完整性要求较高^[10]。

(三)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识别技术

该技术以计算机为载体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对裂缝图像进行识别。针对卷积网络复杂,训练参数多,设备配置要求高,检测实时性低等问题,王超等人提出了一种CNN的混凝土表面裂缝识别方法,通过搭建轻量化卷积神经网络以解决以上问题,研究中LFNet算法因其高效的精确率、召回率、综合评价率而优于其

表1 裂缝检测技术综合分析

裂缝检测技术	原理	优点	缺点	应用范围
OFDR 光频域反射技术	以光纤作为主要检测材质, 利用光反射技术原理检测裂缝的技术	检测数值回馈灵敏, 精度高	检测材质安装难度高, 检测空间随机裂缝效果较差	适用于混凝土检测量小, 易维护, 精准度实时性要求高的项目
Thz 混凝土裂缝成像检测技术	通过对图像数据分析, 建立裂缝信息模型的检测技术	裂缝检测精度高, 可直观地表现裂缝模型	较难适用于复杂裂缝, 无法探测裂缝深度、预测裂缝发展趋势, 需要以大量图像数据为依托	适用于精度要求高, 工程量小, 临时性的检测项目
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识别技术	以计算机对裂缝图像的深度学习方法, 对混凝土裂缝性质识别与检测的技术	自动化程度高, 精度较高, 效率高	设备完整性要求高, 无法检测裂缝深度, 无法预测发展趋势, 选择图像质量较高	适用于大坝一类面积广, 裂缝检测任务重, 不易于人工检测环境的工程
超声波裂缝检测技术	利用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特性, 通过接收反射信号来检测裂缝的检测技术	精度高, 设备携带方便, 设备造价较便宜, 适用范围广, 可探测裂缝深度	人为操作不当, 会导致裂缝检测精度下降	适用于对裂缝深度等其他数值有较高要求且裂缝检测任务少, 临时性的检测项目
瑞利波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技术	利用界面弹性波的传播特性, 通过分析在频散曲线下得到的波速来分析裂缝的检测技术	精度高, 成本较低, 适用范围广, 施工简单, 可探测裂缝深度	受到波特性和检测精度与裂缝深度成负相关	适用于对裂缝深度等其他数值有较高要求且裂缝检测任务少, 临时性的检测项目

它算法, 且计算误差控制在 0.5mm 以内^[11]。该方法的基础是获得较为清晰的混凝土裂缝图像以及对图像的预处理技术, 对照片的精度存在要求, 且要满足适应性的要求对其图片的样本采集就需要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多数裂缝表面识别研究中, 都存在混凝土裂缝识别量化的过程, 其目标是通过量化指标帮助人对裂缝损伤程度进行判断。在遵循此条件下, 量化指标的选择就应当遵循两个标准, 第一是可以反应裂缝性质, 第二是可以通过该指标判断裂缝的损伤程度^[12]。且在李艳伟、向航等人^[13]的利用无人机和水下机器人对高坝混凝土裂缝的检测研究中也体现了量化的重要性, 其通过无人机、水下机器人设备摄像获取大坝表观图像作为模型验证的数据集, 之后把实测数据输入完成训练后的混凝土表观缺陷判读模型, 以分析对应的图像是否存在缺陷。结果表明, 基于无人机摄影

所测量的宽度与人工测量的宽度大体一致, 但是这两种宽度均大于实际宽度(去除表面附着物, 裂缝填充物后), 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预期。此试验中混凝土表观缺陷判读模型的搭建需要在大量的原有参照物基础上。同时在最新的卢佳祁、姚志东^[14]基于递进式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识别混凝土裂缝方法研究中, 同样体现了混凝土裂缝图像数据收集的重要性, 其在试验模型学习训练前, 选择收集 600 张作为试验标本, 其中 450 张用于学习, 150 张用于试验, 经过一系列处理后用于第一级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裂缝识别, 之后利用 U-Net 来对裂缝关键特征点提取, 该实验在数据集制作时, 存在普适性的要求, 同时图像精度、图像的预处理技术等对于试验结果的准确性都有影响。李想^[15]等人对深度学习 SSD 目标检测算法研究中也利用到了一点, 为提高 SSD 算法的准确度时先利用 labe-

limg 对混凝土裂缝的大概位置进行人为的有效提取,再利用 SSD 算法对输入已经进行过人为选框(先验框)的图片进行层层特征层提取,所筛选出来的有效图层会通过回归预测和分类预测来调整先验框的种类与位置,最后确定预测框,实现精确识别混凝土裂缝。

(四)超声波裂缝检测技术

该技术是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利用了超声波传播方向强、穿透性好的特点,通过设备探头向所检测物体发射超声波,收集超声脉冲波在混凝土中的传播速度(声速)、首波幅度(波幅)和接收信号主频率(主频)等声学参数,并根据这些参数及其相对变化来判定混凝土裂缝深度状况^[16]。在超声波检测技术中,平测法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探测方法,其工作原理是在裂缝表面的双侧位置放置换能器,接收声波信号和反射波,利用绕过裂缝的换能器,得到实际信号并进行数据处理最后完成裂缝检测。高育鹏^[17]对平测法在混凝土裂缝的实际应用的研究中,利用混凝土裂缝缺陷综合测试仪(HC-F800)对不同类型的裂缝进行测试。该设备方法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检测的精确性难以保障,操作不当会导致检测结果偏差。另外,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非实体介质,其幅值会急剧下降,而混凝土正是一种非均质材料。韩晓亮等人^[18]利用超声波检测港口水工中微小裂缝时也得出检测技术是否规范对结果真实性影响的结论,其强调了提升检测频率,强化检测流程,重视复检的重要性。大量经验表明,必须保障裂缝检测工作过程中每个步骤,以确保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五)瑞利波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技术

瑞利波检测技术具有对裂缝敏感度高,操作简单,可单侧检测等优点。基于瑞利波的裂缝识别方法在罗广衡等人^[19]对瑞利波混凝土表面裂缝的研究中主要分为截止频率法和 SASW 法。瑞利波是一种界面弹性波,是沿半无限弹性介质自由表面传播的偏振波,其穿透深度取决于频率,在截止频率法中主要利用混凝土中的裂缝起到低通滤波器的效果,使得只有特定频率的瑞利波可穿过裂缝,之后通过检测瑞利波的入射和透射频率,来确定裂缝的截止频率,并利用该截止

频率来检测混凝土裂缝。而 SASW 法则利用两道信号根据互相关函数做傅里叶变换得到互相关率谱以及相位谱,根据相位谱的相位循环规律得到相位差,算出相速度与波长,通过相应特定频率下的相位差对瑞利波的计算传播时间、波长和波速得到频散曲线,最后根据曲线确定特定频率下的波速来判断结构中是否存在裂缝。该方法进行裂缝检测时主要受瑞利波的近场效应影响,瑞利波在裂缝前端产生衍射,衍射振幅随着裂缝深度增加而变大,这与瑞利波穿过裂缝时振幅稳定且幅值较小产生冲突,使得检测结果发生较大偏差。

三、智能裂缝检测方案设计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笔者提出了一种利用云计算、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以手机等移动设备为载体的新型智能裂缝检测方案。计算机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以软件制图、模型模拟和数据计算为主。张华^[20]在地质勘测领域设计出一款方便与信息交流的数据共享可视平台系统并成功应用,使得在建筑领域拥有数据库共享平台成为可能。云数据库可汇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建筑裂缝图样,促进计算机识别分析,方便各需求单位对样本素材的获取,可有效解决普适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混凝土裂缝识别的应用进程。计算机表面裂缝识别技术是大势所趋,但识别效率低、样本数量少、设备便携程度差、操作复杂等一系列难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周若虚等人^[21]在基于 Android 系统平台混凝土表面裂缝检测的研究中,使用泛洪填充算法和 java 编程,对裂缝进行二值化特征值提取,建立像素标记点与实际图像的关系式,该方法对 0-3mm 宽的裂缝测量精度较高,误差可控制在 $\pm 10\%$ 以内,但存在裂缝信息少、交互差等问题,限制了最终分析结果的延展。针对该问题,笔者构思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并配合数据库信息共享交流平台的智能裂缝检测系统,并设计了一份系统架构方案(见图 1)。

摩尔定律表明智能芯片近两年就会发生一次更新迭代。手机摄像像素的不断提高、GPU 集成化的高度发展,为智能手机替代庞大计算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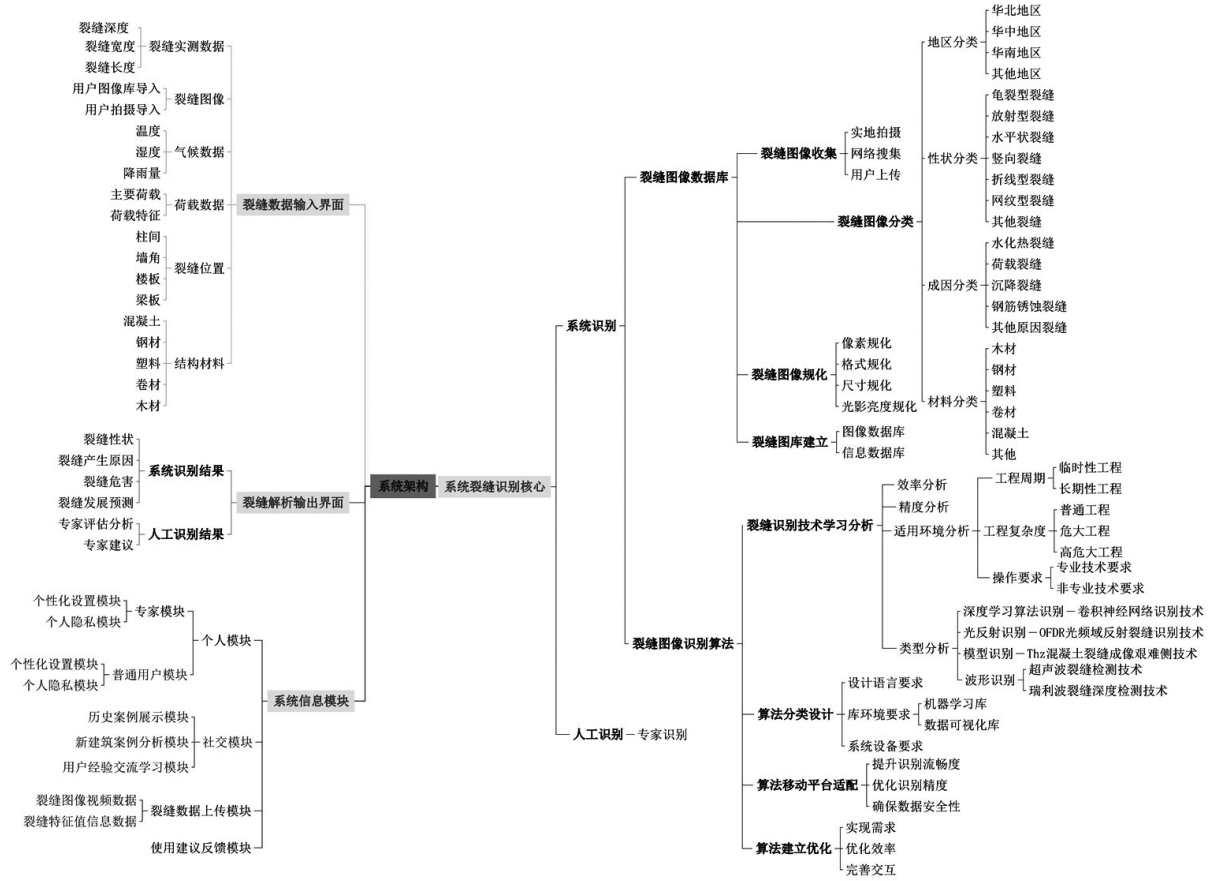


图1 智能裂缝检测系统架构

提供了设备支持。智能手机可以满足作为混凝土裂缝检测摄像设备的载体,因其普及程度高、像素高、质量轻、使用难度低、功能日渐完善等优点,满足了临时检测设备的需求。在某些重大或者需要长期检测的工程中,智能手机也存在短板,无法完全替代大型计算与检测设备,如手机摄像暂无法检测混凝土裂缝的深度,无法预测裂缝的发展趋势,在应用中无法满足更多更精确需求。因此,一个可共享的混凝土裂缝大数据库配合人工智能算法以及远程数据中心的高速云计

算,或许能够成为混凝土裂缝识别技术的一大创新,推动技术进一步朝着便携化、大众化、无损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的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已基本能满足各种工程应用场景,但受设备的精度、操作的规范程度影响,各项技术各有优势和局限。伴随着科技进步,混凝土裂缝检测智能化、高效化、普适化必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检测技术的创新应积极吸纳计算机互联网等其他领域的创新技术。

参考文献:

[1] 张震夏.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混凝土裂缝检测仪[C]/常流,王波.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1989-1991).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434.
 [2] 李平,姚成林,赵素桥,等. 无损检测技术在混凝土重力坝中的应用[J]. 海河水利,1998(3):37-38.
 [3] 张涛. 建筑施工中混凝土裂缝产生原因及其防控技术[J]. 居舍,2021(9):53-54,70.
 [4] 柳爱群,杨中,庞永平. 混凝土受弯构件因自重荷载引起裂缝的分析与处理[J]. 北方交通,2006(3):19-21.
 [5] 项信通. 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裂缝防治技术的分析[J]. 建筑与预算,2020(10):76-78.

- [6] 梁少阳. 混凝土开裂及维护综述[J]. 四川水泥, 2016(7): 262.
- [7] 刘雪, 郭远臣, 王雪, 等. 混凝土裂缝成因研究进展[J]. 硅酸盐通报, 2018, 37(7): 1001-1625.
- [8] 吴静红, 刘浩, 杨鹏, 等. 基于光频域反射计技术的混凝土裂缝识别与监测试验研究[J].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2019, 56(24): 140-147.
- [9] 康增云, 张林, 陈建叶, 等. 光纤传感技术在沙牌碾压混凝土高拱坝结构模型随机裂缝检测中的应用[J]. 四川水力发电, 2005(1): 66-68, 78.
- [10] 吴桐, 王莉. 基于THz成像的混凝土裂缝监测技术研究[J]. 激光杂志, 2020, 41(9): 57-61.
- [11] 王超, 贾贺, 张社荣, 等. 基于图像的混凝土表面裂缝量化高效识别方法[J]. 水力发电学报, 2021, 40(3): 134-144.
- [12] 车紫进. 基于机器视觉的混凝土裂缝识别与量化方法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 [13] 李艳伟, 向航, 彭望. 基于无人机和 underwater 机器人的高坝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J]. 建筑技术开发, 2021, 48(3): 52-54.
- [14] 卢佳祁, 姚志东. 基于递进式级联卷积神经网络的混凝土裂缝识别方法[J]. 工业建筑, 2021, 51(5): 30-35.
- [15] 李想, 熊进刚. 基于深度学习 SSD 目标检测算法的混凝土结构裂缝识别[J]. 南昌大学学报(工科版), 2021, 43(1): 43-51.
- [16] 刘平, 关春先, 罗技明, 等. 基于冲击弹性波和超声波的混凝土裂缝深度无损检测技术方法比较[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1(1): 64-68.
- [17] 高玉鹏. 超声平测法在混凝土裂缝检测中的应用研究[J]. 四川水泥, 2021(4): 32-33.
- [18] 韩晓亮. 港口水工建筑混凝土结构微小裂缝超声波检测方法研究[J].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21, 49(1): 122-124.
- [19] 罗广衡, 潘坚文, 王进廷. 瑞利波法检测混凝土表面裂缝深度的影响因素研究[J]. 水利水电技术(中英文), 2021, 52(9): 165-171.
- [20] 张华. 基于 Android 和 Web 的野外地质数据共享及可视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 [21] 周若虚.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混凝土表面裂缝检测系统研究[D].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2020.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f Concrete Crack Detection Technology

LI Yufeng¹, WU Junfeng¹, CHEN Jun²

(1.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2. Jinhua Xinsheng Zeolite Development Co., Ltd, Jinhua 321000, China)

Abstract: Concrete crack is a common quality defec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ts existence will affect the beauty and use of the building. The cracks in key parts may lead to the instability of part of the structure or even the collapse of the whole building. Crack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detect the properties of structural crack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avoid serious acci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technical practice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ly widely used crack detection technology, such as ultrasonic detection technology, manual detec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recognition algorithm and optical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ion, and points ou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any current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limitation, an intelligent detection scheme architecture based on smart phones is proposed to meet the de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simplify the equipment and reduce the detection difficulty. Concrete crack detection will be intelligent, efficient and universa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ncrete crack; detection technology; gene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饥饿书写”论析

毛靖宇,陈婉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义乌 322000)

摘要: 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饥饿书写”以1980年代普遍性的物质贫乏为写作背景,但又体现了欧阳江河独特的“元诗歌”诗学理论,其诗歌中频频写到的“吃”“饥饿”,总是与“写作”这样的虚构性事件捆绑在一起。这种“饥饿书写”体现了拉康著名的“镜像理论”的影响。“饥饿书写”是欧阳江河诗歌中值得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的写作主题与写作现象。

关键词: 欧阳江河;“饥饿书写”;“元诗歌”;“自指性写作”;拉康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诗歌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由于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与谈论,我们很难找到贴切的术语来指称它,在这里权且在最广泛、最一般化的意义上称这一现象为“饥饿书写”。这种饥饿书写表现在其诗歌中与“饥饿”,与“吃”,与饮食、餐具等相关的词语、意象频频出现,跨越其自1980年代以来直至当下的漫长的写作时期。比如,其早期的诗歌中出现“嘴唇”“渴”“饿”“粮食”等词语,近期的诗中则有“萝卜”“凉拌三丝”“鱼”“豆腐”“土豆”“洋葱”等。这种长期持续的“饥饿(吃)”书写无疑向我们提示着它的值得注意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它们也同时保持着某种自我遮蔽性。它们提示了在当代诗歌以及欧阳江河的诗歌文本中的某种变化,但是所携带的诗学信息既晦涩又零散,很难被我们既有的诗学研究术语所捕捉。鉴于这种情况,本文拟对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饥饿书写”进行研究,希望这种研究是铺垫式、奠基式的。

一、欧阳江河“饥饿书写”的“背景”问题

在1980年代,文学家对饥饿的书写绝不是

个人化、偶然性的事件,而是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当时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都对“吃”,对“饥饿”有突出、生动的描写:

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1]。

这是小说家阿城在《棋王》中对王一生吃相的一段著名描写。虽然为了达到描写的效果而在某些方面有些夸张,比如对主人公喉节、脸上的筋

作者简介: 毛靖宇(1973-),男,浙江衢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陈婉(1974-),女,江西上饶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的描写,对其吃饭的速度与节奏,对其冲饭盒吸油花等细节的描写,但是在这段吃相描写下面所隐含的一代人,甚至是数代人的社会性的饥饿恐惧、饥饿体验,却是完全真实的。在1980年代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全面展开,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条件,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挨饿吃不饱饭是常有的经历与体验。这种经历与体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比如90后、00后来说已经相当隔膜与陌生了。

欧阳江河是50年代生人,但是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家里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所以从小到大应该没吃过什么苦,当然也没挨过饿。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没挨过饿,并不说明他不能对他人的饥饿进行文学家式的感同身受的“移情”,也不会影响他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饥饿现象与饥饿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这就导致了“饥饿”这一主题在上述时代与社会背景之下进入欧阳氏诗歌文本的可能性。不过,这还不完全是本文所说的“背景问题”的全部含义,本文所指的“背景”问题,事实上与欧阳江河本人独特的诗学理论有关,是他的文本建构的内在构成成分。

由于小说与诗歌的文体差异,更加之欧阳江河本人诗学探索路径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饥饿书写”在欧阳江河诗歌中与阿城小说中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期待欧阳氏在诗歌中也像阿城那样处理饥饿主题。我们之所以在上面以大段的篇幅引用阿城在小说中对饥饿的描写,并不是说在诗歌与小说的主题表达上存在着可比性,而是将显而易见的小说中对饥饿的描写,保持为一种诗歌中的饥饿主题、饥饿书写研究的参照。

事实上,只要我们打开欧阳江河的诗集,找到那些我们认为具有饥饿书写痕迹的部分认真地读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部分涉及的与其说是对饥饿的描写,毋宁说仅仅出现了一些与饥饿相关的词语而已。也就是说,这里的“饥饿”并不是像在小说中那样,以主题化、对象化的方式进入文本,从而指称一种心理事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作为先锋实验诗人的欧阳江河的独特的诗学理解及写作风格所决定的。在欧阳江河独特的诗学建构中,饥饿主题与其他美学、心理学

主题,具有同等的性质,它们都是不能被语言令人满意地传达的。所以像小说家对饥饿的描写,尽管活灵活现,生动有趣,但在诗人看来,这样的描写仍旧是“无效”的。这里涉及的其实是当代诗歌写作学上的“语言的痛苦”^[2]的课题。这种“语言的痛苦”是当代诗人进行诗歌的形而上学追求与探索所必然遇到的难题。先锋诗人们正是因面对、克服这个难题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与写作路径。

笔者认为,翻遍欧阳江河的诗歌,特别是那些与“饥饿主题”相关,比如写到“吃”,“饥饿”,“消化”等的诗歌,读者是找不到《棋王》中那种饥饿描写所代表的饥饿体验的成分的。也就是说,在欧阳江河的诗学建构中,那种以《棋王》中的饥饿描写所代表的普遍性的饥饿体验,在其诗歌中是“零”,是缺席,是空白的。但事实上“零”并不等于一无所有:这一点是新的写作范式给诗歌带来的巨大的创新。它们实际上是以“前写作”,甚至是“潜意识”“无意识”的方式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进入诗歌的文本之中,而是作为一种语境和背景而存在,进入文本之中。这才是本文所说的“背景”问题的真正含义。这种概念的“背景”与1980年代全民性饥饿的社会背景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当代诗歌中一种新的诗学理解的产物,体现的其实是欧阳江河独特的“元诗歌”^[3]诗学理论。在这种元诗歌理论看来,诗人深度沉浸在感受、回忆等心理事实造成的“前写作”状态之中,并由这种不可见的前写作状态产生的推动力推动词语与意象的转移、跳跃,由此产生出可见的语言文本。这种范式指导下的饥饿书写只有对于那些已经具有某种阅读“前理解”的读者,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对于1980年代的时代性、社会性的饥饿体验有所感受、有所认知的读者,才能够在看到欧氏诗歌中的“饥饿”等相关词语的时候,由这些词语激发自己关于饥饿的体验与认知,并进而理解诗人在文本中编织的深层含义。反之,如果是一位缺乏这种前理解的读者,不知饥饿为何种情态,那除非他改变既有的阅读模式,付出一些“知识考古学”式的阅读劳作,否则他就完全不能读懂此类诗歌。

二、欧阳江河饥饿书写的“自指性”

事实上,即使是《棋王》中对于王一生吃相的精细入微的描写,也不会仅仅停留在纯粹物质性、生理性的“饥饿”主题层面,而自有其象征隐喻的功能。所以《棋王》中代表物质生活的“吃”,与代表精神生活的象棋,就是紧密联系着的:有着“吃”之虔诚的王一生,同时在象棋棋艺上也达到了人所不及之境。同样,欧阳江河的饥饿书写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物质与生理的层面。但是,欧阳江河诗歌中的这种“超物质性”,也是与通常理解的象征隐喻非常不同的,在这里笔者称之为一种“自指性”^[4],这种自指性的意思是:当诗歌写到“饥饿”的时候,实际上并不真的是(或者说完全是)在写现实生活中的饥饿,而是写与“诗歌写作”本身有关的饥饿。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其背景的“饥饿”,总是与“写作”这样的虚构性事件捆绑在一起的。

这种“饥饿”或者说“吃”的自指性的例子,我们在欧氏早期的诗歌中就能看到。比如其早期诗作《汉英之间》^{[5]17}的如下诗句:

……

一片响声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但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并且,省下很多好吃的日子,
让我和同一种族的人分食、挑剔。

这是“自指性”在欧阳氏早期诗歌中的表现的一个例子。该段诗句揭示了汉语与“我和同一种族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养育”与“分食、挑剔”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饥饿”书写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些松散,“写作”是就宽泛的意义而言的,诗歌实际谈论的,是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汉语。

在后来的一些诗作中,这种饥饿与写作的自指性联系,就更加密切,但是也更加隐蔽了。比如说从1990年代以后,像豹子、老虎这样一些猎食性动物的意象,就开始慢慢在欧阳江河的诗歌

中出现,并展示出它们对诗歌、对写作、对诗人主体的一种颇为混杂的反身自指性。

比如,豹子这一意象较早出现在写于1990年的《豹徽》^{[5]42}之中。吊诡的是,在这首诗里并没有写到豹子的猎食,反倒是写到了豹子被羊群“分食”:

豹在它的盛怒中燃尽
它高贵的血吹拂着荒原上的羊齿草
羊茫无所知地分食豹头
人举起豹尾驱赶羊群

事实上,豹子究竟是猎食,还是被分食,这是由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决定的。但无论是猎食还是分食,这首诗总归是写到了豹子的“吃”,并且如果我们通读全诗的话,会发现这种“吃”的自指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在这首诗中豹子其实是诗人主体形象的反身自指,上引诗句揭示的,其实是诗人与大众的关系:诗人创作诗歌供大众“消费”(“分食”),但是大众“茫无所知”(不能意识到诗人的价值)。

而在写于1995年的《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5]203}一诗中,豹子的形象就出现得更为频繁,意蕴也更为复杂了。这里的豹子总是与一种精神追求,与诗歌写作,与写作中的诗人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摘引论析。笔者想稍微提及的是该诗中的如下一段:

……豹子的饥饿
是一种精神上的处境,
拥有家族编年史的广阔篇幅,
但不保留咀嚼的锯齿形痕迹,
没有消化,没有排泄,表达了对食物的敬意
以及对精神洁癖的向往。

这是一段近乎“小说化”的对饥饿的“主题描写”,但是它所传达的饥饿体验与小说所传达的普遍性的饥饿体验大不相同。现实中怎么会有“没有消化,没有排泄”的“吃”?这段对“吃”的“描写”也的确是令人生疑的。这让我们想到它与小说家阿城对王一生的“吃”的描写一样,具有传奇性

的渲染。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这里“没有消化,没有排泄,表达了对食物的敬意”的吃,也的确与王一生一个油花,一个渣儿都不剩的精细的、虔诚的吃,具有某种同质同构性,区别仅在于,前者更强调的是在“精神”“写作”的层面:没有消化,没有排泄的“吃”,传达的其实是80年代、90年代诗人对诗歌的无以复加的狂热与热爱,对无论是古今中外的诗学资源、诗歌传统一视同仁一股脑儿的,强大的领悟与吸收能力!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由于巧合,也不是两位作者事先商量过怎么写,而是因为那种全民性的饥饿作为一种令一代人印象深刻的人生经历,进入作家的写作的“背景”或者说“潜意识”,最后对他们的写作产生不约而同的影响所致。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讲,这种对比能够起到“见著知微”的作用,以阿城小说中“王一生”的饥饿为参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欧阳氏诗歌中“豹子”的饥饿。

三、拉康“镜像理论”的影响

雅克·拉康是20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精神分析,甚至扩展到世界性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领域。而熟悉欧阳江河的人都知道,他在评论文章、讲课讲座中,都是非常喜欢引用拉康的言论思想的。因此说他的诗歌写作受到拉康的影响,毫不奇怪。只不过欧阳江河和拉康,这两位都是文笔非常艰深的作家,这就为他们之间的影响研究平添了不少难度。为行文论析之便,对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我们不直接引用其本人的文章,而是借鉴国内著名拉康研究专家的相关论述。

关于拉康的镜像理论,国内著名的拉康研究专家张一兵分析道:

拉康所说的镜子阶段,其实是指个人自我初始建构的时期。这时,个人主体第一次将自己指认为“我”。可是,在他的眼里,这个自我的形成与以往一切肯定性的主体建构说不同,包括弗洛伊德的自我说,它的本质是“主体在认定一个影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意象关系。“镜像阶段

的功能是意象功能的一个殊例。这个功能在于建立机体与它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意象关系却是以自我否定的颠倒形式出现的:身处幼时的“我”在镜像中的异化认同,这也是“我”之初始具象。这个意象建构是以牺牲内在世界(“我”)对象化为伪现实外在世界为代价的,这种对象化即黑格尔意义上的本体异化^{[6]13}。

根据张一兵的解读,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照镜子”这样的行为,涉及到的是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里拉康所理解的主体,不是传统哲学中,包括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体。它没有实体的,正面的,积极性的成分。相反,它是一种空无的,负面的,消极的成分。对于这种主体的虚无,张一兵论述道:

拉康之所以将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念称之为骗人的现象,是因为那个人人都认可的从“原生的”本我到自我(超我)的个人主体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并非故意的欺骗的本相是针对意识掩盖的那种缺失,即原初“我”的虚无!这是一个本体论上长期被遮蔽的重要缺失^{[6]12-13}。

而一种“自我”意识是怎么从这个虚幻的主体上面产生的呢?张一兵解释说:

拉康是想说,人们一直误认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主体(自我)其实是一个幻觉意义上的想象骗局,“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空无,它不过是“一个操作性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实质即我们将一个开端上就是假相的镜像误以为真实存在的个人主体。虽然这镜像来自于外部的介体,可是这个镜像始终是自画像。这个自画像的本质就是自我认同。“那就是我”、“我在这里和那里”的“我”,实际上是一种以想象为本质的反映性幻象^{[6]13}。

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镜像理论,简单讲就是

关于人的虚幻的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的理论。拉康认为,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将镜子所映射的外部世界的虚幻形象摄入到自己本己的虚无中,并将之错认为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

显然,在这种镜像理论中,从表面上看,我们看不到它和饥饿有任何关系。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种“照镜子”的行为与“吃”的行为之间,在一种欧阳江河诗学意义上的物质性的相似。比如:

1.镜像理论中照镜子行为的主体,是一个与弗洛伊德等人的肯定性的自我主体相反的消极主体,是一个虚幻的空无的空间;“吃”的行为的主体,以及(欧阳江河诗歌中经常出现的)“胃”“嘴巴”等意象,也是一个空无的空间。

2.无论是照镜子的主体,还是“吃”的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因为空无,所以饥饿,所以要“吃”。相反,如果是一个肯定的,充实的主体;一个实心球一样的胃,那就不会产生匮乏,就不存在“吃”的可能性了。

3.镜像理论中镜子映射的镜像,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幻象,具有异质性。主体对这个映像的认同,是一个异化过程,主体不能自我建构为主体,没有这个异化过程,主体就不能成为主体;“吃”的行为的对象:食物,也来自于外部世界,具有异质性。吃者对食物的吃,也是一个异化过程,任何生物都不能靠自己吃自己生存,没有这个异化过程,吃者的生命就不能维持。

4.主体照镜子的过程,是一个对外部映像的“摄入”的动作,吃者吃食物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外部食物“摄入”的动作。这里都涉及到一种信息、能量向一个负压真空的流动。

显然,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系列的相似与对应性,就不难承认在欧氏的饥饿书写与拉康的镜像理论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可能是笔者过度阐释的结果,所以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最好再引一些诗句为证。比如《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一诗中有如下诗句:

千里之外敲门的豹子,
它的饥饿是一座监狱的饥饿,

自由的门朝向武器敞开。

在这句诗里我们看到,豹子的饥饿被“比喻”成一座“监狱”,这是一个空间。虽然这个空间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封闭性的,但是后面立即又说“朝向武器敞开”,这就赋予这个空间负压的特征。所以,这里所体现的结构关系,与上面所论镜像理论——进食行为中所体现的结构关系完全是同构的。而且,“武器”一词暗示了一种侵袭性,而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同化与异化问题,根本上也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侵袭性的:“吃”在根本上是一种暴力行为。

下面再看《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一诗中接下来的一段:

牙痛的豹子,随它怎样去捕食吧,
它那辽阔的胃如掌声传开。
但这一切纯属我们头脑里的产物,
采取暴力的高级形式朝心灵移动,
仿佛饥饿是一门古老的技艺,
它的容貌是不起变化的
时间的容貌:食物是它的镜子。
而我们则依赖我们的衰老活到今天。

这段诗虽然篇幅较长,难以详细分析,但是它与拉康镜像理论的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倒数第二句出现了“镜子”一词,说:食物就是镜子,这不明摆着说明了饥饿书写与拉康镜像理论的关系吗?而且中间“但这一切纯属我们头脑里的产物,采取暴力的高级形式朝心灵移动”两句,也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拉康思想。所谓“纯属头脑里的产物”,是说“镜像认同”完全是一种发生在主体方面的“主观”的想象;所谓“暴力的高级形式朝心灵移动”,这一句与上面写监狱的“自由的门朝向武器敞开”一句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其中“心灵”与“监狱”都是一个负压空间,而“武器”和“暴力的高级形式”都有侵袭性。笔者相信这一句是在拉康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的改写。因为拉康的理论其实是充满了悲观气息的,主体既然是虚妄,自我也是一种错认,人的一生的追逐其实是为他者的欲望所牵,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拉康肯定不会相信,主体能够朝

着心灵移动,因为在拉康看来,实体性的心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始终坚信诗歌是一种崇高的、神性的事业的欧阳江河,始终坚信那种崇高的、形而上的精神价值之存在的欧阳江河,并没有僵硬教条地接受拉康的思想,而是保存了其精到合理的成分,过滤了其悲观、消极的末世气息。所以“但这一切纯属我们头脑里的产物,采取暴力的高级形式朝心灵移动”这两句诗,其意义就在于借用拉康的理论传达了这样一种对于诗歌写作的信念:虚妄的主体也是有可能在崇高的诗歌写作中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的,尽管这种写作也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令人经受痛苦的折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饮食吃饭之事,是人生中异常重要的大事。但是,这件大事却因为它过于日常化,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具有“诗意”与美感,所以,在讲究典雅之美的古典诗歌传统

中,“吃”并没有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主题。相反,在欧阳江河的当代诗歌诗学实践中,这一点得到了极大的纠正。“饥饿书写”是欧阳江河诗歌中一个突出的,值得研究的主题。欧阳江河以“饥饿”“吃”“食物”等意象、词语入诗,以一个特定时代的全民集体记忆入诗,将现实与虚构(写作)相结合,将词语与个人生命体验乃至民族生存体验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元诗歌”“元写作”性质的“饥饿诗歌”写作,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新诗的题材范围与表现能力;同时对西方文化史上著名的思想大师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的借鉴,也极大地拓宽、加深了“饥饿书写”的内容含量与精神深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欧阳江河诗歌研究中,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并不多。本论文只是起到一个铺垫性、抛砖引玉的作用,试图引起更多研究者对这个主题的兴趣。

参考文献:

- [1] 阿城. 棋王[M]//钱谷融,吴宏聪.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34.
- [2] 毛靖宇.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语言论转向”研究[D]. 北京:清华大学,2009:18.
- [3] 欧阳江河. 词的奇境——写在华清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前面[J]. 当代作家评论,2017(7):8-11.
- [4] 毛靖宇. 先锋诗歌自指性写作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04-110.
- [5] 欧阳江河. 谁去谁留[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 [6] 张一兵. 从自恋到畸镜之恋——拉康镜像理论解读[J]. 天津社会科学,2004(6):12-18,74.

On the Hunger Writing in Ouyang Jianghe's Poems

MAO Jingyu, CHEN wa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Abstract: The Hunger Writing in the poetry of Ouyang Jianghe, a famous contemporary poet, takes the general material poverty in the 1980s a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but it also embodies Ouyang's unique poetics theory of Metapoetry. The images of eating and hunger frequently written in his poetry are always tied up with writing as a fictional events. This Hunger Writing reflects Lacan's influence of mirror theory. Hunger Writing is a writing theme and phenomenon in Ouyang Jianghe's poetry that deserves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Ouyang Jianghe; Hunger Writing; Metapoetry; Self-referential writing; Jacques Lacan

文化基因视角下的雅畈传统村落保护 策略研究与思考

孟志广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基因。雅畈传统村落在院落、村口、公共空间、街巷、建筑、景观环境等要素中都遗存有众多传统文化基因,包括风水文化、耕读文化、宗族文化和信仰文化。做好雅畈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文化基因传承,有必要采取历史街巷空间保护与更新、既有建筑保护改造与新建筑和谐共生、景观环境整治与风貌控制、历史环境要素保护与修复等策略。

关键词:文化基因;传统村落;解码;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十九大后,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1],因此在乡村建设中传承优秀文化,契合了现阶段的中央文化工作精神,对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文化自信有着积极的意义。2017年6月,笔者作为雅畈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规划师及导师,联合指导浙江师范大学城乡规划系五年级学生乡村规划毕业设计,带领规划团队对雅畈村展开研究和保护规划设计,共同确定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整体保护发展思路和规划总图。历时一年多的研究,并结合专家、乡镇干部、村民等各方面的建议,最终于2018年6月形成研究成果。本研究是从文化基因解码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遗产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二、雅畈传统村落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雅畈村位于浙中丘陵盆地,金华市区南侧,距市区4.5公里。东南界武义县,东北濒武义

江,隔江与金东区江东镇、多湖街道相望,西南毗邻安地镇,西北接金华经济开发区苏孟乡^[2]。雅畈村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宋绍定四年,松阳人叶敬甫选择在雅畈村叶村蓬居住,后因每年河水泛滥,移居雅畈高台门,始建雅畈村,繁衍子孙,营建厅堂,后世渐渐扩建街道成雅畈古街。雅畈村选址于此,是因为这里山水俱佳的自然环境,以中国传统的风水观而言,此处是山水汇聚,藏风得水之地。村内道路、街巷格局,传统建筑、文物古迹,和村民传统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江南聚居繁衍自然村落的优美画卷。目前村落虽然历史风貌破坏较大,但明清的建筑保存整体状况较好,且保存有一定数量,建筑地域特色明显,建筑质量较好,雕刻精美,是婺派建筑的典型代表。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当地儒家文化,是儒家传人为自己构筑的生存空间与环境,对研究明清村落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建筑风格和形式具有一定意义。

(二)村落文化概况

雅畈天然的地理环境,孕育出较为浓厚的耕读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共同形成浓郁的多元传统文化。现代市场经济洪流,主导着村落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但快速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造成乡村聚落严重退化、聚落景观破碎化,侵蚀乡村

作者简介:孟志广(1981-),男,河北邢台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城乡规划研究。

聚落文化生态本底,乡村优质和高端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三、雅畈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解码

(一)文化基因理论

文化基因与生物遗传基因类似,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是从生物学中的基因理论衍生出来并且用来研究文化传播和进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最早出现在习性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976)中,即 Meme,是一个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一个与生物遗传基因(Gene)相对应的单词^[3]。自道金斯杜撰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之后,西方学界就不断地对它进行解读和应用,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道金斯的学生,英国布里斯托西英格兰大学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 mere)运用 Meme 思想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其专著《迷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中做了更为详尽而又具有先驱性的探索。她认为,文化基因的功能和作用类似于生物的遗传基因。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威尔逊(Wilson, 1998)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观点。认为文化进化依赖于获得性状的传递,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而生物基因进化是达尔文主义式的,依赖于几个世代的基因频率的改变,相对来说速度缓慢。他提出了文化基因三种传递模式,即基因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基因—文化螺旋交替方式传递^[4]。

(二)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解码

1.传统村落概况

传统村落空间是指村落已建成的区域以及与这个村落的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外部地理空间环境。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意:一是农村居民点的内部空间,包括住宅、庭院、街巷、水系、公共建筑、绿地等及与生活相配套的各项基础设施;二是与这个村落的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外部地理空间环境,包括周围的山丘、河流、农田、道路等^[5]。

2.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解码

本次对雅畈古村落空间进行文化基因解码,

归纳为风水文化、耕读文化、宗族文化、信仰文化几个方面。

(1)风水文化

传统村落不管是什么坐向,都选择背山面水的空间格局,这是人们对良好的自然景观的一种选择。以主山、少祖山、祖山为村落的背景,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轮廓线,使背景有进深感。以水面作为前景,形成了开阔平远的视野,隔水回望形成生动的水面造影;以案山、朝山为对景,使人们的视觉有所归宿。

雅畈村现有街巷空间主要由四条历史商道组成,平面构图上形似一条昂首而来的青龙,龙头为上街的主要商铺区域,龙身及龙爪为包括将军殿、四面厅、七家厅在内的各个历史建筑,龙尾摆至最北部,主要为一些砖石低矮建筑,符合传统的风水格局。

(2)耕读文化

雅畈村教育设施多而齐全,并占据村落空间的主要位置。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首先表现在对子女教育的极端重视,他们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希望儿孙们边耕边读,并通过科举入仕,振兴家族,光宗耀祖,实现他们的理想与希望。因此,每个家族在族谱中几乎都有劝学条例,《陈氏家谱》说:“凡吾族子弟,卫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6];反映在建筑上则是大兴义学、书院、私塾等教育设施,并占据着村落空间的主要位置。

村落内的传统建筑装饰以弘扬耕读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砖雕、木雕、对联、牌匾等形式来刻画和表现,形式多样。

(3)宗族文化

①管理严密,等级严密的宗祠公共空间

宗族制度是积极入世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一个家族,要取得振兴,没有一套严密的宗族管理制度是不行的。宗族制度是礼制文化最典型和最基本的反映,除了祭祖归族,还管理着村落中的各项公共事务,包括婚丧嫁娶、兄弟分家等,扬善惩恶,维护着村民的伦理秩序。宗族制度最典型的反映是村落中各级礼制的中心——祠堂,其内部按等级由低至高的顺序是:祖屋、香火堂、支祠、分祠、宗祠。雅畈古村落祠

堂众多,等级分明。

②宗族组团式的空间结构模式

以血缘为纽带的差序格局是传统村落形成的一大特点,而作为血缘聚落的居民点中,其住宅的分布是和各等级的礼制制度相结合的。这种组团的发育过程与宗族的发育过程相对应,结果形成了以宗祠到祖屋多层次的演变递进的宗族组团式的结构布局。

(4)信仰文化

①外拜神仙内拜鬼的祈福文化空间格局

在靠天吃饭和医疗技术极其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当人们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病害时,束手无策,只能求神仙保佑,因此,各路神仙只要有,都被请来,以保一方平安。各类庙宇因此分布在村落的周围,其中尤以在上水口和下水口处居多。在雅畛古村落中,表现为村落内部建造宗祠和外部修造宗教建筑的空间格局。

②多教融合的建筑风格

村落内各方神灵杂塑,体现出了多教融合的文化特色。从庙宇的建造时序和所供奉的神灵看,先祈多子多孙,后求幸福平安。宗教活动影响深远,至今活动频繁,是过去直至现在主要的社会活动内容之一。体现出宗教信仰的恒久性、传承性、地方性、实用性、发展性的特点。

四、雅畛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基因传承的探索

(一)文化基因传承的探索

1.院落空间重组传承

雅畛古村落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基因,并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村落保护的核心思想。院落空间作为传统村落典型的居住空间单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烈的一个符号,是包含亭台水榭,花鸟草木的一种建筑体系,其中花木作为院落的重要内容,融合了科学、美学、心理、伦理、艺术等文化,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和心血,并与户主直接接触、沟通、交流,从而成为户主的精神寄托,陶冶着户主的情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榆柳荫其后,桃李罗堂前”等等,都是描写庭院与花木的空间关系,同时也是户主生活情趣在空间上的具体落实。因此,在现有将近20

个保留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庭院空间基础上,采用了“庭院空间”为基本建筑空间单元,对古村落核心区进行院落空间的重组。

古村落核心区,由于村落发展过程中缺少统一的规划与管理,所以建筑空间存在空间杂乱、风格不统一、建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因此,在建筑质量评价和历史风貌评价基础上,利用重组“院落空间”理念,在相邻的建筑中,保留建筑质量和历史风貌较好的建筑,拆除建筑质量比较差的建筑,对建筑空间整体进行重新梳理,从而实现院落空间的重构。

对于重构的院落空间,赋予某一特定的花木文化,如“桂园”“梅园”“红豆杉园”等,使得每一个庭院蕴含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而打造雅畛村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元素和基因,形成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院落空间。同时对保留建筑进行建筑立面的改造,对重构的庭院有针对性地进行园林设计。

2.公共空间重塑传承

雅畛村历史文化基础深厚,应以宣扬“雅文化”为主,从“儒雅”“风雅”“古雅”“文雅”四方面来体现“雅文化”。其中“儒雅”表现形式为语录,在故居旁的广场地上镌刻孔子名言;“风雅”表现形式为礼乐,在中心大广场设置戏台、编钟等;“古雅”表现形式为诗词,在七家厅前广场的连廊上题诗;“文雅”表现形式为书画,在四面厅旁的广场上放置篆石。雅畛村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较多,其中七家厅建于明代早期,是金华地区现存最早的民居建筑之一,1997年就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更是升级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在规划中设置重要的七家厅广场,作为供村民与游客活动的公共空间。

3.村口非遗空间营造传承

婺州窑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窑之一,历史悠久。作为中国传统陶瓷文化中的一脉,婺州陶器烧制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上山遗址。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雅畛汉灶村遗存的古窑遗址是目前婺州窑窑址中保存最完好的窑址群之一。婺州窑文化作为雅畛传统村落重要的非遗文化,在雅畛传统村落村口位置建一座街头小公园性质的标志性构筑物“婺窑塔园”,约计用地面

积4000平方米左右。来营造浓郁的婺州窑为特色的非遗文化氛围。

婺窑塔园构思,从全局到局部至细部,均源自婺州窑作品器形和婺文化精髓,不是其他名窑、其他文化的复制品,而且本设计是在婺州窑作品器形基础上,运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变形、错位、嫁接、切割、粘贴、旋转、移动、放大、转换等等手段,对传统婺州窑艺术有所创新和发展。整体设计处处源于婺州窑历史,传承婺州文化脉息,展示了发展中的婺文化。

(二)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

1.历史街巷空间保护与更新

在庭院空间重构基础上,根据雅畈村古村落核心区街巷现状格局形态,在保持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街巷交通线路进行重新梳理,使其形成“一轴、一环、多枝”的街巷系统。“一轴”是指古村落原有的南北向主干道,该轴线历史空间保留完整,历史记忆清晰,是古村落的主要人行交通线路。同时由于雅畈村历史上以雅畈古街出名,故该道路设置商业路线,让游客在商业风情中体验雅畈村的历史文化。“一环”是指保留建筑的相隔空间,重新梳理并串联众多新构建的庭院空间的步行、游览线路。“多枝”是指东西向联系着“一轴”和“一环”的原有街巷空间。

2.既有建筑保护改造与新建筑和谐共生

雅畈村历经岁月风雨,现保存的古建筑包括七家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旨牌坊、叶基增民居、黄良喜民居、鲍时山民居、吴洪良民居、小祠堂、将军殿、叶氏宗祠、叶乃凡故居、王苗春故居等拟申报历史建筑以及传统建筑的密集分布区块,是金华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这些厅堂建筑结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都极具江南古民居的典型特色。如七家厅有各种方形的石柱、木梁、木栅等,前进置方形花窗,后进方梁上置斗拱承托棱栅。方厅最别具一格的是把牛腿与拱牵巧妙地设计成一条腾飞的牵龙,惟妙惟肖;又如楼厅、四面厅、小祠堂的雕刻极为精细,除梁架、马腿上雕有栩栩如生的走兽花鸟外,窗棂腰板上雕刻的楼台古刹、山水风景更是精湛;而四个大门倾篷都刻着麒麟、凤凰、松鹤、鲜花等形态生动的砖雕,是为古建筑雕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针对核心保护区内的保留

建筑,提出立面改造的建议方案,包括对建筑的立面和门、窗、屋顶等建筑构件提出相应改造和整治要求。

新建民居主要针对120平方米和90平方米两种基本户型进行设计。室内布置基本满足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需求,建筑立面以传统古建筑作参考,使新老建筑的建筑风格基本吻合,从而营造古村落的统一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马头墙、主入口门楼风格的设计中。同时,在门窗细部上,利用现代材料构建出传统窗花样式,屋面采用灰色英红彩瓦和筒瓦,墙面以白色为基调,使立面风格既传统又现代。

公共建筑如旅游接待中心等,单独进行建筑设计,总体风格以古建筑为基调,同时具有江南水乡的环境氛围。商业街改造,在满足商业用房功能同时,充分体现古建筑的建筑氛围。

3.景观环境整治与风貌控制

将村落内部各个池塘用水渠相连,并引入核心区,滨水空间作为村落景观艺术构图的要素,建设生态宜人的滨水空间,使之成为集中体现古村特色的生态文化景观节点。几处规划的广场空间,分布在南、北、中三地。南侧入口空间是展示古村落形象的重要景观节点,以开敞、亲和为主,辅以具象或抽象的建筑小品,展现或提示古村的地域文化和个性特征。北侧广场以举办文化活动为主要功能,如社戏演出、祭祖敬宗、集会等,是村庄重要的文化活动空间。中间广场,是两者的补充,具备空间过渡、增加居民交流机会功能,同时兼备一定的商业功能,如集市、旅游商品的买卖。注重传统街巷空间的塑造,包括原有主要街巷的恢复。仿古商业街区的修建,力求营造风貌古朴、尺度宜人、商市繁盛,别具古村落特色的街市空间。

4.历史环境要素保护与修复

对历史环境要素进行严格保护,其中古井旁立石碑使之成为永久性记忆,并不准填埋及污染;小祠堂井作为活井继续使用;古路用原材料、原工艺在原址修复,并立石碑使之成为永久性记忆;直棂窗、铁栅窗作为元代建筑元素具有保护价值,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在原址修复,使之成为永久性记忆。古栈道通过清理环境,去除垃圾、杂草、废物,并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

整修。

五、结语

经历几百年、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却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面临衰落甚至消失的困境。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已经变得迫在眉睫。值得

庆幸的是,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对雅畈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被触发,文化作为传统村落的灵魂如何传承成为关键,而通过文化基因的层层解码对问题进行解答,可以在传统村落建设和文脉保护中寻求并建立一种动态的保护方式和内容,对于探索乡村文化基因传承路径,丰富我国乡村文化保护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01-15)[2021-11-10]. <https://baike.so.com/doc/9659711-10005729.html>.
-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8(乡镇卷)[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186.
- [3] [美]波拉克. 解读基因:来自DNA的信息[M]. 杨玉玲,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73-74.
- [4] 赵传海. 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J]. 河南社会科学,2008(3):120-121.
- [5] 陈志文,李惠娟. 中国江南农村居住空间的结构模式[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1):86-87.
- [6] 周国忠. 楠溪江古村落历史文化发展策略研究[J]. 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3):44-46.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of Yafan Traditional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ne

MENG Zhigu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tain rich cultural genes. Yafan traditional village has many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in the courtyard, village entrance, public space, streets and alleys, architecture,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other elements, including fengshui culture,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 clan culture and belief cultur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cultural gene of Yafan traditional villag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al streets and lanes, the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buildings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new buildings, the improvement of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style control, and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elements.

Key words: cultural gene; traditional villages; decode; inheritance; protect

Journal of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No.4 2021(General Serial No.70)

CONTENT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SUN Bufan, JIA Zhiguo, CHENG Yike(1)
On Alienation & Return of Intermediary Roles for Enforcement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XIANG Dan(8)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Modern IT Environment	ZHANG Hai(15)
On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I Weifa(19)
Three-fold Logic of Video Teaching Application in Ideological &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ANG Haoyan(23)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Way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ANG Saijun(28)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YAN Juan(32)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U Chaojun(42)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ad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NG Jun, LIU Liangjun(48)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on Gra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Based on Municipal Data of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CHEN Xiaoyan(53)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f Concrete Crack Detection Technology	LI Yufeng, WU Junfeng(61)
On the Hunger Writing in Ouyang Jianghe's Poems	MAO Jingyu, CHEN wan(67)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of Yafan Traditional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ne	MENG Zhiguang(73)

2021年总目录

第1期

将“和”贯穿于社区治理全过程	刘良军
党建引领构建社区善治微单元	王艺霖,刘芸瑞
后小康社会农产品流通创新发展研究	杨中柱
高校学生劳务费个税征管模式探讨	王永姣
中国省域高职教育空间联系演化及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刘海蓉,徐伟
伦理学视阈下加拿大高校少数民族裔学生管理与培养	熊素英
探究式教学法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王浩
“课程思政”理念融入新闻学原理课程的路径探究	艾志杰
基于职教云数据驱动的“HTML5动画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兵
团辅技术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活动设计与方法操作	李进
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蔡伟发
基于神经网络和模糊逻辑的BDFM直接转矩控制	乔维德
欧阳江河诗歌中“圆形废墟”意象论析	陈婉,毛靖宇
新时期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功能实现路径研究	方玉娟
大学生在线健康信息求助行为及其规范化研究	宋国臣

第2期

义乌古塔考略	胡吉省,胡俊麟
我国高职院校创意教育研究:现状与反思	郭云瑶
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黄艺
高等教育“补短板”的浙江个案研究	孙不凡
学前教师职业倦怠的人类发展生态学审视	邓蕾蕾
双高建设背景下二级学院教科部门服务提升路径研究	王丹萍
伴随式多维度项目化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明珠
基于BX灰色GM(1,1)的我国通信行业收入预测	舒服华
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文化差异和对策	赵德武
一种滚动轴承故障诊断的神经网络模型	乔维德
美好社会视域下“内卷化”现象的生成机理和引导路径	蒋芝英
“一带一路”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王沛凯

原型结构、历史记忆与精神症候 杨 雷

第3期

“双高”背景下地方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的义乌实践 何少庆,李 晶
 基于学分替代的高职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傅 航
 职前教师教育实践教学发展经验与启示 李斌强
 高职院校智能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马海燕,赵俞凌,王 丽
 劳动教育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价值与实施路径 季晓伟,曹晶晶
 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协同育人的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 傅琴琴
 大学生视角下混合式教学发展研究 龚 庆,林耿堃
 运用EMD-ARMA模型预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王 艳
 价值链整合视角下军民融合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升级研究综述 陈志新,邹大挺
 中国“文体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模式与政策选择 王 浩
 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压舱石”与“定盘星” 刘良军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引导 刘 矛
 奇人、奇书、奇心 潘卫明,陈兰村
 中国网络文学IP产业链开发的现状、价值及意义 赵云洁
 高职院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探析 张立菊

第4期

“双减”背景下的校外培训机构:概览、问题及治理 孙不凡
 教育惩戒执行中介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向 丹
 “应用本科”与“高职本科”的异同与转型 刘江南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职院校有效教学策略 张 海
 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蔡伟发
 视频在思政课教学中运用的三重逻辑 王浩岩
 对外传播视角下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 王赛君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严 娟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投入 刘超俊
 上市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评价 舒服华
 零星疫情防控之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王 俊,刘良军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 陈晓燕
 混凝土裂缝检测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李宇峰,吴俊峰等
 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饥饿书写”论析 毛靖宇,陈 婉
 文化基因视角下的雅畈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与思考 孟志广

学校动态



12月17日，“西班牙义乌丝路学院”在学校和西班牙马德里同时揭牌成立。



10月22日，“跟着总书记在浙江的足迹学党史”2021年度浙江省高校思政公开课义乌专场在学校举行。



学校选送的“百凝茉香与茶相恋”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职教赛道银奖。



10月17日，学校创业学院“敲糖帮”项目获2021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初创组银奖。



学校赵勇老师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暨优秀课程观摩活动一等奖。



学校陈旦、贾晓蕾、王赛君、王惠莲团队作品“品读中国”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马 广

副主任：李慧玲

成 员：潘建林 盛湘君 吴 俊 金红梅 李 妍 王晓明

曹晶晶 楼天良 陈旭华 陈宇鹏 吴 雷

主 编：李慧玲

副主编：潘建林

责任编辑：朱 萍

英文译校：何少庆 陈志明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季刊）

2021年第4期（总第70期）

主 管：浙江省教育厅

主 办：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编辑出版：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浙江省义乌市学院路2号

电 话：(0579) 83803567

邮 编：322000

电子信箱：ywjournal@126.com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印 刷：金华日报社印刷厂

浙内准字 第G021号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